



目 录

专 论

- 3 于滨 / 十月革命百年之后——世界秩序
与西方认同的解体与重构

大国关系

- 22 杨成绪 / 二战后德俄关系发展历程及其
前景展望
45 张红 / 法国对俄“摇摆”政策的国内外
因素探析

欧亚经济

- 82 丛晓男 / 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的经
济障碍与现实选择——基于可计算
一般均衡 GMR-CGE
112 刘文翠, 刘遵乐 / 乌兹别克斯坦汇率市
场化改革问题研究

俄苏研究

- 128 张广翔, 周嘉滢 / 冷战以来西方学者有
关 19 世纪俄国官僚史的研究: 理
论、观点和趋势
159 张玉艳, 杨恕 / 论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
的形成、发展与终结
181 赵旭黎 / 苏俄村社与贫农委员会的博弈
及其影响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 阎德学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市崇明裕安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8 年 2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8 年第 1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Юй Бинь

Спустя сто лет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Дезинтеграция 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и запад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3)

Ян Чэнсю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ерм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22)

Чжан Хун

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и внешних факторах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леба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45)

Цун Сяонан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и реалистичный выбор в сфере ССТ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союзом---на основе вычислимого общего равновесия GMR-CGE (82)

Лю Вэньцзуй, Лю Цзуньлэ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ыночной реформы обменного курс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 (112)

Чжан Гуансян, Чжоу Цзя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 време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западными учёным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бюрократов в XIX веке: теория,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нденции (128)

Чжан Юйянь, Ян Шу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развитии и упадке джадид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159)

Чжао Сюйли

Игра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й сельской общиной и комитетом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бедноты и её влияние (181)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8 年第 1 期 (双月刊)

Contents

Yu B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00 Years After—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Order and West's Identity (3)

Yang Chengxu

Germany-Russia Relationship since the World War II and its Prospects..... (22)

Zhang Hong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France's "Pendulum" Russia Policy..... (45)

Cong Xiaonan

Economic Barriers and Realistic Options of China-EAEU Free Trade Agreement: A Study based on a Calculated General Equilibrium GMR-CGE..... (82)

Liu Wencui, Liu Zunle

On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Uzbekistan Exchange Rates..... (112)

Zhang Guangxiang, Zhou Jiaying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19th Century Since the Cold War: Theories, Viewpoints and Trends (128)

Zhang Yuyan, Yang Shu

O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nd of Russian Turkic Muslim Movement..... (159)

Zhao Xuli

The Game between Soviet-Russian Rural Commune and Poor Peasant Committee and Its Influences..... (181)

专论

十月革命百年之后 ——世界秩序与西方认同的解体与重构*

于滨**

【内容提要】在十月革命过去百年之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殖民体系早已瓦解，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物质与科技优势也逐渐难以维持，此时回顾十月革命，对其历史意义的认知会变得更为清晰。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的关于民族自决与帝国主义的论述，将世界战争的根源直接指向西方所主导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主义发展到达顶峰的时刻，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革。在西方观念的建构过程中，种族主义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核，那些在西方国家内部倡导多元化的人并不愿看到真正多元化的世界。西方世界实际上在以唯我论的视角观察世界，不愿接受非基督教和非白人国家的崛起，如何维持文明的共存将成为新时代国际体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关键词】十月革命 民族自决 布尔什维主义 西方认同 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1-0003(19)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2）的阶段成果。本文译自作者于2017年11月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论文：“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00 Years After---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Order and West's Identity”

** 于滨，美国文博大（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人。

十月革命百年之后，当年那场震天动地的事件，^①已经难以在西方引发激情、力量或恐惧了。苏共已不复存在。即使在一些西方左派史学家眼中，一个世纪之前发生的那场革命也不乏极端主义的成分，^②或者说是那个“极端的年代”的组成部分。^③十月革命成为一个历史符号，或许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俄罗斯政治精英都认为，在经历了 71 年的苏维埃式的血色浪漫之后，十月革命似已成为重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一个鸡肋，而这恰恰是俄罗斯政治生活的现实。^④

百年之后十月革命的影响方式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对此不持异议。此文重点是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反帝反殖的意识形态，置于其特有的历史时代加以考察。一个初步的观察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主导的国际关系范式中，列宁（Vladimir Lenin）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的论述，更多的是集中于唯物主义的方面，而对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意见和观念的建构则涉及不多。而一个世纪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不仅仅是物质的和以实力为基础的强权政治，还有其特有的理念建构，尤其是以种族主义为内核的“文明vs.非文明”的分野。具体说，正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尤其是西方国家观念中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这其中包括对非英语的西方国家（德国）和非白种人的西化强国（日本）的歧视——为 20 世纪的展开设置了更加动荡的舞台。百年之后，西方对非西方的大规模的、直接的殖民统治已经终结，在物质和科技方面对非西方世界的优势亦难以维持。即便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西方更强调与非西方在观念和意识方面的隔阂、分离以致对抗。而在 20 世纪末，这一对抗更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⑤如果从这个物质加理念的

① John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revised edition, 2007.

② 阿隆·巴伦（Aron Baron）的朋友们将十月革命描述为“这个时代最为震动全球的事件”，参见 *Bloodstained: One Hundred Years of Leninist Counterrevolution*, AK Press, Forthcoming, 17 November 2017.

③ 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4.

④ Shaun Walker, “Tragedy or triumph? Russians agonise over how to mark 1917 revolutions”, *The Guardian*, December 17,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dec/17/russia-1917-revolutions-legacy-lenin-putin>

⑤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交叉视角，审视一个世纪以前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列宁主义对当时的国际体制和观念的冲击，那么，对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的认知，或许会更为清晰。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西方看来，不仅仅是西方历史观中大国勃兴必有一战的承传，更是一种异类文化对西方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俄国革命时代的西方主流观念与后“极端年代”（post-“age-of-extremism”）、即新千年时代的西方主流观念建构到底有多少不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布尔什维主义：“极端年代”的另一种选择

1917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永远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其直接作用，是严重破坏了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此前，俄罗斯在一战中已有 200 万人战死，500 万人受伤，其中毒气致 36.9 万人伤，5.6 万人死亡。^①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和平倡议被英法等战时盟国拒绝，又面临德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于是在 1918 年 3 月 3 日接受了极端苛刻的条件，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俄国退出一战，使德国人得以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协约国集团受到重创。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俄国退出一战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冲击。早在 1914 年使欧洲成为人间炼狱的“八月炮声”^②打响之前，列宁就发表了他那篇具有挑战性的文章《论民族自决权》。^③战争后期的局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战后的体制安排将迫使那些欧洲君主帝国及其附属进行重大的调整。

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有力论述从一开始就引起争议，其主要反对者实际上是那些来自俄罗斯和欧洲的左翼理论家和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④一个

① Jonathan Tucker, *War of Nerves: Chemical Warfare from World War I to Al-Qaeda*, New York: Pantheon, 2006, p.20.

② Barbara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③ Vladimir Lenin,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February-May 1914, Lenin’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Vol.20, pp.393-454,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4/self-det/index.htm>

④ 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 年 7 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0307.htm>

世纪之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2016年1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将列宁的民族自决构想描述为在“苏联国家体制的根基”埋下的“炸弹”；因为在列宁的理论中，苏联应该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各加盟国可以脱离苏联。^①普京总统在2017年10月的瓦尔代论坛的年度演讲中，对于十月革命给出了一个相对平衡的评价，认为十月革命的消极结果与积极结果“紧密交织”，因此，这场革命的结果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大体上是一个乌托邦的社会模式与意识形态”。^②

毋庸置疑，普京对列宁和十月革命消极结果的质疑，在苏联崩溃之后的时代不无道理。在当今的“文明冲突”时代，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无处不在，它间接或直接鼓舞和推动了世界范围的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蔓延，也促成了当前祸及西方各国的民族-民粹主义浪潮。在这个意义上，普京的观点甚至不乏某种前瞻性。事实上，正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普京竭力扭转了俄罗斯向分裂与混乱滑落的趋势，才使他在国内获得长期的高支持率。为此，西方国家把他称为新“沙皇”。^③而当他在2004年完成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大部分俄罗斯人可能都同意将这位俄罗斯领袖描述为“普京大帝”(Путин Великий)。^④从一个更加哲学化的层面来看，在十月革命发生100年之后，西方国家已经被他们自己创造的两个不相容的原则所撕裂：主权和自决。英国脱欧vs.欧盟，苏格兰vs.英国，俄罗斯vs.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问题上），伊拉克vs.库尔德人，西班牙vs.加泰罗尼亚，如此等等，无须赘述。这里，也不能够忽视特朗普主义，即“美国第一”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标志着美国正在更广泛的领域、以更激进的方式背离近

① “Vladimir Putin, speech at the Meeting of the Russian Popular Front’s (ONF) interregional forum”, January 25, 2016,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1206>; “Vladimir Putin accuses Lenin of placing a ‘time bomb’ under Rus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25, 2017.

② “Vladimir Putin’s meeting with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October 19, 2017,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5882>

③ 《经济学家》杂志写道：“当世界正在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俄罗斯又一次处于沙皇的统治之下”。可参见“Russia under Vladimir Putin: A tsar is born”, October 26,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30645-world-marks-centenary-october-revolution-russia-once-again-under-rule>

④ 普京第一任总统结束时，笔者在哈佛大学《国际评论》上撰文，首次使用“普京大帝”一词。参见 Yu Bin, “The Three Player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July 6, 2004, <http://hir.harvard.edu/article/?a=1227>

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主流思想的全球主义和自由主义。

然而，民族自决原则在当代所呈现出的各种表现形态，并非列宁本意。100年前，列宁的民族自决论的主要目标是削弱沙皇政权国家化的专制主义。事实上，列宁强调民族自决原则，使布尔什维克主义得以占据道德制高点，成为当时俄罗斯的镇压式政治体系的替代方案，而这种替代方案对于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①

不仅如此，列宁的反战言论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政策，在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欧洲也独树一帜。而此时的欧洲正在为瓜分世界进行最后的冲刺。一战爆发前的25年时间里，欧洲列强纷纷加入“瓜分非洲”的争夺之中，他们所控制的非洲领土从非洲大陆领土的10%上升到90%。^②与此同时，英国控制了近30%的非洲人口，法国为15%，德国为9%，比利时为7%，意大利为1%。^③在全球范围内，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增加了近900万平方英里（230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全球陆地面积的1/5。^④欧洲国家为争夺海外殖民地控制权所引发的仇恨，反过来加剧了他们在欧洲的对峙，并在1914年达到顶点，这四年的“总体战”（total war），使欧洲沦为人间炼狱。^⑤

在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之前几个月，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

“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

①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306.htm>；刘显忠：“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14595.html

② 参见 Vladimir Lenin, Chapter VI. “Division of the World Among The Great Powers,” in Lenin, *Imperialism*, op. ci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6/imp-hsc/ch06.htm#fwV22P254F01>

③ Camille Pecastaing, *Jihad in the Arabian Se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1.

④ Scott Joplin, “Scramble for Africa,” *New World Encyclopedia*, http://www.newworldencyclopedia.org/entry/Scramble_for_Africa

⑤ 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大约有900万士兵死亡，军队和平民的死亡人数总和约为1500-2000万人，数百万人受伤。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心理创伤实际上已经无法估量。参见 Russell Bova, *How the World Works*, 2nd ed., London: Longman, 2012, p.47

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①

1918年3月3日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是典型的城下之盟。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生存，无奈割地赔款，在领土利益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条约规定，俄国将损失25%的国土（126.7万平方公里），44%的人口（6200万），财政收入的27%，农业33%，工业54%，铁矿73%，煤矿75%，制糖业80%。不仅如此，1918年8月27日签署的补充协定中，俄国还将付给德国60亿马克的赔款。^②

然而对于西方来说，被严重削弱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比愈战愈强的德国更加危险，德国对于“旧”西方的挑战仅仅在于其实力，这种挑战能够通过更大的力量，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力量加以制衡。与之相反，布尔什维克所带来的，是思想理念上的挑战和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其目标直指西方的核心信仰体系。

例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就非常关注列宁的观点，他认为列宁的要求是直接针对西方国家国内和国外广大贫困的工人阶级的，甚至“就连那些无知的和有精神缺陷的人，他们也都被要求成为主人。在我看来，在目前社会动荡遍及世界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③对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来说，列宁对于被压迫人民自决的呼吁，使得威尔逊关于欧洲的战后安排议程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帝国崩溃的灰烬中衍生的无数弱小民族的政治实体来说。威尔逊关于战后欧洲的自由主义议程（14点原则）中关于自决的理念在多大程度上“窃取了列宁的功劳”是存有争议的。^④然而美国是这场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中唯一赢家，美国的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左右那些土崩瓦解的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他们在非洲、中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的政治轨迹。1918年1月8日，威尔逊的14点原

① Vladimir Ilyich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etrograd, mid-1917),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6/imp-hsc/pref02.htm>

② 参见李万先：《俄国史》（下卷），台北：台北编译馆，1969年，第433页。

③ Lloyd Gardner, Walter LaFeber and Thomas McCormick,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mpire, vol. 2: U.S. Diplomatic History Since 1893*,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6, p.336.

④ Oliver Stone and Peter Kuznick,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Gallery Books, 2012, p. 27.

则正式发表，这一天也被称为“威尔逊时刻”（The Wilson Moment）。^① 威尔逊承诺要为一个饱经磨难的世界带来一个开放、自由、反帝国主义的和平计划。这个计划是由一系列诱人的原则组成的，包括自决、裁军、自由贸易、集体安全（国际联盟）等等。一时间，威尔逊似乎赢得了大众的支持。正如H.G·威尔斯（H.G. Wells）所说：

“在一段时间内，威尔逊一个人就是人类精神，或者说至少是人类精神的代表。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人民对于他的计划给予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回应。全人类都热切地接受了威尔逊的观点，并对威尔逊大加颂扬——无论是他的话语还是他的手势。他们把他视为一种象征。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已经变了，他不再是一位普通的政治家，他成了弥赛亚。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相信他是能够带来无尽福音的使者；数以千计的人们愿意为他而死。人们对于威尔逊计划的热情回应成了 20 世纪初全球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看上去已经孕育多年的世界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在母体里搅动。它活了。”^②

尽管威尔逊主义最初广受欢迎，但与布尔什维克激进的民族自决的方案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布尔什维克的解决方案直指帝国主义战争与世界殖民主义瓜分世界的根源，即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后阶段的金融资本要攫取更大的利益。列宁号召以世界革命来推翻整个帝国主义体系。^③在巴黎，那些曾被威尔逊主义所鼓舞、但后来却倍感失望的人们很快转向了布尔什维主义，其中包括来自越南的 28 岁青年胡志明（Ho Chi Minh），他在巴黎目睹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失败，战胜国仍根据旧的实力统治的游戏规则重新分赃，威尔逊主义不过是昙花一现。

由于其全面的反战和反资本主义的行为与言论，布尔什维克必须被“扼

①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H.G. Wells,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cited from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

③ Ibid.

杀在摇篮里”，据说这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观点。^①从 1918 年 7 月开始，16 个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派出数十万军队干预俄国内战（1918–1922 年），支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军并重新建立东线战场。这些干预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四个月就已经开始了。

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协约国）的破坏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但很难说是致命的。从更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十月革命导致了一个全新的两极国际体系的建立。在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实体相互制衡，并基本相互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军控协议，确保相互摧毁原则构成了系统性和战略性稳定的基石，相较于战乱不已的 20 世纪上半叶，这一体系使世界保持了一种“长和平”（long peace）。^②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体制失去了这种“内在”平衡的机制，奉行自由干涉主义的西方国家将在世界各地无休止的干预，造就了大量的失败国家和无序无法之地，宗教极端主义（ISIS 等等）横行。而来自混乱的非西方国家的无数难民，又造成西方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建制力量的强烈反弹，成为压垮战后西方自由体制的最后的稻草。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失去内部制衡的西方国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制造了一个愤怒与迷失方向的一代。相比之下，那个被称为“长和平”的冷战时期似乎更为可取、更为稳定、也更可预测。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发生了什么，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都不应该被低估。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承认，尽管俄罗斯社会为十月革命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为巩固这场革命所创建的体制付出的代价尤为沉重，但十月革命仍是“推动全球变革的强大动力”。^③

① 丘吉尔的动机很有可能是经济原因，如果沙皇能够重新掌权，俄罗斯就能够偿还欠英国银行的债务。参见“Bolshevism "strangled in its cradle"”，<https://www.alternatehistory.com/forum/threads/bolshevism-strangled-in-its-cradle.108117/>

②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86.

③ “Vladimir Putin’s meeting with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October 19, 2017,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588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局限

列宁彻底的反战、反帝、反殖的论点，将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列强之间的战争与西方国家在广大殖民地的争夺联系在一起，为对一战的解说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这与西方关于一战成因的其他理论解释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理论包括“突发事件”（暗杀）对战争起因的影响、多极世界内在的不稳定特性^①、军事技术进步的作用^②、各国军方对进攻性战略的痴迷^③、联盟机制的连锁效应导致战争在1914年夏一发而不可收，等等。^④当然，一战百年之后，总有人事后诸葛亮，宣称这是一场没人想要参加，也没有预料到会发生的战争。按照《大西洋》杂志一战百年之后的说法，“‘一战’是一场只有食肉动物才会进行的毫无理由地屠杀自己同类的疯狂行为”。^⑤事实上，无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如何，对于这场毫无意义的野蛮战争，布尔什维克政权选择退出，这一举动比那些不能、不会、不敢停止杀戮或者被杀戮的“文明”国家，都要更加人道和理性。

世界上也许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完全解释这场战争，包括列宁的观点在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一元论，并未涉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观念建构，尤其是该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以种族为基础的等级观念。

19世纪初末 20世纪初是西方殖民主义发展的顶峰，印度出生的英国诗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9, pp.168-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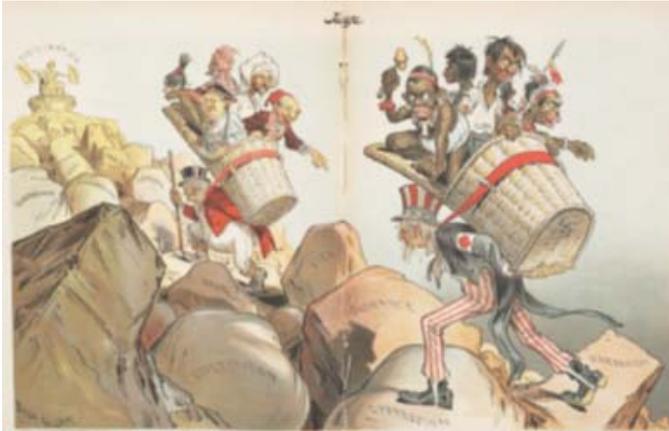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许多现代武器，包括坦克、飞机、长距离和大口径火炮，巨型战舰，以及最重要的毒气。很多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是“技术战争”的起点。参见 Michael Howard,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 7.

③ 参见 Jack Snyd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and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oth in Steven E. Miller, Ed.,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④ Scott Sagan, “1914 Revisited: Allies, Offense,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6, Vol.11, No.2, pp.151-175.

⑤ Burt Solomon, “The Tragic Futility of World War I”, *The Atlantic*, July 27, 20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4/07/world-war-i-tragic-futility/375103/>

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出版了他的作品《白人的负担》，^①以抒发作者对于美国殖民菲律宾（1899-1902年）的百感交集的心态。在吉卜林看来，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美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便把那些“半人半鬼”的“郁闷的侏儒们”提升到“文明”的水平。



① Rudyard Kipling, “The White Man’s Burden” (1899),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https://sourcebooks.fordham.edu/mod/Kipling.asp>



图 1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殖民主义漫画

图片来源: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civilization-barbarism-the-white-mans-burden-n-1898-1902/5461424>;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white+man%27s+burden,+paintings&tbm>

然而，对于这些使有色人种文明化的“任务”，只有说英语的西方国家之间才能“分担责任”。作为瓜分非洲的盛宴的后来者，德国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外交、军事甚至种族灭绝——来积极扩大它在欧洲之外的殖民地。结果，到世纪之交时，德国已经成为非洲的第三大殖民国家，拥有了 260 万平方公里的帝国版图和 1400 万殖民地人口，其中的大部分都集中于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和坦噶尼喀这些德属殖民地。^①在此之后的 31 年里（1914-1945 年），世界为战火所吞噬，^②而这通常被归咎于德国力量的增长。然而与德国在欧洲内外不断提升的物质优势相比，德国的行为的动因也许更多地是来自于其扭曲的观念，即民族主义转向纳粹主义。在这一点上，

① 德国于 19 世纪 80 年代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开始了全球扩张，它实际上是在被称为“世界政策”的泛德意志主义驱动下进行的。为了争夺非洲，俾斯麦倡议召开了 1884—1885 年的柏林会议。在 1904 年法国与英国签订英法协约之后，德国在 1905 年试图检验他们联盟的可靠性，从而引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参见 Scott Joplin, “Scramble for Africa”, http://www.newworldencyclopedia.org/entry/Scramble_for_Africa

② 西方史学界常把一战和二战视为一场世界之战，都是围绕所谓“德国问题”（the German problem），不过是中间有 20 年的“中场休息”（intermission）参见 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per Perennial; 450th ed., 1964); Hobsbawm, *Age of Extremes*, p.22.

西方世界针对西方内部的非英语国家的“内部歧视”，直接加剧了新老西方国家在欧洲内外的激烈竞争。在凡尔赛，威尔逊甚至没有掩饰自己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新领导人的骄傲与偏见：

“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特殊的才能，为人类的正义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满怀信心地希望，国际联盟将由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主导，这毫无疑问将有利于世界。”^①

列强之间的种族不平等，也是日本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急剧膨胀的催化剂。日本在凡尔赛和会上提出“种族平等”的动议，希望日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能够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但西方民主国家在凡尔赛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的“普世主义”，而西方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日本人提出的建议，在西方看来，日本仅仅是为了“获得荣誉白人的地位而已”。^②殊不知，“荣誉白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想的体现。在拒绝日本关于种族平等的条款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因为担心这会导致日本拒绝参加国际联盟，最终对日本提出的获得中国山东的要求做出让步，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而这样做又公然违背了威尔逊自己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西方理想主义倡导平等、自决的原则，但在种族和权力问题上却口惠而实不至，西方虚伪的自由主义，开启了亚洲民族主义的闸门。在日本，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使大正民主制度逐渐走上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最终引发了一场比欧洲的“总体战”（“total war”，1914-1918年）规模更大、延续时间更长、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二战始于亚洲又终于亚洲（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球化战争。

无独有偶，凡尔赛和会前后西方理想主义的伪善——自由主义为表，种族主义为里——也严重冲击了中国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顶礼膜拜。这使得满清王朝覆灭后中国对于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追求，从反对传统儒家

^① Arthur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American Diplomacy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New York: W.W.Norton & Co Inc., 1986, p.313.

^② 出席凡尔赛和会的日本代表团试图在国际联盟的盟约中加入这样的表述，即“国际联盟成员国在所有国家的侨民都能够根据法律和事实受到平等而公平的对待，而不会因为他们的种族或国籍而有差别”，参见 Kenneth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Public Affairs, 2008, pp.154-158.

思想急剧转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1919年6月23日，尽管中国表示抗议，但《凡尔赛条约》仍然正式签署。一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①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一整套全新的理念，而这与那些曾经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日益空洞的西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完全不同。当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并迅速蔓延到中国20个省份的一百多个城市。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的历史由此改写。

百年后回首十月革命，当年使世界为之震撼的，或许并不是年轻且极其虚弱的苏俄政权所拥有的实际力量，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当时连生存都很困难。而列宁主义和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新颖和激进理念，却是十月革命对国际体制及其观念最强有力和更为持久的冲击，这与那些精心构建、却从未兑现、更无法实现的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威尔逊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鉴于此，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是历史上的重要拐点。

西方观念的建构：过去与现在

在十月革命过去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戴维·莱克（David Lake）教授将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描述为一个“白人”统治的学科，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是一群相对同质化的个体（68%为男性，85%是白人）。^②西方国际关系“掌门人”的这一“忏悔”，主要针对现存的政治学体制。^③和一

① 1919年7月25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夫·加拉罕签署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也被称为《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这份大胆的官方声明令中国感到震惊，在声明中“苏维埃政府放弃沙俄政府在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夺得的一切。让这些地区的人民自己决定希望居住在哪国国家，以及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什么形式的政府……”《第一次加拉罕宣言》的英文版参见 Jane Degras (ed.),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158-161; web “China’s External Relations – A History”, <http://www.chinaforeignrelations.net/node/243>

② David Lake, “White Man’s IR: An Intellectual Confess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December 2016, Vol.14, No.4, pp.1112-1122.

③ 莱克的这篇文章是2016年提交给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召开的主题为“Diversity, Inclusion and Marginalization: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学术会议会议论文。

百年前相比，该体制似乎变化很大，但好像又万变不离其宗。

一个世纪前，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美国政治学正处于草创阶段，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的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把美国政治学学科美誉为白人“种族的宝贵财产”。一战爆发前几年，美国第一份国际关系杂志竟然取名为《种族发展杂志》（*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1910 年创刊）。斯坦利·霍尔是美国第一位专门从事种族理论和儿童发展问题研究的心理学家，也是这份美国第一本国际关系杂志的共同创始人。直到 1919 年，杂志才更名为《国际关系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22 年再次更名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齐默恩（Lord Zimmern）甚至说：种族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也是“这个世界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对于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所谓的“白种人的负担”，是对于那些衰朽的欧洲殖民大国而言，但对于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来说，则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甚至是颇为高尚的使命。为此，当时美国的国际关系杂志《种族发展杂志》就这一时期研究中的首要问题发表的引领性文章指出，美国“与欧洲大国一样，最根本的利益在于如何处理那些文明欠发达种族的问题”，这是因为“美国过去 75 年历史的关键，就是继续为黑人问题寻找解决办法——而这个问题尚未解决”。^①

无论在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世界的观念中，还是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种族因素都处于中心地位；不管这是作为老旧的西方国家的负担，还是作为年轻的美国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许是现代与当代国际秩序最为恒常的特点，也是美国对外政策实施过程中最为持久的特征。事实上，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认为，“种族等级”是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三大中心支柱之一，^②这是列宁以经济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一种观念建构。

① 关于 20 世纪早期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详细介绍，参见 Robert Vitalis, Ch.7, “Birth of a Discipline”, in David Long and Brian Schmidt, eds.,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5, pp.159-181

② 迈克尔·亨特认为“种族等级”也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三大支柱之一，参见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当前,美国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学科已经几乎找不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那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痕迹了。事实上,直到二战结束,来自欧洲的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政治现实主义嵌入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美国国际关系学科才得以“重新做人”。此后,美国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学者不断完善研究方法,孜孜以求理论的简洁性(parsimony),且日益依赖抽象的数学运算。对于在美国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中曾经无处不在的种族因素则刻意回避。^①然而,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并不彻底,历史从未也不可能终结。比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②其核心主题与哈佛学者罗斯洛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1920年出版的《有色人种的崛起浪潮:对白种人世界霸权的威胁》非常相似。斯托达德还因其撰写美国“软实力”的文章而闻名,这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2004年所写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的主题非常相似。^③亨廷顿的现实主义警告西方国家同非西方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奈的自由主义的目标则是以美国的模式塑造世界。二者均无意也无法与一个多元的世界共存。事实上,奈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即他强烈地坚持认为,美国除了领导世界别无他择。^④甚至在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样的现实主义者看来,美国也只能在经营一个帝国或者担任世界领袖之间做出选择^⑤,即美国不可能不主导世界,即便他对自由干涉主义认为美国是世界“不可或缺的领袖”的理念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⑥

进入 21 世纪,对西方世界最大的挑战也许就是中国的崛起。根据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稳步崛起的中国无论做什么,与西方都“必有一战”。^⑦公平地说,

① Vitalis, op cit., p.160.

② Huntington, 1993, op cit.

③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2004.

④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⑤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p.17.

⑥ Madeleine Albright, interview by NBC's Today Show (February 19, 1998).

⑦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MH, 2017.

艾利森的《陷阱》一书与百年前那些赤裸裸的白人至上论者的国际关系著作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然而，该书大胆而具有挑衅性的标题使该书迅速蹿红，由此引发的西方对于中国的恐惧心理也是他始料不及的。事实上，《纽约客》杂志也将艾利森的《陷阱》一书视为“最糟糕的一堆”书籍之一，认为他与其他一些人的作品是在煽动对中国的战争。^①当西方的现实主义者（艾利森等人）认为最坏的事情——中国取代美国的地位——还没有发生时，像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这样的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就已经宣称，由于中国这样异质性大国的崛起，西方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终结。^②中西之间的零和式的游戏规则，似已成为西方自我实现的预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西方国家内部和西方世界中倡导多元化的人们，其实并不喜欢看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观念上更加多元化的世界。戴维·莱克作为美国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人，倡导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实行“多元化”，但却与其他自由主义学者同样，认为只有中国建立起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缓解中国崛起过程中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然而这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比让当年的日本和德国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可能性还小，而德日最后以战争的方式对当时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③在2016年疯狂的总统竞选期间，美国民主党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多元化和多边主义的平台。然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却宣称，她不希望她的孙辈生活在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世界中。^④

① Ian Buruma, “A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aded for War? Professors, pundits, and journalists weigh in on a heated topic”, *The New Yorker*, June 19, 2017 issue,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06/19/are-china-and-the-united-states-headed-for-war>

② Youtube, “Niall Ferguson versus Fareed Zakaria: Is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Ov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GxnlU94hQ>; <http://www.munkdebates.com/debates/future-of-geopolitics>

③ David Lake, “The Challenge: The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Rivalr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forthcoming), <http://quote.ucsd.edu/lake/files/2014/02/Lake-ISP-revised.pdf>

④ Ollie Gillman, “Hillary Clinton does not want her grandchildren to live in a world dominated by the Chinese’ as Obama warns of future ‘conflict’ with Beijing”, *Daily Mail*, 10 March 2016,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486042/Hillary-Clinton-does-not-want-grandchildren-live-world-dominated-Chinese-Obama-warns-future-conflict-Beijing.html>

结论：两种文明身份的不同叙事

一百年前，列宁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力批判，为俄国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无论这两个大国之间后来发生了什么，列宁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政策的持久影响应置于适当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评估：也就是说，他们既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也未能超越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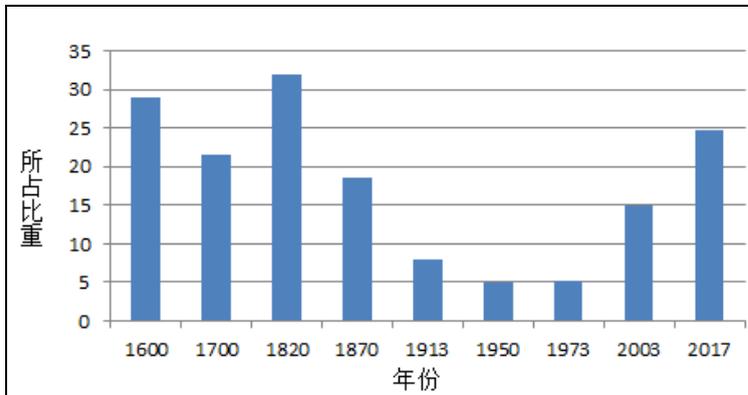


图2 1600-2017年中国占世界GDP比重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资料来源：“List of regions by past GDP (PPP)”,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regions_by_past_GDP_%28PPP%29; KNOEM, World GDP, <https://knoema.com/sxesqmf/world-gdp>

列宁主义的历史作用还有待俄罗斯政治精英和民众将其放在今日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来评定。马克思主义在广义上的经济决定论，特别是列宁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帝国主义发展的理论，并未涉及西方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其在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强大而持久的种族因素。因为同样的原因，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内的西方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7-19世纪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代那样选择领土扩张，或在世界其他地区征战和殖民。

在西方国家的集体意识和观念建构中，非基督教、非民主、非白人政权的中国走上崛起之路，既是不可解释的，又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它一定是不

可预测的，甚至是危险的。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在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地寻找他们视为普世真理的那些人类和社会发展神奇线索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建构了一个唯我论的理论视角，因为他们仅仅是在以西方视角观察其他国家，全然没有意识到世界比他们的视觉所及要大得多。他们更无法理解中国内政外交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哲学基础，即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相反，西方理论和政策坚持认为只有同质化个体才能联合，因为同质性所以联合，为了同质性而联合。因此，北约成员国必须是民主国家，欧盟成员国必须是欧洲国家，基督教国家——也许甚至要求必须是白人国家。^①

最后，我们有必要注意吉卜林那句著名的诗，“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②在历史上，当中国处于权力巅峰时，一个强大的中国能够与其他大国及其邻国并存，而现在中国也正在寻求与其他这些大国的共处之道。西方国家愿意接受并且能够给予积极的回应吗？无论发生什么事，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时代，如果文明之间不能共存，任何替代方案都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其后果将远远超过 20 世纪那两场延续了 31 年（1914-1945 年）的腥风血雨的总体战。

（封帅 译）

【Abstract】 A century aft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the West-dominated colonial system has long collapsed. Their materialist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over non-western world become unsustainable. It is just the time that we look back into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have a much clearer perception of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arguments of Lenin and Bolshevism on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imperialism, the world war was directly related with the West-dominated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 system.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colonialism reached its peak, it challenged the West-dominat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deology in all directions, pushing forwar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When constructing Western ideas, racism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re of its ideology. As a matter of fact, those

① 例如，尽管作为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一再要求，但却从未获得完全的欧盟成员国资格。

② Rudyard Kipling, “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 1889, <http://www.bartleby.com/246/1129.html/>

who advocate pluralism in Western countries do not want to see a truly pluralistic world. The West actually observes the world from a self-centered perspective and is unwilling to accept the rise of non-Christian and non-white nations. How to maintain the coexistence of civilizations will be a major challen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Bolshevism, West's Identity, Rac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Через сто лет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которой доминировали западные страны, уже давно распалась, а её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ля незападного мир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трудне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вспоминая Октябрь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мы всё более я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её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Аргументы Ленина 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и 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е прямо указывают на коренные причины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кроющиеся в возглавляемых Западом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и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системах. В конце XIX в. - начале XX в., когда развитие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достигло своего пика, возглавляемый Запад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и идеология натолкнулись на всесторонние вызовы, что эффективн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реформ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Расизм представлял собой важное ядро в процесс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деологии Запада, те, кто выступал за плюрализм в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ах, не желал виде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люр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мира. Запад смотрит на мир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липсизма, не хочет принимать подъём не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и неевропеидных народов,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различн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стало серьёз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новой эр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 большевизм, запад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асизм

(责任编辑 李恪)

大国关系

二战后德俄关系发展历程及其前景展望*

杨成绪**

【内容提要】德国与俄罗斯两个地理上接近的欧洲大国，都曾处于欧洲重大事件的中心，都对欧洲大陆和世界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二战后，虽然德俄在一些问题上始终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分歧，但德国历届政府总体上力求与俄罗斯和平共处，致力于构建务实友好的伙伴关系。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德俄关系处于新的十字路口，面临新的选择。

【关键词】 俄德关系 俄罗斯外交 德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1-0022
(23)

德国与俄罗斯两个地理上接近的欧洲大国，在长达千余年的相互交往中都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记，在欧洲历史文明长河中尤为独特。广义上的德俄关系曾在四百年里构成了欧洲安全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可以说，德俄两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处于欧洲重大事件的中心，都对欧洲大陆和世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德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未来趋势走向值得我们关注。

二战之前的德国和俄罗斯关系经历了漫长且波动的发展历程，既有互利了解、和平共处、紧密合作的一面，也有不少相互争斗、兵戎相见的复杂经

*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部分内容和俄文材料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万青松副研究员的宝贵帮助，特此表达感谢！

**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所长、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① Dederichs M. R., „Gemeinsame Geschichte: Deutsche und Russen“, *Der neue Flirt/Klaus Liedtke (Hrsg.)*, Hamburg, 1989, S.200-201.

历。早在 11 世纪中叶，两国的王公贵族就开始联姻，开启两国在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德俄之间发生的最早冲突是 1241 年的条顿骑士团战役。此后，两国之间的交往受到较大影响。从 17 世纪开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俄国之间关系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罗曼洛夫王朝的“德国化”（王朝家族的联姻，大批德国专家、移民进入俄国权力机构），军事合作强化，贸易联系不断拓展，技术与文化合作增多。^①然而，1871 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再次改变了两国关系。1907 年，英法俄三国签署三国协约，德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遂成敌人。战败后的德国，经过曲折的发展，最终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建立起个人独裁和一党专制的德意志第三帝国。1939 年 8 月 23 日，纳粹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秘密协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随后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 年 6 月 22 日，纳粹德国撕毁条约，对苏联发动猛烈进攻，苏德战争爆发，由此开启两国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对整个欧洲和世界都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一、二战后的德俄关系：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合作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惨败，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美国在二战期间就力主分割德国。战后，苏、美、英、法四国通过分区占领，成为处置战败德国的一种形式。1945 年 6 月 5 日，四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在柏林正式声明把德国分成四个部分，东区归苏、西北区归英、西南区归美、西区归法，“大柏林”区则由四国共同占领。声明还规定由四国总司令正式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同年 7 月中旬起，四大国在德国和柏林按划定区域实行占领和管制。1949 年 9 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美、英、法占领区宣告成立，同年 10 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成立，由此，在原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国。此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争博弈加剧，使得处于两大国之间的德国也处于美苏冷战阴影之下，对其内外政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 Павлов Н.В. Россия и Германия: несостоявшийся альянс (история с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7. С.50.

（一）阿登纳执政时期：力主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早在二战后初期，美军就任命德国知名政治家阿登纳为科隆市长，旨在改善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消除相互之间的疑虑，逐步把德国建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还力图保持西部德国的政治稳定，积极推动经济发展，逐步迈向经济强国，在欧洲国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政治影响。联邦德国成立之后，经过第一次大选，亲美、保守的 72 岁的阿登纳出任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阿登纳作为战后西德第一位国家领导人并不令人意外。早在魏玛时代，他就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希特勒统治时期，阿登纳作为科隆市长，受到纳粹政权的迫害，曾被捕入狱。德国战败后的次年（1946 年），阿登纳创建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并通过基民盟基社盟（以下简称“联盟党”^①）和自民党、德意志党两个小党联合执政，而不与实力相当的“社民党”^②组成大联合政府，开启了德国大小党联合执政的政治局面。此后，1953 年、1957 年和 1961 年，这一政党联合在全国大选中连续获胜，阿登纳四度出任德国总理，也使得大小党联合执政局面从 1949 到 1963 年维持了 14 年。

阿登纳执政初期，随着战后美苏冷战加剧，美国逐渐认识到，削弱西德的经济，不利于与苏联抗争。与此同时，大规模拆毁德国工业引起德国人民的极度不满，他们不断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西方这一做法。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于 1946 年 9 月在斯图加特发表公开讲话表示，美国不再奉行“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虚弱的德国”的政策。贝尔纳斯声明，“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如果这一巨大的工业的德国，变为贫民窟，欧洲的重建，特别是邻国的重建将会十分缓慢。”^③阿登纳本人也主张“面对德国，它所有的

① 联盟党是德国最大政党。从 1949 年到 2013 年在这 54 年中，基本上保持 40% 以上的选民支持率，只是在 1998 年到 2009 年下降到 35% 左右。联盟党在以往 18 年大选中，有 12 次胜出，作为主要执政党主持国家事务。联盟党主政 12 届政府，在这 48 年中，阿登纳、科尔和默克尔成为三位任期最长的总理。

② 社民党是德国第二大政党。在以往 18 次大选中，胜率低于联盟党。社民党作为最大执政党，先后执政 6 次，1969、1972、1976 和 1980 年，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 4 次。1998 年和 2002 年和绿党联合执政两次，而近年来，2005 年和 2013 年两次作为联盟党的伙伴，组成大联合政府。

③ [德] 卡尔·哈达赫著：《20 世纪德国经济史》，扬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94、108 页。

战争对手无不异常强烈地要求安全，有必要寻求一条道路，它既能考虑欧洲的安全需要，又能使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得以重建。”^①

在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关系逐步正常化的情况下，阿登纳开始重视与苏联的关系。1955年9月8日到14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和外交部长勃伦塔诺一行正式访问苏联。根据苏德两国事先交换的照会和谈判，双方各自理解此行的目的是：（1）建立外交关系；（2）讨论实现德国统一的原则和方针；（3）德国要求苏联释放目前正在苏联服刑的万余名战俘和非军事人员。苏联方面主要的谈判成员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阿登纳总理在谈判一开始，就要求苏联释放德国战俘和非军事人员，这个问题如不能解决，两国就不可能就建立外交关系达成协议。在涉及德国统一问题上，苏德双方更是尖锐对立，断难寻求到共同点。苏联坚持要通过美苏英法四大国的谈判，采取措施，争取早日实现德国统一。西德则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主张要按照西德的意志实现统一。苏联对此断然否决，强调东德、西德都是主权独立国家，应该由东西两个国家通过谈判，根据人民的意愿，实现和平统一。由于苏德双方在谈判中互不相让，谈判中断。在阿登纳访问苏联之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致函阿登纳表示，相信苏联政策有所改变，因为苏联难以承担和西方国家开展军备竞赛的负担。面对西方国家的团结不断加强，苏联决定采取新的政策，谋求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阿登纳在访问苏联之前，对苏联的看法，显然要比杜勒斯悲观一点。^②双方在无数次语言激烈交锋之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

① [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3-275页。

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登纳与苏联领导人多次交谈中，特别是在私下交换意见中，发现赫鲁晓夫多次谈到中国问题。赫鲁晓夫一再强调，“赤色中国将如何发展，令苏联感到担忧。”赫鲁晓夫谈到，“这个国家拥有6亿以上的人口，每年还要增加1200万的人口。这些中国人靠一把米过活，这该发展到什么地步呢？”最后赫鲁晓夫当面向阿登纳提出，要西德帮助苏联，对付赤色中国。阿登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赫鲁晓夫相当突然地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您帮助我们。您帮助我们对付赤色中国吧！他还犹豫地补充说：“并且对付美国人”。阿登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要求帮助的请求，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曾提过三次。我不接受这个请求。我很清楚，这样做将是对欧洲和美国不守信义，并且在这个时期以及在没有同其余自由世界取得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就去帮助俄国人，无非是把头伸到狮子的口里去。”参见[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二卷），第625-626页。

宁口头承诺释放这些德国人。德方要求苏联做出书面声明，遭到拒绝，德方未再坚持，双方各自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1955年，苏德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57年，在战后西德第三次全国大选中，联盟党获得50%的支持率，创造了该党在大选中的新纪录。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西德战后经济恢复迅速，外交上取得美国的信任，加强和法国的关系，同时成功地建立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二）勃兰特执政时期：推行“新东方政策”，继续发展对苏关系

1966年，德国发生财政危机，一向被誉为“战后创建德国市场经济之父”的时任总理艾哈德，此时也难有作为。执政的联盟党不得不和蒸蒸日上的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由基民盟的基辛格出任总理，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出任外交部长。这是战后社民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勃兰特力主推行“新东方政策”，提出“大联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善同‘东方’的关系，并尽可能使之正常化。”^①勃兰特推行的“新东方政策”，旨在继续缓和与苏联的对抗，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1969年德国第五次大选后，获胜的社民党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由勃兰特出任总理，他一如既往地积极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谋求与波兰等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在勃兰特看来，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德国开展积极外交，谋求德国在世界上的一席之地。他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发展有四大特点：其一，最为重要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维持威慑均衡，为德国提供了活动余地；^②其二，美法矛盾加剧，法国总统戴高乐1959年撤回法国地中海舰队。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法国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紧张。^③其三，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支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美国是否真正愿意欧洲具有独立的意志，欧洲人并没有完全的把握。^④其四，苏联对中国的忧虑大于对西方国家的忧虑。赫鲁晓夫寄希望于西方国家认真对付中国的“威胁”。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就直接告诉勃兰特：“中国是俄国的主要忧虑，

① [德]维利·勃兰特著《会见与思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8页。

② 同上，第133页。

③ 同上，第134页。

④ 同上。

现在这种忧虑超过俄国对德国的忧虑”。^①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形势下，勃兰特决定放弃哈尔斯坦主义，将发展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关系放在他的外交政策首位。

勃兰特面对东西方相对缓和的时机，积极推动与苏联、东德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关系。期间，联邦德国首先于 1970 年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双方保证战后欧洲边界不可侵犯，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承担不以武力相威胁和不使用武力的义务。随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 1972 年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实现了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1973 年，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勃兰特谋求与苏联东欧缓和相互关系，在国内外影响日益上升，但好景不长，勃兰特身边的秘书纪尧姆被揭露为东德间谍。1974 年，勃兰特引咎辞职，继任者为原财政部长施密特。不少德国媒体分析，揭露勃兰特秘书纪尧姆系东德间谍，只是勃兰特下台的导火线。实际上是德国企业界对勃兰特的经济、税收政策不满，认为这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利。勃兰特下台后，选择社民党右翼分子施密特出任总理。施密特曾批评勃兰特过于“左倾”，没有正确处理社民党与教会和中产阶级的关系。施密特取代勃兰特出任总理，显然是为了平息社会对社民党在勃兰特领导下推行左倾路线的不满。

（三）施密特执政时期：重视中美苏大三角变化，坚决反对苏联部署导弹威胁德国安全

1974 年，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在此之前，他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施密特不仅是政治家、国家领导人，还是著名的政论家，他著书撰文论述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目光尖锐，深刻分析了中美苏三国关系的特点。在他执政期间，中美苏三角关系正处在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变化之中。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改变了中苏同盟共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战略态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实力受到削弱。苏联担心中美接近，忧虑美欧加强关系，使苏联处于不利地位。施密特还判断，中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有利于德国争取同苏联缓和关系。施密特密切注视中美关系发展，对德

^① [德] 维利·勃兰特著《会见与思考》，第 143 页。

国而言，中美接近不应给加强美欧关系和改善与苏联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出发，施密特着重指出，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只顾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而忽视欧洲的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他也高度评价美国作为欧洲的盟国，为维护美欧关系、确保欧洲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对中德关系，两国建交后，施密特总理是第一个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个与毛泽东主席进行晤谈的德国领导人。施密特高度评价中国的作用，预言中国是“明日世界的赢家”，充分肯定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改革开放成就。

施密特深知，中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的加剧，有利于德国争取同苏联缓和关系。与勃列日涅夫打交道，中苏关系也是难以回避的话题。在施密特的回忆录中，他谈到勃列日涅夫花了很多时间在他面前数落中国，同时对施密特即将访问中国持十分怀疑的态度。施密特访华后，他得出的印象是，“中苏两国互不信任，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北京相信可以估计苏联的态度，而莫斯科感到它要解的方程式中有太多的未知数。”1977年施密特访问美国，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布氏主张美欧应当向北京出售武器，这将促使中国和苏联关系更加紧张，并将中国纳入美国的政策。这一主张遭到施密特的坚决反对，后来欧洲国家成功地劝说卡特总统放弃了这一主张。

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迅速生产和部署了新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被称作SS20的中程导弹，每枚运载3个核弹头，可同时摧毁三个城市，虽然只具备中等射程，打击不到美国本土目标，但能击中欧洲，特别是西德的目标。施密特多次要求美国总统卡特将这种新型杀伤性武器纳入美国同苏联正在进行的军备限制谈判（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由于SS20导弹不对美国构成“战略性”的直接威胁，因此美国的态度并不积极。相反，这种导弹能够摧毁德国所有城市，给苏联提供了对德进行政治威胁和逼迫的工具。

施密特和卡特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在他看来，苏联部署SS20导弹主要是针对联邦德国，美国不愿意就限制中程核武器和苏联谈判。美国在欧洲部署了一部分核武器，如果与苏联谈判，这些核武器也有可能被纳入到谈判的范畴之内。美国始终认为，与苏联之间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限制战略核武器。美苏如果就中程核武器进行谈判，势必影响两国的战略核武器谈判。

1979年，美英法德四国首脑在法国瓜德罗普岛举行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北约双重决议”。会上英国首相卡拉汉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先后发言，主张西方国家应该首先同苏联就限制中程核导弹进行谈判。这个意见过去一直遭到卡特总统的拒绝。为缓和这一矛盾，吉斯卡尔建议先谈判，但有一个原则，即假如四年后谈判无果，西方就应追加军备。这一主张得到与会美德英三国领导人的同意。后来，与苏联的谈判果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西方国家决定自1983年起追加军备。四年后，苏联也面临着西方国家加强军备的威胁，苏联被迫让步，最终达成中程核武器条约。

施密特接触的苏联领导人中，最为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1974年10月，施密特访问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施密特主张发展德苏之间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通过与勃列日涅夫的交谈，让后者对联邦德国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安全政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然而，从1976年起，苏联加速扩充SS20导弹，使得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局面又出现了裂痕。

（四）科尔执政时期：与苏谈判实现德国统一，弱化北约东扩

1982年10月11日，赫尔穆特·科尔通过不信任投票，战胜执政的社民党总理施密特当选新一届总理。科尔于1983、1987、1990和1994年，四次在大选中获胜，历任总理15年，是继俾斯麦之后任期最长的德国总理。在执政期间，科尔实现了西德和东德统一，被称为“统一总理”。

科尔出任总理时，正逢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一方面，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陷入战争泥淖，国力不断衰弱。德国联盟党一向亲美，为了对付处于守势的苏联，德美关系不断强化。另一方面，民主德国政局动荡，逃亡成风，祸及匈牙利。1989年，民主德国政局开始动荡，政府倒台和柏林墙倒塌，其最初的缘由是民主德国老百姓纷纷通过各种途径，逃往联邦德国。而造成这一逃亡潮的起爆点，则是匈牙利和奥地利所采取的措施。德国总理科尔曾在《我要的是德国统一》（*Auf dem Weg zur deutschen Einheit*）一书中说道，“1989年5月3日，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开始在边境地区拆除障碍设施，同年的7月28日，匈牙利外交部长格乌拉·霍恩和他的奥地

利同僚阿罗依思·穆克在世人的注视下象征性地剪断了铁丝网。这两件事大大地推动了匈牙利的改革进程，……正是这个改革进程的最终结果导致德国的统一”。^①匈牙利的做法无疑是先和联邦德国秘密磋商后确定的对策。当时民主德国旅游者通过匈奥边境涌向位于维也纳梅特涅大街的联邦德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申请联邦德国入境签证。这就爆发了民主德国老百姓大规模的逃亡，成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此后，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内梅特·米克洛什要求与科尔总理进行绝对秘密的会晤。8月25日，内梅特在波恩会晤科尔时，强调匈牙利将始终为民主德国开放边境，让所有德国人在9月中旬之前走出去。对此，科尔本人曾多次问内梅特，匈牙利是否期望德国给予回报。但内梅特每次都挥手否定，说：“匈牙利不贩卖人口。”联邦政府还是答应给这个国家5亿德国马克的贷款，这是已经谈判了较长时间的一笔贷款。此外，波恩表示对匈牙利人进入德国免签，向布达佩斯保证将在该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时给予支持。匈牙利这一行动对德国统一的早日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在上述东欧剧变形势下，科尔发表了有关德国统一的声明，强调：“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自由和统一的欧洲建立自由和统一的德国。”同年11月，科尔亲自草拟并宣布了重新统一德国的“10点计划”。十点纲领发表后，正在陪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立即发表谈话，强调战后形成的边境的不可侵犯性，两个德国是现实的存在，而实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将打破欧洲目前稳定的局面。由于德国加快推进统一进程，苏联的反对也引起不少欧洲国家的担忧。德国外长根舍奔波于欧洲首都之间，分别向法、英等国家领导人阐明十点纲领的意义。法国总统担心欧洲可能退回到1913年。面对未来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欧洲伙伴国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的力量。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时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一再赞扬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勇气。她担心德国统一步伐过快，遭到苏共强硬派的反对，会破坏改革事业。撒切尔夫人甚至公开表示，欧洲

① [德]维尔纳·马泽尔：《统一总理——科尔传》，马福运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第46页。

② 同上，第53-55页。

将会因此而变得动荡不安。到 1989 年 12 月，她还表示，“这一切进行得太快了。”“现在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继续前进，首要的问题在于民主德国进行真正的选举”。

面对这一形势，联邦德国急切得到美国的坚决支持。科尔早在美国总统布什担任副总统期间就与布什保持着友好关系。在美苏首脑马耳他举行会晤前，他就与布什总统约定，美德两国推动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做出让步。12 月 3 日，科尔赶到布鲁塞尔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苏联处于极度经济困难中，戈尔巴乔夫难以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制造障碍，当务之急是两国需要争取戈尔巴乔夫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德国统一。此时的民主德国形势已大变，老百姓急切地需要早日实现统一，而欧洲国家的舆论也发生了变化。阿伦斯巴赫研究所对 6200 多名西欧人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在施密特总理下台后的两年，还有 25% 的法国人和 26% 的英国人反对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合并，而今天，在法国的反对者仅有 16%，在英国仍有 23%。^①

在两德统一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障碍，是统一后德国的走向定位：是成为一个中立国家，还是继续保持作为北约的成员国？苏联在东德的驻军又如何早日撤回本土？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谈判来争取最有利于德国早日实现统一的前景。1990 年 2 月，科尔和根舍对莫斯科进行了一次闪电式访问，与戈尔巴乔夫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了长达 4 小时的秘密会谈，会后科尔在莫斯科会见媒体时激动地说：“今天晚上仅向全体德国人转达一个信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我，就是否在一个国家共同生活做出决策纯属德国人民的权利达成一致意见……今天对德国来讲是幸运的一天，对我本人也是愉快的一天”。正像苏联塔斯社所报道的那样，戈尔巴乔夫让德国人民自己决定，以

① [德]维尔纳·马泽尔：《统一总理——科尔传》，第 368 页。

什么速度和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统一。^①但德国媒体对科尔的讲话并没有予以重视，很大的原因在于，德国统一正在加速进行，似乎戈尔巴乔夫这一表态并不具有重大意义。

在解决“德国统一”问题上，更为重要的是，统一后德国应该如何处理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对此，苏德两国政府和民间舆论几乎无休止地讨论过：统一后的德国是否应是中立于东西方之间的国家；统一后的德国能否东扩到原民主德国所在区域；苏联在民主德国的驻军是否应早日撤回到国内。对于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不断后退，直到与科尔的最后一次会谈才提及苏联驻军撤回、德国应该向苏联提供多少援助和贷款的问题。

在这期间，美德两国是否承诺过，德国统一后北约不会延伸到前民主德国的领土，成为至今各方争辩不休的问题。2014年10月，德国《时代周刊》第41期刊登的文章，详细解释了这一问题。作者认为，苏联得到美德“北约不会东扩”的保证的说法并不完全确切。根据解密的1989年和1990年的秘密文件，美德并没有书面确认德国统一后北约不会东扩，但是这些文件也表明，美国和联邦德国在一个较短时期内，为换取苏联给德国统一“开绿灯”，确曾口头允诺过。科尔曾回忆1983年第一次与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会晤的情景。当时，安德罗波夫先是保持沉默。在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指责联邦德

① 笔者于1990年3月率六人小组前往民主德国，就德国统一可能何时实现进行调研。调研小组在东柏林与多位东德党政官员及各界朋友进行交谈。不少人认为，东西德今后将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这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实现统一并非易事。后来我们调研小组分别到莱比锡、德累斯顿、埃尔福特等6个城市，争取和普通老百姓进行深入交谈。当时得出的印象是，普通老百姓急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德国统一。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科尔提出统一后，东德老百姓可以将手中的储蓄，从1个东马克换成1个西马克。（当然，一比一的东西德马克兑换率是有一定限度的，只不过当时东德老百姓并不十分清楚）。在这种形势下，最后东西德双方商定，并不需要东西德双方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而是由东德方面根据联邦德国宪法第5条，作为原先德国东部的五个州申请回到联邦德国，这就加快了德国统一的进程。此外，科尔提出的1:1的比价受到东德老百姓的欢迎，确实成为德国统一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比价也对东德的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调研小组在当年4月份曾走访设在西柏林的经济研究所，他们认为东西德马克1:1的比价，将使统一后东德的企业面临大量破产倒闭的危险。他们举出不少实例来说明这个观点，如在东德一个电子管电视机要卖600个东马克，而在西德，一架半导体组装的先进的电视机只卖500个西马克。在这种情况下，东德的电视机工厂势必立刻倒闭。后来德国统一后，确实出现了这一情况，这也为统一后德国总理科尔在大选中失利埋下了伏笔。

国时，安德罗波夫打断葛罗米柯的话，指责那些要求德国统一的人都是战争贩子。^①科尔表示，与戈尔巴乔夫接触后，发现他与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不同，“最初戈尔巴乔夫的确不愿意德国统一，但是他是一个面对现实的人，因而明白现在出现的情况要想扭转已不可能。”^②

戈尔巴乔夫早在 1989 年 6 月访问波恩时，就与科尔建立了友好关系。科尔表示，在苏联遭遇经济困难时，德国愿意给予援助。1990 年 2 月 9 日，德国政府与苏联有关部门签订了相关协议，联邦德国向苏联补贴 2.2 亿马克，并从 2 月中旬起向苏联提供大量牛肉、猪肉、黄油、奶酪、奶粉以及其他日用品。从德国总理府文档中可以发现，科尔对北约东扩问题采取弱化方针，希望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开启德国统一事业的进程，因此，科尔对戈尔巴乔夫表示过，北约不会进一步扩张到现在东德的领土。从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也可以看到，根舍外长早在 2 月 6 日就告诉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戈尔巴乔夫曾要求排除北约向民主德国，更不要说向东欧扩张的可能性。北约无意东扩，这一东扩并不限于东德，也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国家。苏联出于安全需要，希望匈牙利在政府更迭后，不加入西方联盟。

科尔在这次访苏前，曾接到美国总统布什的来信，国务卿贝克刚刚与戈尔巴乔夫就北约东扩问题进行了讨论。贝克写了一封密函，由美国驻苏大使转交给科尔，信中老布什明确表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西方国家不能向苏联让步。贝克的密函提到统一后的德国归属于北约的司法管辖范围，这个北约将不会东扩。密函还提到，贝克在与戈尔巴乔夫谈及北约东扩时说：“对您而言，一个统一的德国是置身于北约之外，坚持独立，还是加入北约”，戈尔巴乔夫对此答称：“北约扩张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上述这些事实表明，不论是美国还是联邦德国，在与戈尔巴乔夫谈及德国统一后北约是否东扩时，尽管用词有时不一样，但是应该说，他们或明或暗地在口头上允诺过北约不会东扩。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说法在德苏达成的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形成文字表述，或者以任何文字形式承诺过。1990 年 5

① [德]凯·迪阿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葛放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18 页。

② 同上，第 219 页。

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马特洛克报告称，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不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受到压力。苏联犯罪率迅速升高，反政府示威游行剧增，经济低迷，分离主义抬头。布什和科尔一致判断，如果戈尔巴乔夫获得帮助，他会屈服于西方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科尔与布什商定，针对苏联的问题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戈尔巴乔夫满意。在科尔看来，最终能解决问题的还是“钱”。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助理和副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盖茨称，简而言之就是对苏联“行贿”。为此，科尔采取两步走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与科尔谈判后，科尔分别在7月和9月与戈尔巴乔夫通电话，最后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属于北约，同时双方也商定，苏联在四年之内，从东德撤出所有军队。在谈判中，苏联坚持联邦德国应提供160亿到180亿马克的财政援助，科尔则向他表示，德国准备承担100亿到120亿德国马克的援助。虽然戈尔巴乔夫表示不愿意就这个数字问题进行讨价还价，但仍希望满足他的要求。科尔心中深知，如果未能与苏联谈定德国统一问题，即将召开的2+4（即两个德国加美苏英法）会议也不会达成协议。科尔最终同意将向苏联提供120亿马克援助和30亿马克无息贷款。1990年9月12日，2+4会谈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确认法英苏美四国结束对柏林以及德国全境所享有的权利，统一后的德国，对其内外事务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份协议，由美苏英法四国外交部长签署，戈尔巴乔夫出席了签字仪式。同年10月，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德正式实现统一。

二、冷战后的德俄关系：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务实伙伴关系

两德正式统一后，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宣告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形势由此发生新的结构性变化，对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影响。

（一）施罗德执政时期：重视与俄罗斯合作，进一步密切德俄关系

战后在德国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素有名望的社民党政治家，当属勃兰特、施密特和施罗德三位。社民党在1983年第10届全国大选中失利，成为在野

党，经过 15 年的努力，终于在 1998 年第 14 届全国大选中获胜，挫败联盟党，与绿党联合组成新政府。这也是绿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成为执政党。社民党则选出施罗德出任总理。

在这期间，美国为独霸世界，利用科索沃战争分裂南斯拉夫，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美欧俄关系不断紧张，矛盾加剧。施罗德认为，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始终矛盾重重，一旦看到欧洲出现自主独立的趋势，就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为了自己的军事、经济和贸易利益，美国对欧洲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一些美国政治家宁要一个分裂的欧洲。美欧对世界的看法渐行渐远，施罗德力主德国应该不断提高独立自主意识，适当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他主张德法应该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与俄罗斯以及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虽然美国遭到恐怖袭击后，出兵阿富汗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为巩固在中东的战略地位，美国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施罗德从一开始就怀疑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化学武器，坚持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他与普京、希拉克发表德法俄三国声明，阐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原则立场，增加在联合国安理会形成战争合法性的难度。最终，美国、英国和西班牙提出出兵伊拉克的决议草案，遭到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的共同反对，安哥拉、喀麦隆、叙利亚、智利和墨西哥也不同意，只得到保加利亚的肯定支持，这使主战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遭到空前孤立。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也没能阻挡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①

施罗德从欧洲如何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度出发，强调欧洲只有加强与俄罗斯合作，才能作为世界的一级，发挥应有的作用。俄罗斯要想在世界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也只有与欧洲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才能做到。^②他深信，没有与俄罗斯的全面相互理解，就谈不上欧洲永久的稳定与和平。2001 年 9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德国，在德国议会发表讲话时，他强调俄罗斯始终是欧洲的一部分。虽然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但在文化感情、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是属于欧洲的。没有人会怀疑欧洲与美

① [德]格哈德·施罗德：《抉择：我的政治生涯》（施罗德回忆录），徐静华、李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年，第 5 章：鼓足勇气，坚守和平。

② 同上，第 271 页。

国关系的重要性，但他坚信，欧洲只有将自己与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俄罗斯联合起来，才能巩固它强大的独立自主地位。^①

德俄不仅在抗衡美国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在协调中东等地区重大国际问题方面，也容易找到契合点。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是德国第一大能源供应国，德国是俄罗斯最为重要的投资国和商品输出国，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居第一位。施罗德在担任总理期间，力主发展德俄能源合作，两国签署了通过波罗的海修建从俄罗斯直接向德国提供天然气的北溪管道，这一项目已在2011年完工，两国还决定修建北溪管道第二期工程。

（二）默克尔执政时期：对俄实行等距离外交，保持有限合作

2005年，在第18届联邦大选中，联盟党和社民党斗争激烈，默克尔小胜施罗德，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迄今她已连续执政三届，历时12年，一直是选民支持率最高的总理。默克尔出生于西德汉堡，幼年时随当牧师的父亲迁居到东德。青年和大学时代是在东德度过的。她在科尔总理执政期间，成为德国统一后内阁政府中唯一来自东德的部长。经过多年的磨炼，有着两个德国政治经历的默克尔，较之一般的德国政治家，有不同的风格和领导作风。她为人稳重，善于思考，从不冒进，能较多地考虑各种不同意见。她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又善于调和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默克尔赞扬施罗德政府2003年推出的被称为《2010议程》（Agenda 2010）的系列改革举措^②，但改革并没有立竿见影，反而使得社民党在所有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接连受挫，施罗德被迫宣布提前大选，黯然下台。

① [德]格哈德·施罗德：《抉择：我的政治生涯》（施罗德回忆录），第264-265页。
② 2015年10月，《格哈德·施罗德：传记》新书出版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并在会上介绍施罗德这本新书。她说她钦佩施罗德掌权的意识，说他从来也不会犯错误，因而不应该低估施罗德的能力，特别是他的竞选天才。她说她至今仍高度尊重施罗德的《2010议程》。施罗德则用高兴和感动的目光凝视着默克尔。原文参见Lisa Caspari, "Ihr könnt mich alle mal", Kanzlerin Angela Merkel stellt die Biografie ihres SPD-Vorgängers vor. Gemeinsam erinnert man sich an Schröders Krampfadem, seinen Machtinstinkt und den Wahlabend 2005, 22. September 2015, <http://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15-09/gerhard-schroeder-biografie-angela-merkel>

①接盘的默克尔政府没有勒住缰绳,而是继续推进没有施罗德的施罗德改革,为德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定基础。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从保守右倾逐步向中间靠拢,在内政上以保持政治稳定为主要目标,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成为欧洲在经济发展方面一枝独秀的国家。201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3.13万亿欧元,人均GDP为3.8万欧元,经济总量占欧盟总量的五分之一,为世界第4大经济体。

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两党在执政过程中不仅在对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主张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对外政策的主张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包括对俄罗斯的关系。德国对外政策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中东欧、俄罗斯和中亚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迈斯特(Stefan Meister),将当代德国政党对俄关系的主要主张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主张以人权和价值观作为对俄关系的出发点,将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国内的民主化进程,批评俄罗斯总统和议会选举的舞弊行为,其代表主要是来自联盟党和“绿党”等其他政党的大部分议员,以及默克尔身边的一些高级官员;另外一个阵营则以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为主,也有少部分来自基民盟的议员,主张以综合性的立场处理对俄关系,包括与俄建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并推进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合作。②整体而言,后一阵营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对德国构建对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立场在默克尔执政的三个任期内,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

默克尔第一个任期内,德俄双方总体上保持着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合作关系,德国是俄罗斯在欧盟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直到2011年中国取代德国的地位)。但德俄经济关系并不局限于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俄罗斯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地区之一,对德国的公司来说具有巨大的潜力。例如,在高技术领域以及在航空和宇航方面呈现出巨大和尚未充分利用的机会。德国公司能够为俄罗斯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加强经济合作不仅仅有利于企业,也将

① 肖巍:“德国《2010 议程》改革十年的启示”,《学习时报》,2013年9月9日,第2版。

② Stefan Meister, „Entfremdete Partner Deutschland und Russland“, *Osteuropa*, 2012, N.62. Jg.6-8. S.475-484.

促进俄罗斯与其西方伙伴的关系，并且促进这个大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变。德俄关系也远远超越经济关系，两国公民的交往比恢复关系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频繁，文化交流活跃。两国还通过大量的伙伴城市关系、旅游和许多民间团体的倡议活动增进相互了解。此外，两国在教育、科研和创新领域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从第二个任期开始，俄罗斯与德国的分歧日渐严重，德国媒体对于俄罗斯车臣局势的报道以及对于俄罗斯逮捕“示威抗议者”的指责，导致双方政治互信骤降。普京从 2007 年后开始在外交政策上疏离西方，批评西方在俄格战争、科索沃危机、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北约和欧盟东扩等事件上罔顾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这也导致了德俄关系的下滑。^①

在第三个任期，即默克尔成功连任德国总理后不久，乌克兰危机爆发，随后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德国加入了欧盟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使得德俄双方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遭受影响。据德国世界经济研究所（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估算，因欧盟连续对俄采取制裁措施，仅 2015 年，双方总共损失达 970 亿欧元，其中，德国成为所有欧盟国家中遭受经济损失最大的国家，德国对俄出口减少 40%（相应地，英国 7.9%，法国 4.1%）。^②德俄经贸关系出现的这样状况，使得默克尔遭受到社会民主党等其他党派的压力，批评她应对无力。

与此同时，过去几年来，种种迹象表明，德俄两国仍然不事声张地保持着一定的合作关系。这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一向重视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逻辑基本上是吻合的。特别是 2013 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虽然德国开始疏离俄罗斯，也符合美国的战略要求，但双方仍然保持着有限的合作，比如在能源方面，目前俄罗斯是德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占德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德俄两国一直坚持修建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波罗的海海底管道的第二期工程。

① 黄萌萌：“德俄关系：观望中寻求出路”，《世界知识》，2017 年第 11 期，第 52 页。

② Евгений Григорьев. Германия потеряла 40% экспорта в РФ из-за санкц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74, 15 декабря 2017. С.6.

乌克兰危机被学界视为冷战后欧洲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①有德国专家指出,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检验当代德国与俄罗斯之间致力于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试金石。^②当前欧美国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博弈仍在继续,这场危机不仅对德俄关系发展,而且对欧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构成威胁,同时还对欧洲的安全秩序和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乌克兰危机中,一方面,美国试图利用这一危机加紧控制欧盟,制约最强有力的德国,其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欧洲。就美国而言,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早已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 5200 万人口、重要资源和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新获得一个跨欧亚大陆强大帝国的资本。^③可见,美国在乌克兰危机过程中,不断地火上浇油,不仅是要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也要阻挠欧盟和俄罗斯加强关系,这一点对德国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另一方面,欧盟支持乌克兰寻求与俄罗斯妥协的努力要远远大于美国。“欧洲人的命运掌握在欧洲人手中”,这是默克尔对美国的指责最强有力的反映。德国和欧盟意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极,发挥大国的作用,不缓和同俄罗斯的关系是难以做到的。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明斯克协议,期望避免美国的介入,解决乌克兰问题,就是重要的表现。针对新上台执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政策的挑战,德国力图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希望修补与俄罗斯的关系,2017 年 5 月,正式宣布参加德国大选、寻求第四个总理任期的默克尔,在大选之前访问莫斯科,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三、新时期德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在 2017 年 9 月结束的德国大选中,默克尔再次获胜,第四次出任联邦

① 周弘、黄平、江时学主编:《欧洲蓝皮书:欧洲发展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② Штефан Майстер. Как Россия потеряла Германию//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5. №1. Том.13. С.49-58.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政府总理，超过阿登纳和科尔，成为战后德国总理任期最长的政治家。在德国官方公布的正式大选结果中，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以 33.0%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社会民主党和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分获 20.5% 和 12.6% 的选票。这次大选中，联盟党和社民党两大政党受挫严重：联盟党支持率跌倒 194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社民党支持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各小党支持率普遍增加。特别是反欧盟、反对收容难民的民粹派——选择党支持率增长幅度最大，一跃而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这意味着该政党极可能经由此次选举首次进入联邦议院，成为德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首个进入议院的极右翼政党。

这一选举表明，默克尔得以继续担任总理，但与此同时也反映了不少选民已经厌倦两大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联盟党和社民党两次组成大联合政府，时逾十年，国际影响增加，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下降，政绩卓然。但是贫富差距扩大，大量难民涌进德国，如何应对，分歧日益加重。面对未来，德国人民感到前途渺茫，对执政党日益不满。在默克尔领导下，基民盟从右倾保守，趋于中间，和其姊妹党基社盟矛盾加剧。社民党作为第二大党和联盟党合作，缺乏鲜明的政策选择，选民大量流失。社民党在大选期间已经表明不再和联盟党继续联合执政，大选结果公布后，社民党决心作为在野党，提出鲜明的政策主张，争取在下一届大选中取得良好成绩。此外，在这次大选中，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分歧也进一步显现出来：社民党坚持“社会公正”，而联盟党则主张维护社会安全。社民党要求减少中产阶级的税收还要对富有阶层增加税收；联盟党则希望维持现状，反任何可能造成社会分裂的改革。

德国大选结果公布后，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为组成三党联合政府进行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终因意见分歧，自民党宣布退出谈判，组织联合政府的努力宣告失败。今后德国面临三个前途：（1）联盟党和自民党，或者和绿党组成少数派政府；（2）再次和社民党联合组成大联合政府；（3）重新大选。目前来看，联盟党和社民党即将进行的大联合政府组阁谈判成功的可能性还是较大。不管结果如何，可以预计，德国倾向于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以保持德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当前世界政治和欧盟内部的形势对德国未来的发展并不十分

有利。在国际形势方面，目前的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人类社会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美国内政外交的走向扑朔迷离，大国之间重现地缘战略竞争的态势，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抬头，许多国家的国内不平等引发了对政治建制的不满，社交媒体加剧了政治极化。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使人类发展前景更加难以预测。

就欧盟内部发展面临的形势而言，可以说，当前欧盟正处于重重困难之中。英国退欧谈判有待早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改造欧盟和欧元区的宏伟规划，有待德国的支持和启动这一规划的谈判。欧洲不少国家依然处在右翼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政局并不稳定。欧盟和维谢格拉德集团（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嫌隙不断扩大。最近奥地利大选后，人民党将和自由党组成新政府，政治倾向趋右，人民党已透露有意加入维谢格拉德集团，这将使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面对各种危机带来的持久影响，在欧盟内一向发挥主导作用的德国，在维护欧盟的团结、加强欧盟的地位、巩固欧元区方面，将承担不容推卸的责任。

在上述日趋复杂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有必要思考同样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和面临新的选择的德俄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特别是，作为欧盟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创新发展领头羊的德国，与同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如何适应新时代的世界政治，致力于构建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是共赢还是零和，都将会牵动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发展。

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早在 21 世纪初就鲜明地指出，鉴于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首先要清楚自己是促进欧盟制定对俄政策的推动者和动力。他认为，俄罗斯是德国和欧洲的战略伙伴，对德国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和大西洋联盟、欧盟中的伙伴共同与俄建立起稳定的、经得起考验的安全伙伴关系。德国愿意在实现欧洲安全与稳定基础上，同俄罗斯进行全面经常性的政治对话和加强经济合作，这是有益于德、俄和欧洲的事情。他还指出，把俄纳入欧洲，共同参与欧洲大陆的发展，是建设 21 世纪美好欧洲的必要

前提。^①这是施罗德一直以来都在大力倡议并推动与俄罗斯建立长期、全面伙伴关系的肺腑之言。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也同样指出，俄德之间紧密的合作，依赖于长达数百年的共同历史、同属欧洲的文化和传统、地理上的接近、两国经济的互补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目标。俄德之间没有重要的隔阂或无法消除的心理障碍，俄德两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处于欧洲重大事件的中心，两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欧洲大陆的发展，俄德友好与合作对整个欧洲都有利。^②由此可见，德俄两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两国保持长期友好与紧密合作关系不仅可以很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且对整个欧洲未来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正能量。这是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迄今仍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2017年2月，默克尔曾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990年到2015年，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3倍，美国也增长了3倍，欧洲只增长1倍，而中国增长了28倍。这不难看出，德国政府将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缓和对俄罗斯的关系。这也是德国抗衡美国压力的战略考虑。的确，对默克尔而言，当下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正处于发展演变的重要关头。同时，面对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欧洲一体化面临各种危机带来的持久不利影响，政治家的判断力、领导力和行动力比黄金还要宝贵。正如德国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默克尔面临着如何领导德国、如何恢复大西洋世界等一系列艰难挑战，如果缺乏长远愿景的实用主义政治策略，她或将难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无序世界和地缘政治风暴。^③对于这一点，她本人和德国政府显然有着清晰的认知。2017年10月下旬，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俄罗斯，并与普京总统会晤，双方表达了修复关系的意愿。这不难看出，德国政府开始将缓和对俄罗斯的关系视为当下

① Gerhard Schroeder, „Deutsche Russlandpolitik - europäische Ostpolitik. Gegen Stereotype, für Partnerschaft und Offenheit - eine Positionsbestimmung“, *ZEIT*, 5. April 2001, http://www.zeit.de/2001/15/Deutsche_Russlandpolitik_-_europaeische_Ostpolitik

② Sergej Lawrow, „Ganz reale Entspannung“, *DIE WELT*, 13.09.2005, <https://www.welt.de/print-welt/article164660/Ganz-reale-Entspannung.html>

③ Michael Stürmer, „Die eigentliche Lehre hinter dem Scheitern von Jamaika“, *Die Welt*, 22. 11.2017, <https://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article170856899/Die-eigentliche-Lehre-hinter-dem-Scheitern-von-Jamaika.html>

和今后默克尔政府需要处理的一项艰巨任务。

结 语

二战后，德国历届政府总体上力求与俄罗斯和平共处，致力于构建务实友好的伙伴关系。虽然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德俄关系发展遇到了不少复杂的问题，且两国围绕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新闻自由和尊重人权（非政府组织）等问题，仍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分歧，甚至是大不相同的看法，但致力于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依然是德俄两国领导人的正确选择。特别是双方能够通过开诚布公、充满信任、积极的姿态，不抱幻想、成见，同时又考虑到各自利益的情况下，致力于构建新时代的伙伴关系。这样的伙伴关系，不仅要适应新时代世界政治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需要顺应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Abstract】 Germany and Russia, two geographically close European powers, used to be at the core of major European events. Both have had great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inent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Since the World War II, although Germany and Russia have always had different opinions on some issues, yet all past German cabinets, on the whole, strived to co-exist peacefully with Russia,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pragmatic and friendly partnership.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the Germany-Russia relationship is at a new crossroads and faces new options.

【Key Words】 Germany-Russia Relationship, Russian Diplomacy, German Diplomacy

【Аннотация】 Дв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 близкие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державы, Германия и Россия, часто были в центре крупных событий в Европе и оказали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и всего мир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хотя в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между Герм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и были некоторы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по тем или и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все предыдущ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Германии стремились к мирному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с Россией, пытаясь построить прагматичное и друже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После кризиса в Украин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Герма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новом перекрёстке и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с новыми вызов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емец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Германии

(责任编辑 万青松)

法国对俄“摇摆”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探析*

张红**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法国对俄政策摇摆于大西洋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间,游走在价值观和利益之两端。2000年以来法国三任总统治下的对俄政策变迁,基本上沿袭的是传统的平衡战略,但逐渐由利益导向转变为价值观导向。法国的对俄政策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欧美俄大三角关系、欧盟北约双东扩、法国战略考量以及国内精英对俄罗斯、对法俄关系的认知等。当前,马克龙治下的法国以欧盟建设为核心依托,以多边主义为战略手段,在美俄中三国间奉行均衡原则,以实现其“法国梦”。

【关键词】法国外交政策 法俄关系 俄欧关系 俄罗斯外交

【中图分类号】D856.5;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1-0045(37)

引言

2017年5月初,政治素人马克龙颇具传奇色彩地当选法国总统。在就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马克龙在结束G7峰会之后,闪电邀请普京访法,并且将会面地址选择在颇具象征意义的凡尔赛宫,以纪念法俄建交300周年之名,力求改善法俄双边关系之实。马普会上,普京要求“搁置分歧、消除误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和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崔珩博士在俄文资料查找方面的帮助!

** 张红,上海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解”，马克龙也强调，在重大国际争端上，与俄罗斯的对话必不可少。此外，法俄两国首脑还就叙利亚局势、乌克兰危机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让人不禁猜想此次会面是否预示着法俄关系崭新篇章的开启。

此次会面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间关系急剧恶化，关系一度降至冰点。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在政治上全面孤立俄罗斯，同时，北约还增加了其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和行动能力。俄罗斯也对西方国家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在政治上借力新兴国家努力突围，在经济上对欧美反制的同时拉动内需。在法国总统大选期间，马克龙与普京之间不乏龃龉，甚至还以“散布谣言”为由，将两家俄罗斯媒体列入禁止采访自己的“黑名单”^①。因此，本次会谈对法俄关系而言，具有一定的转折意味。第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增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马普会之前一段时间，特朗普首访欧洲，先是在北约峰会上猛批盟友不交军费；继而在G7首脑会议上，未能就遵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达成一致；默克尔表示“欧洲不再视美国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欧俄关系被投下重重阴影。因此，法国如何看待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法俄关系走向，令人十分关注。

马普会令国际社会思考：缘何法国“逆流而上”，冒西方国家之“大不韪”，在俄罗斯焦头烂额之际，仍向它投去橄榄枝？这背后是一种历史定律的必然支配还是马克龙个人因素的偶然促成？马克龙治下的法国对俄政策将何去何从？与其前任奥朗德乃至萨科齐抑或希拉克相比，会体现出哪些共性，又会有哪些革新和变化？法国对俄政策的摇摆不定，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

本文认为戴高乐主义和大西洋主义是观察法国对俄外交的两个重要维度，事实上，法国新世纪以来的对俄外交政策恰恰是摇摆于这两者之间。具体而言，戴高乐主义和大西洋主义构成了法国对俄外交这一体中的两面，前者强调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力图通过现实政治来谋求法国的国际影

^① Thomas GOMART, “Visite de Poutine: Macron ne craint pas le rapport de force”, interview parue dans *Le Parisien*, mai 29 2017.

响力；后者则主张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合作，认同西方属性，认同与美结盟。^①

总体而言，法俄两国的学界对于法国外交中的“大西洋主义”和“戴高乐主义”^②这两个维度都已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相比较而言，我国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直接聚焦于二者的研究则较为匮乏^③。基于此，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法国对俄外交中的这两个向度进行深度考察，并探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分析马克龙治下的法国对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和凭借。

具体而言，本文拟首先梳理新世纪以来法国三任总统治下法国对俄政策

① Frédéric Bozo, “France and NATO under Sarkozy, End of the French Exception?”, Working Paper of the Foundation pour l’innovation Politique, Mar 2008, p.4.

② 法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 Thierry de Montbrial, Thomas Gomart, *Notre Intérêt National: Quelle Politique Etrangère pour la France?*, Editions Odile Jacob, 2017; F. Charillon,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a France, De la fin de la Guerre froide au printemps arabe*,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11; R. Elgie, S. Griggs, *French Politics. Debates and Controvers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B. Stahl, H. Boekle, J. Nadoll, A. Jóhannesdóttir, “Understanding the Atlanticist– Europeanist divide in CFSP – comparing Denmark, France,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04, Vol.9, No.3, pp. 417-441; 俄罗斯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 Владимир Чернег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Фран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5. Май 2017. С.44-53; Евгений Ходаковский. Значе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вропы и России в Системе Геоцивилизации. Электро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 Альмана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 Время, 2014. Том.1. вып.1. часть1; Роман Лобанов. Динамика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НАТО по Вопросам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Европы в 1954-2002 гг// Локус: люди, общ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смыслы. 2012. №.2. С.74-85; Е.А. Долматова. Шарль Де Голль: От Военного к Политику//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Орл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2015. №.1. С.245-249; Людмила Пономаренко. Переосмысливая масштабы личности и наследие Шарля Де Голля//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5. том 15. №.2. С.82-90.

③ 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钟振明、孔君：“冷战后的欧洲防务合作：英法德三大国的斗争与妥协”，《同济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44-49页；“美国与欧盟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的制度建设”，《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79-86页；张旭、陈晓律：“从戴高乐到萨科齐—对法国重归北约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35-45页；张健：“欧美关系的新变化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29-34页；冯仲平：“欧洲国家对美关系考虑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4期，第30-34页；姚勤华、戴轶尘、朱雯霞：“从‘魏玛三角’到‘波兰现象—欧盟东扩与整合中的利益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第1-6页；王婧、周荣耀：“戴高乐主义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第2-22页；陈昕晔：“大西洋两岸的裂痕”，《理论参考》，2003年第3期，第37页，等等。

的演变过程，概括每一总统任期对俄政策的变与不变，兼及审视马克龙治下对俄政策的举措，并展望其动向。其次，选取新世纪以来在东西方之间发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危机事件，即格鲁吉亚战争、叙利亚冲突和乌克兰危机，分析危机事件中法国的对俄政策，横向比较法国对俄政策在不同事件上的异同。再次，从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影响法国对俄政策的主要因素和深层机制。笔者认为，欧美俄大三角关系、法国总体外交政策欧洲化特点的影响、对于战略利益的考量凌驾于其经济利益的考虑、法国精英层对于法俄双边关系的幻灭感、以及法国对于俄罗斯的认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法国的对俄政策。在这些变量影响之下，马克龙治下的法国对俄政策既会延续其前任的“独立自主”外交传统，同时也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放弃前任武力干预的新保守主义；奉行更为均衡、务实和灵活的对俄外交，更有效地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等。

一、新世纪法国对俄政策演变过程：从希拉克到马克龙

一国的外交政策对于该国的自身国家认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法国而言尤为如此。恰恰是在与俄罗斯的互动中，法国作为西方特殊一员的地位不断得以确认。^①作为西欧第二大国的法国和地处欧亚的大国俄罗斯，两国的双边关系源远流长，上可追溯至11世纪两国间的皇家通婚。在俄罗斯，在长达两个世纪里（18-19世纪）法语是其最主要的外语，促进着两国人民在文化和宗教领域的相互影响。^②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两国在历史上多次结盟共同应对其他欧洲强国；在文化上，两国频繁互动，关系密切；在意识形态上，法共曾与苏共休戚相关；冷战时期由戴高乐所引领建立的法苏“特殊伙伴关系”，成为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底色。然而，由于两国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仍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双边关系也呈现出工具性、脆弱性

① Manuel Lafont Rapnouil, Jeremy Shapiro, “Macron’s foreign policy: Claiming the Tradition”, 8 May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7/05/08/macrons-foreign-policy-claiming-the-tradition/>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Орлов. Россий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уждаются в определ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пере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7. №6. С.6-12.

和复杂性的一面。新世纪以来，法国的对俄政策历经希拉克时期的戴高乐主义、萨科齐时期的大西洋主义，再到奥朗德时期徘徊于戴高乐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间。新总统马克龙上台后，其对俄政策走向则力求在戴高乐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间折中。可以说，2000年以来，法国的对俄政策历经钟摆式的调整。但总体而言，一个宗旨没有变，即在其综合国力不断衰退的背景之下，冀图力挽狂澜，努力振兴法兰西民族，恢复其大国地位，实现“法国梦”。

（一）希拉克时期（1995-2007年）：“特殊伙伴关系”强势复归

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多极力量的牵制，欧俄之间逐渐从世纪初的合作和互信走向竞争和互疑；美欧虽然分歧不断，但因共同的战略目标，其联盟关系未受动摇；因北约东扩及美国向前苏联核心地区的不断挺进，美俄关系从2000-2003年的相对稳定发展转向争斗逐渐加剧和升级。^①

希拉克执政初期奉行人权外交，使得法俄关系一波三折。先是1997年9月两国建立“优先伙伴”关系；随后，冻结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的银行账户，扣押俄罗斯大帆船等；及至2000年开始调整对俄政策，坚定地奉行戴高乐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积极推动多边世界和多极世界的建构。这一点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不谋而合，成为这一时期法俄关系的重要支点。希拉克认为，“俄罗斯是世界稳定及平衡的重要因素”^②，是法国重要的战略伙伴。^③普京称希拉克是克里姆林宫乃至整个俄罗斯最为欢迎的人。2004年，普京邀请希拉克参观克拉斯诺兹纳缅斯克市^④的军事测试及控制中心。2006年，希拉克将法国军团荣誉勋章授予普京，标志着两国的互信达到新高度。^⑤

① 杨成绪：《笔端——二十多年来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思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3月，第23-55页。

② Jean-Sylvestre Montgrenier, “De l’Atlantique à l’Oural: les relations Paris-Moscou?”, Thomas More Institute, Oct. 1997, p.2.

③ Thomas Gomart, “France’s Russia Policy: Balancing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7, Vol.30, No.2, pp.147-148.

④ 位于莫斯科西郊的克拉斯诺兹纳缅斯克市，系俄罗斯为数不多的保密行政区之一——作者注。

⑤ Arnaud Dubien, “France-Russie: renouveau et défis d’un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Note de l’Observatoire franco-russe*, Oct. 2012, No.1, p.7.

这一时期，在经济上，法国增加对俄出口。2001年，法俄两国就共同的经济项目举行双边第一次年度会议，2002年两国开启2+2战略对话。^①2004年，法国是俄罗斯的第九大出口国，占有俄罗斯市场的4%；法国还是俄罗斯的第八大直接投资国，是对俄的第四大投资国。一方面，法国支持中小企业进入俄罗斯，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也力求在能源和航天等领域与俄罗斯达成大额交易。

在面对国际重大问题上，两国统一立场，“特殊伙伴关系”强势复归。两国就共同反对英美入侵伊拉克、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制度框架内扩大合作达成共识，在反对恐怖主义、阿富汗问题、伊朗问题、伊拉克问题以及所有关乎东西方发展的问题上，事无巨细皆有共识。两国史无前例地在北约框架内进行双边军事合作，于2003年在挪威海进行联合军演；法国卡萨比安卡（Casabianca）号核攻击潜艇在俄北方舰队北莫尔斯克（Severomorsk）海军基地进行极具象征意义的停留。^②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法国重视俄罗斯的作用，2001年，巴黎努力推进俄罗斯与北约达成新的框架性协议。^③与此同时，鉴于两国拥有的悠久文化传统，这一时期，两国间也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人文合作：互相加强对对方语言的学习，努力增进两国青年的交流。^④

希拉克是戴高乐主义的忠实拥趸，他强烈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通过与俄罗斯的积极合作，致力于多极世界的建构，力求将法国重新带回到国际舞台的重要位置。希拉克通过与大西洋主义的决裂，凸显出其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彰显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二）萨科齐时期（2007-2012年）：游走于利益与价值观之间

这一时期的形势，呈现与此前不同的趋势，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发达国家经济持续衰退，发展中国家力量增长，世界力量中心向亚洲转移，国际格

① “France-Russian Relations”,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fr-for-rel-ru.htm>. 在此之前，只有美国与法国之间有这种高级别战略对话。

② Jacques Cheminade, “Extraordinary Steps in Franco-Russian Relations”, *Issue of EIR*, 2003, Vol.30, No.29, p.46.

③ Arnaud Dubien, “France-Russie: renouveau et défis d’un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p.8.

④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f France Jacques Chirac”, Apr 3, 2004, Krasnoznamenok, Moscow Region,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407>

局呈现新局面。大国关系总体更趋复杂，利益之争、种种摩擦时有发生。^①伴随着美欧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最后底线，美俄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出现分歧。2012年，美国公开批评俄罗斯杜马选举，美俄关系恶化呈明朗态势；但当时欧俄关系总体上仍维持在正常轨道上运转。

希拉克时期，由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与美国持截然不同的态度，美法关系一度走低。尽管其后希拉克政府做出种种努力以求改善关系，但收效甚微。^②而2007年及2008年两国总统大选，则为萨科齐改善法美关系提供了极好的机会。^③这一时期，法国将增强欧盟的行动能力作为其外交首务，同时不断地调整对美政策，逐步向美靠拢。值得一提的是，法美关系的走近，促进了北约的发展以及欧美关系的提升。在国际舞台上，萨科齐依旧希望成为全球玩家。

对于俄罗斯，萨科齐上台初期奉行较为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和政策，然而基于法俄之间的商贸往来及法国在俄罗斯的经济存在^④，俄格冲突后，萨科齐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萨科齐积极参与冲突的解决，与梅德韦杰夫商议“六点停火协议”；在格鲁吉亚“领土完整”问题上并未持坚定的立场。当俄罗斯单边承认南奥赛梯及阿布哈兹时，法国也未进行任何抗议。在萨科齐访俄期间，普京提议与法国公司签订合同。其后，一方面俄罗斯依旧驻兵格鲁吉亚，另一方面，2008年9月19日，法总理菲永与普京在索契会面，这一举动引起中东欧国家的严重关切。俄格冲突之后，法俄关系迎来了蜜月期，两国达成总价值为20亿欧元的“西北风”战舰销售合

① 杨成绪：《笔端——二十多年来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思考》，第52-72页。

② Joel Blocker, “U.S./France: While Bush, Chirac Thaw Frosty Relations, ‘Rupture in Confidence’ Remains”, Jun 3, 2003, Radio Free Europe, <https://www.rferl.org/a/1103421.html>.

③ Joel Blocker, “U.S./France: Chirac Seeking to Improve Relations”, Apr 16, 2003, Radio Free Europe, <https://www.rferl.org/a/1102958.html>

④ Arnaud Dubien, “Reconstruire la Relation Franco-russe”, *Choiseul la Revue*, Jan-Avr, 2017, <http://choiseul.info/wp-content/uploads/2017/03/Choiseul-la-revue-numero-1.pdf>, p.23.

同。^①同时，法国还罔顾美国质疑，率先与俄罗斯签署签证便利化的协议。此外，当时萨科齐并未充分重视法德轴心的重要性，使得欧盟成为法国“一国秀”的平台，并因而惹恼了德国；而对于欧盟小国，法国也并未捍卫它们的利益。^②

2009年9月，时任总理菲永应邀出席瓦尔代年会并作主旨发言。2010年，法俄两国互设文化交流年，在对方国家举办数百项文化交流活动，推进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往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也先后访问巴黎。这一阶段，萨科齐采取了希拉克的亲俄路线，将利益置于价值观之上。^③

除了军购，在经济和投资领域，法俄之间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在能源、铁路、金融、航空等领域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合同。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6亿欧元，法国成为俄罗斯第九大供应国，第七大外资来源国。^④围绕《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计划、中东局势、伊拉克局势、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两国进行了深度的交流。^⑤在制裁伊朗问题上，两国初步达成共识。

这一时期，法国天然气巨头苏伊士集团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苏伊士集团将在“北溪”天然气项目中占有9%的股份。该输气管道通过波罗的海海底，将俄罗斯的天然气经德国输往欧洲国家。法国阿尔斯通集团也向俄罗斯火车头企业TMH注资7500万美元，成为在该公司控股25%的股东方。^⑥

① Marcel H. Van Herpen, “The Foreign Policy of Nicolas Sarkozy: Not Principled, Opportunistic and Amateurish”, Cicero Foundation Great Debate Paper, Feb 2010, pp.4-5.备注：西北风战舰是法国海军的骄傲，可以装载 16 架重型直升机或 35 架轻型直升机、4 辆登陆艇、900 名士兵和至多 70 辆军车（包括 40 辆坦克）。西北风战舰可以大大提高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战斗力。西北风战舰销售合同系当时俄罗斯金额最大的一笔采购，同时也是北约国家与俄罗斯达成的第一笔这样的大额合同。

② Marcel H. Van Herpen, “The Foreign Policy of Nicolas Sarkozy: Not Principled, Opportunistic and Amateurish”, p.13.

③ Ibid, p.6.

④ Arnaud Dubien, “France-Russie: renouveau et défis d’un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p.10.

⑤ 崔建树、李金祥：《法国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426 页。

⑥ 姚立：“法俄缘何积极营造‘特殊’关系”，《光明日报》，2010 年 3 月 5 日，参见 http://www.qstheory.cn/gj/gjgc/201003/t20100305_22743.htm

可以注意到，萨科齐时期，法国对俄政策游走于利益与价值观之间，考量重点一度侧重于利益层面。一方面，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积极参与格鲁吉亚战争的斡旋和协调；在执政后期，在“经济外交”的框架下，加速发展法俄经济关系，同意出售“西北风”战舰，明确指出此举更具“政治意义”，呼吁西方不能再对俄罗斯实行武器“禁运”，甚至主张要翻过“冷战”这一页。^①另一方面，法国也曾人权、油气供应等问题上挑衅俄罗斯。但总体而言，法国奉行谨慎外交，力图避免与莫斯科的冲突升级。^②

（三）奥朗德时期（2012-2017年）：既强调原则又呼吁对话

这一时期，美欧经济逐步摆脱困境，新兴国家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上升和政治影响增强的势头，力量对比逐渐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阶段性的转折。战后形成的美国结盟体系的凝聚力正在明显削弱，大国博弈的力度和强度因当时的总体金融危机深化、以及地区层面的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危机等各种冲突爆发而加强。^③

奥朗德于2012年5月当选总统，当时法国正面临欧洲债务危机的强烈冲击和由此导致的国家经济衰退的严重局面。摆脱经济危机成为奥朗德政府内政外交的核心。^④经济外交成为其治下对外政策的关键词，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俄罗斯的经济外交。2013年2月，奥朗德就任总统后首访的国家就是俄罗斯，而且其随访阵容强大，包括法国政府关键部门的部长以及15个大公司的总裁。访俄期间，奥朗德强调两国的经济往来，签署了双边协议，并与法国在俄商业人士代表见面。双方围绕贸易、能源、投资、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展开讨论。

这一时期，法俄两国都致力于扩展经济贸易领域的深入合作，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统计，法国在2013年进口俄罗斯能源等领域商品的贸易

① 周谭豪，“法俄关系：今生难续前缘？”，《世界知识》，2014年第19期，第39页。

② “Sarkozy to Set New Course for French Foreign Policy”, *CSS Analyses in Security Policy*, Jul 2007, Vol.2, No.17, p.3.

③ 杨成绪：《笔端——二十多年来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思考》，第70-87页。

④ 沈孝泉，“奥朗德访华的诉求在经济层面”，《世界问题研究》，2013年4月23日，第1页。

额达到52.7亿欧元，法俄两国双边贸易总额为210亿欧元^①，但受制于乌克兰危机后欧俄之间的制裁与反制，2014年和2015年法俄双边贸易额分别跌至170亿欧元和120亿欧元。与此同时，法国仍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信市场、完善保健服务等领域向俄罗斯提供新技术。此外，双边还深化了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通讯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有关简化签证手续、相互承认文凭、大学生交流等方面的协议。^②

在政治上，奥朗德既强调原则性又呼吁双边对话^③。一方面，反对俄罗斯归并克里米亚，加入美国与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限制性措施。在叙利亚问题上，先是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后出于对叙利亚问题认识的不同逐渐走向对抗，而反恐的共同需求又让两国找到了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发展对俄关系，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是其上任初期即任命前内政部部长、亲俄派代表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enement）担任俄罗斯事务特别代表^④，奥朗德表示，“法俄之间有着特殊的传统关系及经济、文化关系，我们应以此为基础，向俄阐明我们的观点。”^⑤在乌克兰危机中，力推“诺曼底模式”，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商讨危机解决方案提供平台；尽管法国迫于西方压力，终止对俄出售“西北风”的合同，但该合同的缔结本身即已印证不同寻常的法俄关系。^⑥2016年春以来，法俄双边关系开始缓和，无论是法国的外交话语还是部长级访问，都体现出法国努力恢复双边关系的意愿^⑦。可以说，这一时期，奥朗德对俄一手大棒（对俄制裁，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对抗），一手“胡萝卜”，对话之门从来就没有关闭。

① <https://atlas.media.mit.edu/en/profile/country/fra/#Imports>

② 杨磊：“奥朗德首访俄引各方关注，俄媒乐观看待俄法关系发展”，2013年2月28日，国际在线专稿，<http://gb.cri.cn/27824/2013/02/28/6611s4033048.htm>

③ 2016年7月，奥朗德在北约华沙峰会上宣称“我们必须继续对俄罗斯推行强硬路线，为对话创造条件”。参见http://www.lemonde.fr/europe/article/2016/07/09/hollande-prone-fermete-et-dialogue-avec-la-russie-au-sommet-de-l-otan_4966976_3214.html

④ Eva Bertrand, “Franco-Russian Relations, a Long Way to Go”, Dec 8, 2012, https://sputniknews.com/voiceofrussia/2012_12_08/Franco-Russian-relations-a-long-way-to-go/

⑤ 周谭豪：“法俄关系：今生难续前缘？”，《世界知识》，2014年第19期，第39页。

⑥ “法国破冰克里米亚，白宫猎熊计划破产”，京港台，2015年7月24日，来源：多维新闻，<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15/07/24/374960.html>

⑦ Arnaud Dubien, “Reconstruire la Relation Franco-russe”, p.23.

（四）马克龙时期（2017年-）：复兴法俄关系

在整个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俄罗斯问题始终是一个不断出现、分歧很大的议题。在总统竞选中，马克龙号召法国实行“主权、独立和欧洲的”俄罗斯政策，大西洋主义并未被纳入。成功当选后，马克龙与默克尔会晤，就终结南北欧的“冷战”积极磋商；与普京会面，寻找架通欧盟东西两翼的途径，呈现出既要牵制又要接触俄罗斯的态势。^①

2017年5月29日，在西方普遍孤立俄罗斯的背景下，马克龙在凡尔赛宫接待了俄罗斯普京总统，这是马克龙当选后首次接待大国领导人来访，并且地点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凡尔赛宫。此次元首会晤搁置政治分歧，在强调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力图开启双边对话新渠道。从马普会的实际效果来看，马克龙继续了前任的“强势对话”政策，在对欧洲的强烈责任感与更为传统的“戴高乐-密特朗主义”之间折中。^②在马克龙看来，阿萨德下台不再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先决条件，紧随其后，6月的两国外长会谈也在切实地推进事态的缓和，而马克龙在9月举行的第72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更是强调必须以多边框架、通过由当事各方组成的联络小组共同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英则一度要求阿萨德下台。在乌克兰问题上，马克龙也不顾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的新计划，协同德国一起力促明斯克协议II的贯彻。^④

马克龙曾明确表示他的外交政策将以“戴高乐-密特朗主义”为基础，即他会从两任总统的外交智慧中汲取精华，同时还将会打下他个人的烙印，包括：开放性，认识到法国必须对整个世界保持开放，这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独立性，这也是法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传统，包括自主决策

① Mark Leonard, “The Macron Method”, http://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macron_method_7298, 30 May, 2017.

② David Cadier, “Macron’s Russia policy”, ZoiS, 31 May 2017, <https://en.zois-berlin.de/publications/zois-spotlight/macrons-russia-policy/>

③ “France’s Macron at UN Defends Iran, Climate Deals”, AFP, 19 Sep, 2017, <http://www.dailymail.co.uk/wires/afp/article-4900248/Frances-Macron-UN-defends-Iran-climate-deals.html>

④ “Germany, France urge end to renewed fighting in East Ukraine”, American Associated Press, 23 Dec 2017, <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7/12/23/germany-france-urge-end-to-renewed-fighting-in-east-ukraine.html>

权、核威慑以及对美国、欧盟权力的有限怀疑。同时，马克龙并不认为北约
是保证法国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关键因素，而更看重欧盟的安全防务，认为
欧洲的安全应该把握在欧洲人自己手里，这一主张在美欧分歧凸显的背景之
下显得更为迫切；模糊性，即对于一些国际事务持模糊态度，包括对俄立场，
以便有更多的战略周旋空间。^①马克龙当选后，法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是向德
国靠拢，力图提振法德轴心，重建欧洲，包括在政治上联合德国，在经济上
实现法德高铁巨头的“联姻”^②，在防务上呼吁建立联合的武装力量等一系
列措施。其对俄政策在更紧密地依托欧盟框架^③的前提下进行了大幅度的调
整，包括接受普京邀请访问俄罗斯，两国部长级对话频繁，在乌克兰、叙利
亚危机管理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缩短对俄签证办理时间，在“特里亚农”
市民论坛框架下建立数据平台以促进法俄两国民间的交流等。^④与此相呼应，
普京也盛赞法俄“特殊伙伴关系”在欧洲乃至全球事务中具有重要意义。^⑤

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法国的对俄政策既有其恒定的一面，同时也经
历了深刻的变化和重要的演进。首先，法国对俄政策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服务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即：力求恢复大国地位，重现法兰西
民族的荣光。其次，其独立自主的外交特色历久弥新：在伊拉克战争中法国
是反战的“老欧洲”代表；在格鲁吉亚战争中，积极斡旋于俄罗斯与西方之
间，为最终停火协议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⑥；在乌克兰危机中，一方面，借
助“诺曼底模式”在俄乌之间架起对话的桥梁，另一方面则审时度势，在欧
盟对俄罗斯制裁的道路上有限跟进。再次，法俄“特殊伙伴关系”的底色保

① Manuel Lafont Rapnouil and Jeremy Shapiro, “Macron’s foreign policy: Claiming the tradition”, 8 May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7/05/08/macrons-foreign-policy-claiming-the-tradition/>

② Julie Chabanas, Adam Plowright, “Alstom, Siemens Merge to Create New European Rail Champion”, AFP(Paris), 27 Sep 2017.

③ John Irish, “France’s Macron puts national security at heart of foreign policy”, 22 Jun,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france-foreign-analysis-idUSKBN19D2OE>

④ “French Ambassador Confirms Preparations underway for Macron’s Visit to Russia”, TASS, 28 Sep, 2017, <http://tass.com/world/967840>

⑤ “Putin Praises Russian-French Relations”, 3 Oct, 2017, TASS, <http://tass.com/politics/968675>

⑥ “想说制裁不容易，法国为何不紧跟欧盟步伐制裁俄罗斯？”，《北京经济日报》，2014年9月2日。

持不变。无论是希拉克还是萨科齐，抑或奥朗德乃至马克龙，在对俄政策中都游走于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力求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发挥独特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法国的对俄政策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首先，2005年以来，双边经济关系愈益重要，而政治关系却在逐渐褪色^①。这一方面是由于油价飙升之后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增长，法俄贸易关系日趋紧密；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法国总体对外政策中“经济外交”重心转移的影响。而在政治上，尽管法俄之间仍保有合作的制度安排，有着相似的战略愿景，但双边政治关系的基石已受到侵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包括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危机等，与俄罗斯观点迥异^②；法国国内对于法俄双边关系所能为法国带来的收益也心存怀疑。其次，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化倾向更趋明显。法国对俄政策更多被纳入欧盟框架中考量，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国家利益日益为欧盟框架所规定；另一方面也是法国谋求欧盟主导权的一种表现。尤其是乌克兰危机以来，法国加入对俄制裁的行列并且取消“西北风”战舰的军售，更是凸显了这一特点。

二、从调停合作到走向制裁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危机，俄西关系急转直下，降至冰点。作为东西方之间的重要调停者，法国在危机事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同于上文聚焦于不同总统任期内对俄政策的演变，下文拟采用危机事件叙述法，因为恰恰是在危机中，各种矛盾凸显，各方力量交锋，法国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微妙的谋求平衡的作为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一）格鲁吉亚战争：作为领头调停者

冷战以降，欧亚纵深地带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化：一方面，

① David Cadier, “Detour or Direction: The Europeanisation of France’s Policies towards Russia”, FIIA Briefing Paper 195, May 2016, p.3.

② Arnaud Dubien, “Reconstruire la Relation Franco-russe”, p.23.比如在叙利亚危机中，法俄两国对于冲突根源、行动者的性质、他们所在的区域联盟及危机的规制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归根到底则是两国对于国际关系及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

欧美国家凭借双东扩政策不断战略挺进，以“颜色革命”之名在前苏联地区进行政权更迭；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在普京治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升，维护其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的意愿和能力显著增强。同时，格鲁吉亚的重要地缘政治经济地位及其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相互交织，使得俄格冲突的偶然性中又带有必然性，折射出欧俄之间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

2008年8月7-8日，格鲁吉亚危机爆发。8月9日，法国外长库什内代表欧盟、芬兰外长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代表欧安组织，共同奔赴格首都第比利斯，向时任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提交了一份关于格鲁吉亚停火协议的草案。这份草案虽得到萨卡什维利的同意，但却被俄罗斯拒绝。8月12日，在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的调停之下，梅德韦杰夫最终下令俄罗斯军队停止其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并且同意接受由法国起草的“六点协议”。^①值得注意的是，这“六点协议”中并未提及俄军事行动的性质，并且对俄军在冲突之后是否退出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也未做任何说明；在此过程中，萨科齐多次往返于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之间，法国与当事方之间的双边对话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②

然而，“六点协议”签署之后，格鲁吉亚的地区局势仍不稳定，俄美双方仍争执不下。8月2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宣布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两地作为主权国家独立，一时间，在西方社会引起轩然大波^③，欧盟随即推出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9月8日开始，法国总统萨科齐、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欧委会主席巴罗佐先后前往莫斯科和第比

① “六点协议”的内容包括：放弃使用武力；彻底停止使用军事行动；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格军回到出兵前的常驻地点；俄军撤回，在国际维和机制形成之前，俄维和部队可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就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的未来地位及安全保证途径问题展开国际讨论。最后一点因格方的反对，后改为：举行国际对话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参见Принуждение к победе//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08. №.142 (3959).

② J. M. Godzimirski, “What Makes Dialogue and Diplomacy Work or Not? Russia-Georgia and Russia-Ukraine”, in P. Rieker (ed.), *Dialogu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Potential and Limits*, London: Routledge, 2015.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26.08.2008. N.1261. О Признан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Южная Осетия;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26.08.2008. N.1260. О Признан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Абхазия.转引自冯绍雷，“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危机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第70页。

利斯，终于在莫斯科达成“六点协议”的补充条款，俄罗斯军队最终从占领地带撤回到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欧盟 200 名观察员于 9 月 15 日进入格鲁吉亚冲突地带进行实地考察。^①

法国在格鲁吉亚危机中所扮演的调停领头羊角色，一方面与萨科齐本人的个性魅力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法俄“特殊伙伴关系”、多年累积的互信紧密相关联。自 2007 年当选以来，萨科齐以务实政治家形象示人，采取了一些较为务实的行动，如恢复自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走低的法美关系，宣布致力于让法国重新进入北约的军事指挥结构之中等。同时，在莫斯科，他也被认为是可靠的调停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的实力（包括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一贯以来对俄罗斯堪称友好的态度。^②另外，萨科齐并没有坚持格鲁吉亚的领土不可分割，这一点恰恰是莫斯科所能接受的。在谈判策略上，萨科齐向双方反复表达的观念是，要么格鲁吉亚灭亡，要么俄西关系崩坏，这两者显然并非交战双方心之所想。然而，法国的调停行为却遭到了西方的严厉批评。^③一些人认为，法国的干预使得俄罗斯得以将其军事成果转变为政治成果，法国“事实上承认了俄罗斯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兼并”。^④法国是代表欧盟进行调停的，然而法国的风头显然超过了欧盟。^⑤

俄格冲突以后，法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此次战争暴露出俄罗斯军事装备方面的弊端，因此俄罗斯开始与法国就防务采购事宜开始进行谈判。2011年1月，俄罗斯与法国签署协议，购买其“西北风”两栖突击舰。

① T. Forsberg, A. Seppo, “The Russo-Georgian War and EU Mediation”, in R. E. Kanet (e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121-137.

② K. Atwell, “NATO Bucharest Summit Press Round-Up”, *Atlantic Review*, 3 Apr, 2008. <http://atlanticreview.org/archives/1048-NATO-Bucharest-SummitPress-Round-Up.html>, 法国在北约布加勒斯特扩大峰会上明确反对格鲁吉亚及乌克兰加入北约。

③ M.H. Van Herpen, “The Foreign Policy of Nicolas Sarkozy: Not Principled, Opportunistic and Amateurish”, Great Debate Paper, http://www.cicerofoundation.org/lectures/Marcel_H_Van_Herpen_FOREIGN_POLICY_SARKOZY.pdf, CICERO Foundation.

④ P. Perchoc, “Paris, Moscow, and Europe out of the EU”, *Lithuanian Annual Strategic Review*, 2015, Vol.13, No.1, pp.47-60.

⑤ A. Indyk, “Nicholas Sarkozy’s Mediation of the Crisis in the Caucasus”, *Publications in Contemporary Affairs (PICA)*, <http://connections-qj.org/article/nicolas-sarkozys-mediation-crisis-caucasus>, 2009.

此外，法俄两国同意在俄罗斯的造船厂建造三艘以上的突击舰。该协议在之后的乌克兰危机以及俄西关系走向中，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议题。

尽管法国在格鲁吉亚危机中发挥了核心的调停作用，但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嫌隙却在逐渐显现。首先，法国对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运用其能源资源的粗鲁和野蛮心存不满；其次，俄格冲突促使法国开始警觉俄罗斯的战略意图。^①再次，正如俄罗斯担心北约东扩一般，法国也日益担心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包括对北约军事部署的反制等。^②

（二）叙利亚冲突：从分歧凸显到寻求合作

叙利亚地处中东“心脏地带”，占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历来是大国拉拢和争夺的对象。在欧盟国家中，法国与叙利亚渊源最为深远：曾是其宗主国；二战后在戴高乐主义指引之下相互合作；冷战后则依托叙利亚，努力在中东与美俄两国形成牵制之势。^③可以说，叙利亚是法国中东政策的重要一环，也是法国构建大国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叙利亚则是其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

新世纪以来，在希拉克时期因哈里里遇刺事件，法叙关系一度疏远；在萨科齐就任初期，法国极力拉拢叙利亚，包括吸纳叙利亚加入“地中海联盟”，法叙双边经济关系取得新发展，但因巴沙尔政权并不赞同萨科齐组建政治联盟的行动，同时，又遭到美国的反对，法国未能签署向叙利亚出口空客飞机的合同，使得法叙关系陷入低谷。总体而言，在叙利亚冲突中，法国的对俄政策是在其中东政策的框架之下制定的，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1年3月-2012年5月）。2011年3月，叙利亚反政府抗议迅速升级为旨在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全面政治危机。法国将叙利亚内战视为“阿拉伯之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希望借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之机，时隔70年“重返中东”。因此，在萨科齐治下，法国在双边关系上、在联

① Luke Harding, “Russia: Any Country could be Next, Warns Ukrainian President”, *the Guardian*, 28 Aug, 2008.

② Isabelle Facon, “La Relation France-Russie à l’Epreuve”, *Annuaire Français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15, Vol. XVI, Centre Thucydide, Université Panthéon-Assas, p.124.

③ 赵纪周，“法国的叙利亚政策析论”，《欧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9-121页。

联合国框架下、在欧盟以及阿盟层面上，都努力推行和积极呼吁对叙利亚进行制裁。2011年11月，法国成为第一个提出对叙进行军事干预的西方大国。甚至在2012年3月，关闭了法国驻叙大使馆。

第二阶段（2012年5月-2015年9月）。奥朗德时期基本延续了萨科齐的对叙政策，同时态度更为积极，立场也更为激进。在“11-13”恐袭事件发生之前，主要通过两个步骤对阿萨德政权施加压力：首先，向政权施压。2012年5月驱逐叙利亚驻法国外交官；2012年8月，呼吁叙利亚反对派建立临时政府；2012年10月，依托欧盟对叙利亚进行经济制裁，2013年5月和2014年5月两次延期对叙制裁。其次，承认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法国是第一个承认叙利亚“全国联盟”的西方国家。2013年5月，法国在欧盟成员国中率先解除对叙利亚的武器禁令；2014年8月，奥朗德承认法国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此后，法国呼吁推翻巴沙尔政权，甚至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

2013年8月，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危机，越过奥巴马所谓的“红线”，对此，美国声称要对叙进行有限时间和有限规模的军事打击，法国紧紧跟随美国，但却未得到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公开支持。最终，在俄美沟通之下，两国通过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方案解决了该危机。^①2014年开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自我防卫条款，法国决定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空袭，奥朗德开始希望能与俄罗斯开展合作以打击“伊斯兰国”。^②法国媒体甚至强调“伊斯兰国”是法俄两国二战以来必须携手打击的第一个共同敌人^③。同时，基于一系列恐怖袭击以及难民危机的影响，加上法国在干预叙利亚事务上被孤立和抛弃，法国对叙政策逐渐松动。

之前，奥朗德的对叙政策建立在三个关键因素上：（1）法国不会参与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2）叙利亚冲突的政治解决前提是阿萨德政权的更迭；（3）伊朗不是法国的合作对象。然而，在2015

① N. Nougayrède, “Les Limites de l’influence Française”, *Le Monde*, 09.30.2013.

② “Le tournant russe de François Hollande”, *le Monde*, 11.18.2015, http://abonnes.lemonde.fr/idees/article/2015/11/18/le-tournant-russede-francois-hollande_4812568_3232.html?xtmc=hollande_moscou&xtcr=59

③ “Syri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s’allient contre Daech”, *Le Parisien*, 11.17.2015, <http://www.leparisien.fr/international/syrie-la-france-et-la-russie-s-allient-contre-daech-17-11-2015-5285791.php#xtref>

年8月28日的讲话中以及9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奥朗德宣布了他的叙利亚政策的重大转变。首先，他授权法国空军在叙利亚飞行以便收集情报，并且最终打击与“伊斯兰国”相关的恐怖组织据点。其次，对于阿萨德下台与否，奥朗德也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在2015年8月28日的讲话中，奥朗德认为阿萨德下台并非是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先决条件。这种灵活性可能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俄美外交努力密切相关，因为法国担心会再次出现类似于2013年美俄就叙利亚化武危机达成协议的外交“既成事实”。此外，奥朗德开始认为，伊朗将有助于政治方案的达成。^①在实际行动中则表现为，2015年9月，法国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首次进行空袭；在联合国层面，号召各国联合反恐。

第三阶段（2015年9月-2017年5月）。以2015年8月28日及9月8日奥朗德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示其对叙政策转变为标志，法国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发生了改变，重心从推翻巴沙尔政权转向打击叙境内的“伊斯兰国”。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9月，俄罗斯也开始在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然而，由于法俄两国对于冲突的解决方式南辕北辙，两国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多久。伴随着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逐步扩大，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在认知层面，奥朗德及其政府不再将与俄罗斯的合作视为对付“伊斯兰国”的必需选项；他还在道义上谴责俄罗斯，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安全威胁，会刺激极端化趋势，并增加法国本土的恐怖主义威胁。在行动上，在联合国框架内，法国与俄罗斯各提主张，互不买账，双方的分歧和对抗明显。2016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对停止阿勒颇战斗的两个草案进行表决，均未被通过：法国和西班牙提议设立禁飞区，该草案被俄罗斯否决；俄罗斯针锋相对，提出相反的议案，也被欧美否决。此外，2017年俄罗斯还抛开法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日内瓦和谈机制，与土耳其和伊朗等形成阿斯塔纳机制以推进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2017年4月，俄罗斯否决了由法国等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的决议草案，成为叙利亚内战以来连续第八次否决西方针对叙利亚问题的决议。

^① Simond de Galbert, “The Hollande Doctrine: Your Guide to Today’s French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SIS, Sep 9, 2015.

第四阶段（2017年5月-12月）：伴随着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成功当选法国总统，在叙利亚问题上，法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阿萨德是否下台不再是法国的首要目标，彻底铲除恐怖组织并促进叙利亚的和平稳定成为新政府在中东的主要任务；政治和外交手段成为取代之前的军事手段的重要方式。在此背景之下，马克龙强调与俄罗斯合作的重要性，并在马普会上达成共识。同时，马克龙也玩起了巧妙的均衡外交，指出法国与美国坚决捍卫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红线”。

可以发现，在叙利亚危机的初期，为了恢复法国“宗主国”的荣光和对中东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萨科齐一反追随美国的定式，力推军事干预政策。在奥朗德治下，价值观外交占据主导，对叙介入政策更趋明显，法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框架之内的分歧凸显，双边关系一度走低；然而由于俄美在化武危机问题上的走近，奥朗德在“有心无力”的尴尬处境中，只能逐渐改变其对叙政策。及至马克龙时期，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对俄政策更趋务实和灵活，开始寻找合作空间。

（三）乌克兰危机：在协调与制裁之间

2013年，继俄格冲突之后，在欧盟东部周边的乌克兰又爆发了重大的危机。此次危机以11月21日在“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欧盟伙伴联系国”协议为导火索。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乃是世纪之交以来，围绕着乌克兰究竟“西向”还是“东向”的区域合作选择，欧盟、俄罗斯与乌克兰三方之间进行博弈日趋白热化的必然结果。^①随后，基辅群众抗议，西方干预乌国内政治进程，2014年2月22日亚努科维奇辞职，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俄语区相继发生骚动；层层政治危机的叠加、乌克兰复杂的历史经纬以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自治区的军事介入，最终使得2014年3月18日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至此，俄罗斯与欧盟乃至整个西方的关系全面恶化，欧洲地区秩序发生冷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

可以说，在乌克兰危机初期，法国的反应就很迅速，时任法国外长的法

^① 冯绍雷，“欧盟与俄罗斯：缘何从合作走向对立？”，《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3页。

比尤斯积极参与，努力在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首领之间进行调解。

2014年5月，波罗申科当选新总统，他的当选得到了由乌克兰和欧安组织代表构成的工作小组的认可。2014年6月，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乌新晋总统波罗申科前往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主要原因有三：首先，二战中，乌克兰人曾作为苏联军队的一部分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①；其次，借此纪念活动，法国以官方的形式确认了波罗申科作为乌克兰新任总统的合法性；再次，纪念活动也邀请了普京，这为俄乌两国首脑之间的非正式对话提供了极佳的平台。

继2014年6月俄乌两国首脑会晤之后，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四国首脑就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在整个过程中，欧盟始终缺席，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被认为是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之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法国和德国斡旋的有效性将它们推上了整个欧盟“领导者”的地位，当然，这也为后来法德两国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交恶埋下了伏笔。

然而，2014年7月，马航客机坠毁事件却使俄乌冲突更趋激烈。2014年9月5日，在“工作小组”即乌克兰、俄罗斯、乌东部分离势力和欧安组织之间达成了明斯克协议I，但收效甚微。2014年12月6日，奥朗德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后，回程途中突访莫斯科，与普京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举行会谈，双方均认为乌克兰危机降温已时机成熟。

2015年2月12日，在法国和德国的共同推动之下，俄罗斯、德国、法国和乌克兰四国领导人签署了明斯克协议II，形成“诺曼底模式”，就长期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综合性措施及乌东部地区停火问题达成共识，但对克里米亚的归属没有详细的界定。截至目前，该协议的收效较为有限。首先，战火仍在延续；其次，乌克兰国内政治改革进展十分缓慢。但不管成效如何，法国和德国在建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对话机制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诺曼底模式是法国处理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外交成果。法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斡旋和调停，再次体现出法国力求扮演欧洲外交强国的意愿。

2016年2月22日和23日，法国新任外长艾侯（Jean-Marc Ayrault）与德国

^① Sanial Amandine, “Pourquoi l’Ukraine a finalement été invitée aux commémorations du Débarquement”, *Le Monde*, 06.05.2014.

外长施泰因迈尔 (Frank-Walter Steinmeier) 一起访问基辅, 并发表共同声明。在声明中, 两国外长共同谴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主权的侵犯^①; 强调明斯克协议II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 重申乌国内改革中反腐以及将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重要性。

然而, 逐渐地, 由于乌克兰国内改革推进不力, 2016年4月, 法国官方公开谴责乌克兰。4月19日, 外长艾侯直接批评乌克兰对明斯克协议II的低效实施难辞其咎^②, 指出: “基辅必须进行改革, 并且在宪法修正案中对顿巴斯的‘特殊地位’予以确认, 同时, 还要加快地区的选举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 在诺曼底模式下, 法德轴心强势复归。在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之后, 巴黎限制了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对话, 并且坚决贯彻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尽管“西北风”军售合同并未包括在制裁范围之内, 但法国还是搁置并最终取消了向俄罗斯交付“西北风”战舰。通观法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对俄政策, 可以发现: 在乌克兰危机中, 法国国内对于是否制裁俄罗斯、是否取消“西北风”军售合同有着很大的争议。法国国内的亲俄派认为, 必须取消对俄制裁, 例如2016年4月法国议会下院呼吁欧盟取消法国对俄罗斯制裁的决议。然而, 奥朗德却于6月同意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半年, 继续与欧盟成员国保持一致。关于“西北风”军售合同问题, 直到2014年5月, 法国当局还力排北约之异议, 并不打算取消“西北风”军售合同, 但是, 2014年9月, 奥朗德还是宣布要搁置该销售合同, 最终, 法国国民议会在2015年9月决定取消这份合同。

可以说, 在乌克兰危机中, 法国的对俄政策介于对话^③和制裁之间, 摇摆于大西洋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间, 但由于两国战略愿景不同、战略互信缺乏, 法国最终还是选择更为有力地去拥抱“大西洋主义”, 愈益与其大西洋

① Schmidt-Felzmann Anke, “Is the EU’s faile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the member states’ fault?”, *L’Europe en Formation*, 2014, No.374, pp.40-60.

② Avril Pierre, “Ayrault sermonne Kyiv et épargne Moscou”, *Le Figaro*, 04.21.2016; “Nous accusons”, *Kyiv Post*, 04.21.2016.

③ 比如, 2014年3月7日, 奥朗德表示, “法国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时, 还要保持与俄罗斯对话途径的畅通, 要让俄罗斯, 其实也就是普京总统能够及时抓住生命线”。参见: AFP, “Holland ne veut pas de référendum sur la Crimée sans l’accord de Kiev”, 03.07.2014. https://www.lexpress.fr/actualites/1/politique/hollande-ne-veut-pas-de-referendum-sur-la-crim-ee-sans-l-accord-de-kiev_1498301.html

盟友、欧盟伙伴国保持一致，不仅通过对俄制裁，而且通过取消西北风合同等举措来与俄罗斯对抗。结果，传统的法俄亲密关系显著恶化。

事实上，法国外交政策历来有“南向”而非“东向”的特征，毕竟，法国与南欧国家在经济和历史上有着更多的关联。法国其实对欧俄之间的缓冲区（如乌克兰）并不感兴趣。例如，在《世界报》上，乌克兰危机之前几乎没有文章关注乌克兰。法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介入，主要是为了提升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而法国在俄格冲突中的表现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法国和德国而非欧盟创立的诺曼底模式，表明法国在欧洲仍然拥有相当的话语权，毕竟处于俄西之间、作为优先对话者的法国，在制衡俄罗斯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相较于格鲁吉亚战争期间，法国的作用已然减退。这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奥朗德比萨科齐保守，不那么积极寻求担当领导者；第二，这符合奥朗德的外交风格，他更加强调多边主义和价值观；第三，符合法国的传统偏好，即对欧俄关系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避免扮演领头羊的角色。这一点尤为重要，毕竟在伊朗问题和叙利亚危机等一系列危机事件中，法国热切需要与俄罗斯的合作。^①此外，法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所奉行的路线，还体现了法俄双边关系色彩的改变，即近些年来法俄双边关系的淡化。^②

通过对新世纪以来发生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三个重大危机事件中法国对俄政策的观察，可以发现，法国所采用的，是传统的平衡战略。在格鲁吉亚战争中，萨科齐治下的法国起了主要的调停作用，萨科齐亲自出面斡旋俄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③；在乌克兰危机中，奥朗德提议建立诺曼底模式，又在叙利亚危机中从分歧凸显到寻求合作。同时，出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政治主张，法国的对俄政策逐渐地由冷战时期的传统“硬”权力政治走向崇尚多边主义和全球伙伴关系的“软”权力政治。

① B. Tertrais, “France and the Ukraine Crisis: A Delicate Balancing Act”,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10 Mar 2014, http://www.europeanleadershipnet.org/france-and-the-ukraine-crisis-a-delicate-balancing-act_1265.html

② Isabelle Facon, “La Relation France-Russie à l’Epreuve”, *Annuaire Français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15, Vol.XVI, Centre Thucydide, Université Panthéon-Assas, pp.117-118.

③ Владимир Чернег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Фран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7. №.5. С.44-53.

法国对于权力政治的追求还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即借助法国的文化资本、软实力来建构其在全球的大国地位。

然而，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三个危机事件中，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变化。在格鲁吉亚战争以及乌克兰危机早期，法国尽量不去激怒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中则甚至寻求与俄罗斯合作，毕竟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不容小视。然而，法国开始采用更为价值观导向的政策，包括持续支持制裁，取消与俄罗斯的西北风销售合同，甚至不顾国内的批评公开谴责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这一方面是新世纪以来法国政策渐趋欧洲化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其更加倚重软实力的缘故，强调需要寻找保持其国际作用及国际影响力的新途径。^①马克龙上台以来，这两种趋势可能会更为明显。

三、法国对俄政策的内外背景分析

对于法国的外交政策而言，很难用美国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诸如现实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等来简单地加以概括，而是常常会表现出不同于美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特点。比如，更加注重历史、国际法、文化，以及身份构建等^②。相应地，其对俄政策亦体现出这些取向。新世纪以来，法国对俄政策摇摆于戴高乐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间，一方面，受到其所处的国际及地区格局包括俄美欧三边关系的变化、欧盟和北约双东扩等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到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独特外交文化的影响及其国内精英对俄及法俄双边关系认知的牵引。

（一）转型中的国际及地区格局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并行不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陆续崛起，传统大国政治影响逐渐减弱，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世界越来越多元化。乌克兰危机之前，美欧呈现出既结盟又

^① Pernille Rieker, *French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Practising Grandeur*,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79.

^② 严双伍、陈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法国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第64页。

逐渐疏离的态势，而在俄欧之间相对接近和稳定的同时，俄美之间却相对疏远和起落（俄美关系既有“重启”又有低落）。^①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欧俄关系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巨变，从伙伴急剧恶化为敌人，欧美采取共同行动对付俄罗斯，俄罗斯与西方彻底交恶。特朗普当政以后，其对跨洋关系的消极态度，使得美俄欧三边关系扑朔迷离。在这种不均衡并且起伏不定的三边关系结构中，法国的对俄政策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法国一方面希望依托对俄政策，回归全球政治，但另一方面，受限于其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日益衰落的国家实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采取务实且灵活的外交。在乌克兰危机之前，法国总体上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有希望的、崛起中的市场；而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法国对俄的政治信心受到沉重打击^②，以“西北风”战舰军售合同的中止以及参与对俄制裁为标志，法俄双边关系走到低谷。直到马克龙上台，法俄关系才开始出现转暖迹象。

在地区层面上，欧盟是法国谋求其国家利益的重要载体和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来源。^③新世纪以来，欧盟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伴随着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在欧盟外交决策层面的举措增多，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欧盟的领导者^④；同时，欧盟东扩，中东欧国家群体性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法国在欧盟内部发挥作用的运筹空间^⑤，其影响力大幅减退。基于此，法国出现了疑欧主义并深刻反思其在欧盟内部的作用。在 2015 年法国国民议会上，法国欧洲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⑥，建议法国应更好地理解欧盟的运

① 冯绍雷，“冷战后欧、美、俄三边关系的结构变化及其未来趋势”，《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第8页。

② David Cadier, “Detour or Direction: The Europeanisation of France’s Policies towards Russia”, FIIA Briefing Paper 195, May 2016, pp.3-4.

③ Reuben Wong, “French Foreign Policy, Asia and Europe”, 5 Jun 2002, <http://www.lse.ac.uk/internationalRelations/centresandunits/EFPU/EFPUworkshop2002/paper%20-%20Wong.pdf>

④ 根据首家泛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10年至2016年的年度报告（European Foreign Policy Scorecard），可以发现德国在欧盟外交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和角色日益显著。参见 <http://www.ecfr.eu/scorecard/>

⑤ C. Lequesne, *La France dans la nouvelle Europe. Assumer le Changement d’échell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8.

⑥ Assemblée Nationale, “Rapport d’information Déposé sur l’influence Française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Rapport d’information 3468, Paris: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Européennes, 2015, p.9.

作模式，与欧洲其他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①这部分地解释了缘何法国对俄政策出现了欧洲化的趋势。^②此外，特朗普当政、英国宣布脱欧以来，美德疏离，使得法国有了更多周旋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法国在欧洲安全和防务领域仍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甚至在危机事件中代表欧盟采取单边行动^③，法国对叙利亚危机的干预就是一个例证。

在对俄政策和态度上，由于历史原因，中东欧国家与法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乌克兰危机给升温的法国-中东欧关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比如 2014 年波兰要求北约在其领土上部署军队^④；鉴于乌克兰危机的严重性，尽管中东欧国家并非法国外交政策优先考虑事项，法国还是调整了其对俄立场，与欧盟其他国家尽量统一步调。^⑤

对于北约，法国经历了从一度游离于北约之外到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再到力求在北约中发挥欧洲支柱的作用这样一个过程。一方面，欧洲防务依旧在法国的官方话语中出现，但另一方面，法国也调整着其实际行动，日趋务实，更加顺应北约。可以说，传统的法国北约政策主要受其“欧洲化策略”的影响，而其新时期对北约的态度，究其本质则是保持欧美势力均衡的表现。^⑥新世纪以来，经过法国的不懈努力，终于重返北约且成为北约主要的资助者和参与者。^⑦与此同时，2009-2017 年，法国人对于北约持支持态度的比例从 2009 年的 71% 下降为 2017 年的 60%，但 2017 年却比 2016

① Ibid, p.8.

② “Foreign Policy: Speech by M. François Holland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t the Opening of Ambassadors’ Week”, Paris, 25 Aug, 2015, <http://www.elysee.fr/declarations/article/speech-by-the-president-of-the-french-republic-at-the-opening-of-ambassadors-week/>

③ 也有学者认为欧盟在乌克兰危机处理上存在重大失误，欧委会对于俄罗斯的理解存在重大偏差，使得法国和德国在危机处理上一直处于纠缠纠错的状态，参见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French Historian: Europe is Wrong about Ukraine”, *Tribune of Geneva*, Jan 2015, <http://www.fort-russ.com/2015/01/french-historian-europe-is-wrong-about.html>

④ David Cadier, “Apr es le retour   l’Europe: convergences et contrastes dans les politiques  trang eres des pays d’Europe centrale”, *Politique Etrang ere* (3), Sep 2012, pp.573-584.

⑤ 法国与俄罗斯之间签订的“西北风”战舰合同，曾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引起普遍的担忧，最终迫于压力，法国还是取消了对俄的这笔大额军售合同。

⑥ J. Ghez, S.F. Larrabee, “France and NATO”, *Survival*, 2009, Vol.51, No.2, pp.77-90.

⑦ Fr ed eric Pesme, “France’s ‘Return’ to NATO: Implications for its Defence Policy”, *European Security*, 2010, Vol.19, No.1, p.48.

年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以及保守的共和党都支持北约。^①

（二）战略权衡而非经济考量

尽管法俄有着“特殊伙伴关系”，但长期以来，法俄的经济纽带远不及俄罗斯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②整个20世纪90年代，平均而言，俄罗斯仅占法国外贸的1%。新世纪以来，法国逐渐稳固了其在俄罗斯市场中的地位，尤其是自2009年以来，法国占俄市场份额突破4%，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4.4%和4.1%。^③2012年，法国恢复了其作为俄罗斯的第二欧洲供应国的地位。2013年，成为对俄罗斯第八大出口国。^④根据法国海关的数据（参见图1）。2012年法国对俄贸易逆差为30亿欧元，少于2011年的65亿欧元。^⑤就其结构而言，法俄双边贸易有利于俄罗斯。俄罗斯对法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其他则主要是冶金和化工产品^⑥，而法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则呈现多元化的势头，其中高科技产品份额最多（参见表1）。^⑦俄罗斯是法国的第一大原油供应国（占法国市场份额的14.4%）和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商（占法国市场份额的16.9%）。^⑧

① Bruce Stokes, “NATO’s Image Improves on Both Sides of Atlantic”,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23,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2017/05/23/natos-image-improves-on-both-sides-of-atlantic/>

② Laure Deltour, “France-Russie: la Réinvention d’une Relation Spécifique”, *DGAP analyse*, No.6, Juil 2010, p.8.

③ 转引自 *Russie 2014 Regards de l’Observatoire franco-russe*, sous la direction d’Arnaud Dubien, 18 avril 2014, Paris, Questur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p.64.

④ *Russie 2014 Regards de l’Observatoire franco-russe*, sous la direction d’Arnaud Dubien, 18 avril 2014, Paris, Questur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p.64.

⑤ *Ibid*, p.65.

⑥ *Russie 2013 Regards de l’Observatoire franco-russe*, sous la direction d’Arnaud Dubien, 18 avril 2013, Paris, Questur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p.65.

⑦ *Ibid*, p.114.

⑧ *Ibid*, p.65.



图1 2002-2012年法国对俄罗斯进出口变化 (单位: 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 Russie 2014 Regards de l'Observatoire franco-russe, sous la direction d'Arnaud Dubien, p.68.

表1 2001-2010年法国在俄罗斯主要领域的市场份额

	2002-2005 年平均	2006-2010 年平均	2010 年
高科技产品	6.2%	6.5%	6.9%
<i>包括</i>			
航空及太空产品	19.2%	38.9%	49.2%
医疗及精密仪器, 光学产品	5.3%	5.6%	4.9%
药学技术产品	8.2%	8.5%	9.7%
计算机及打印设备	6.6%	1.5%	0.7%
中高端技术产品	5.2%	4.0%	3.7%
<i>包括</i>			
汽车和拖车	3.8%	2.4%	2.7%
电力和电子设备及装备	5.6%	4.9%	4.5%
机器	3.7%	3.0%	2.5%
化学产品 (不包括药品) 和化妆品	9.8%	9.5%	8.0%
中低端技术产品	2.6%	2.6%	2.5%
低端技术产品	3.3%	3.0%	2.5%
<i>包括</i>			
纸张、硬板纸和印刷产品	3.3%	1.8%	1.3%
纺织品、布料、皮革、鞋	3.0%	2.9%	2.0%
食品、饮料、烟草	3.6%	3.5%	3.1%

资料来源: "Russie 2013 Regards de l'Observatoire franco-russe", sous la direction d'Arnaud Dubien, 18 avril 2013, Paris, Questur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p.111.

在战略利益层面，法国的外交定位是要构建以法国为领导的“欧洲人的欧洲”。在此定位指导下的对俄政策，一方面要反对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主导地位，维护法国的独立主权，在美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平衡，以实现法国的大国地位，并反对美国对西欧事务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要以俄罗斯为依托，制衡德国在欧盟内部的主导地位，同时，基于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向亚太地区转移，法国日益需要借助俄罗斯以延伸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的影响力。^①尽管欧俄在欧盟边界问题、法俄在叙利亚问题上龃龉不断，甚至相互制裁，但欧洲的安全始终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法国作为欧洲核心国家和俄罗斯的“特殊伙伴”，可以顺势发挥重要作用，重开俄融入欧洲之路。并且，随着欧盟东扩、德国再次崛起，法国在欧洲地位相对下降，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有助于提升法国的国家地位。在全球层面，法国和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而且在推动多极化、维护海上安全、反恐等一些列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看法相近，开展了广泛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②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危机倒逼着法国调整其对俄政策，推动对俄关系再平衡，特别是努力减少能源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2014年夏，法国出台《能源过渡法案》，此前奥朗德还与时任波兰总理图斯克提出了一项关于成立欧盟能源联盟的共同倡议，以降低当前欧盟国家在能源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确保欧盟地区的天然气供应。此外，法国近年来因为自身实力下滑较快，原有的全球外交模式难以为继，国家哲学逐渐从理想回归现实，更加注重经济外交；同时强调“将与欧盟伙伴国家和盟国，特别是美国，一道努力”，释放出进一步向西方盟友靠拢的明确信号，逐渐从戴高乐主义向大西洋主义回摆。^③

可以发现，法国虽然注重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往来，但实际上彼此在对方经济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存在着一种非对称性的双边经济关系，这种贸

①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I'm not sure if Russia needs Europe but Europe needs Russia-French historian", 4 Oct 2010, <https://www.rt.com/politics/helene-dencausse-russia-europe/>

② 周谭豪：“法俄关系：今生难续前缘？”，《世界知识》，2014年第19期，第39页。

③ 同上，第39页。

易关系更加有利于俄罗斯。但即便如此，法国还是保持与俄罗斯的“特殊伙伴关系”，主要是出于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考量。随着新世纪以来三次危机的爆发，法国对俄政策渐趋强硬^①，其实也依旧是其战略权衡的结果。

（三）外交文化：价值观及欧洲定位

除了以上的结构性因素、战略考虑之外，法国的对俄政策还受到其外交文化的影响。

首先，法国外交较为强调保持独立的话语权及行动力的必要性。当年戴高乐深知法国国力日下，在此情境之下，只有依靠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才能保证其安全，并且重建其伟大。一个伟大的国家，其外交也势必是独立和自由的。^②作为左翼的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也于2015年8月28日重申，法国外交的独立性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标签，同时也是法国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这一点其实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很相似。也正是基于此，法美两国的独立立场常常会给双边关系注入紧张气氛，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法美立场的分歧。然而，法国的外交文化还主张在既要坚持其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向美国靠拢看齐，新世纪以来法美之间的盟友关系始终是其外交战略考量所在。

尽管法国外交有着独立性，但是其外交政策常常因为不够灵活、不实用而广受批评，这一点在叙利亚危机中表现得较为充分。法国对于叙利亚危机的强硬观点被其盟友误解，包括美国。法国的批评者一般会强调法国执着于原则的外交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这种刻板性并非源自意识形态，而是其原则文化倾向使然。法国不喜欢在互相矛盾的目标基础上达成妥协，这一点被认为是法国与其他世界大国之间分歧和危机的潜在原因。

其次，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赋予法国开展全球外交的合法性。因此，法国多年来跟美国一样，决定保持其在全球的外交网络，同时法国也自觉承担与全球事务相关的多边倡议，主要是通过联合国，同时也通过一些替代性的多边形式。2015年8月25日，奥朗德指出，“法国必须为我

^① Thomas Gomart, “France’s Russia Policy: Balancing Interests and Valu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7, Vol.30 No.2, p.148.

^② [法]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吕一民、沈坚、黄艳红等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60页。

们的理念、为我们所居住的地球采取行动。”这为我们理解法国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峰会上的表现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从这个角度说，法国的文化基因中有着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和美国的救世主精神相一致的部分。

再次，出于欧洲认同的需要。法国外交界相信全球化使得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度日维艰，倘若他们不众志成城，是很难显示权利和维护稳定的。因此，尽管欧盟共同的外交与防务政策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法国还是对之予以支持。法国希望通过建构统一的欧洲来扩大或者加强它自身的行动。^①在乌克兰危机中，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呼吁防范“零极世界”的风险；面对美国全球的战略收缩，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法国一方面需要力推欧洲合作和力量整合^②，另一方面需要强化其在欧盟和北约中的战略地位，寻求与美国更为紧密的合作。^③

（四）法国对俄及双边关系的认知

一国对他国、对双边关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等观念的因素是探究该国外交政策的根源，而且这些因素也势必会对该国的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循着法国国内对俄及双边关系的认知轨迹，可以观察到法国对俄外交政策的变迁曲线。

1、对俄认知：伙伴还是工具？

法国的外交政策深深根植于其对普京治下俄罗斯的相互矛盾的解读：既将俄罗斯视为不断进步的民主政体，同时也认为它是一个日益衰退的威权政体。这种矛盾的看法使得界定政策的优先级变得困难，同时也要求法国政界在价值观和利益之间做出稳重的权衡：最终目标是将俄罗斯定位于欧洲，还是借俄罗斯来谋求法国在欧盟、跨大西洋对话中更多的权衡空间，即：视俄

① Simond de Galbert, “The Hollande Doctrine: Your Guide to Today’s French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SIS, Sep 9, 2015.

② Portland USC Centre on Public Diplomacy, “the 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2017”, p.42; “Macron Presents Vision for Post-Brexit Europe”, AFP(Paris), 26 Sep 2017, <http://www.breitbart.com/news/macron-presents-vision-for-post-brexit-europe/>; Lara Marlowe, “Macron has big plans for France and Europe”, 19 Aug, 2017, <https://www.irishtimes.com/business/economy/macron-has-big-plans-for-france-and-europe-1.3189606>

③ “Entretien avec Laurent Fabiu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uropéennes”,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2013/1, No.89, pp.51-65.

罗斯为伙伴还是工具？

总体而言，在法国的政治光谱中，存在着对普京治下俄罗斯的七种解读，前三种持批评态度，后四种不乏溢美之词。

前三种敌视态度主要分布在法国的外交精英、媒体、学界和民意中，他们对俄罗斯进行了公开的批评：第一种是“人权捍卫者”，他们担心俄罗斯的民主被镇压；第二种则担忧帝国主义的死灰复燃；第三种关注于俄罗斯在军售和核扩散问题上的模糊定位。^①在法国外交精英中，他们似乎正在逐步摒弃传统的“戴高乐主义”，而是更多地转向大西洋主义。在社会层面，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2007-2015年，法国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的比例从2007年稳步攀升，至乌克兰危机时开始明显下滑，2013年，有64%的法国人对俄罗斯持批评态度^②，而2014年和2015年，则分别有71%和72%的法国人对俄不满。^③法国主流媒体对于俄罗斯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对俄罗斯国内政体的批评。

另四种观点则对俄罗斯充满了信心，对俄罗斯的稳定发展较为乐观。第一种观点聚焦于全球权力均衡，他们视俄罗斯为有价值的战略伙伴。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是，在2015年，一批议员认为法国对俄态度太消极，提出要删掉法国国防预算案中的“俄罗斯正在回归权力政治”这句话。^④在每一个政党中，都存在着对于“俄罗斯因素”的坚定支持者，部分左翼人士比如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enement），一直提倡与俄罗斯进行合作，且在实际行动中作为法国驻俄特使而发挥着作用。^⑤极左翼则出于反美立场，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统一调门。与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较为妥协的态度相吻合，右翼人士诸如前总统萨科齐，则含蓄地承认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所

① Daniel Vernet, “Le désordre règne à Moscou”, *le Monde*, 10.17. 2006.

② Jacob Poushter, “Countdown to Sochi Olympics: What the World Thinks of Russia”, Pew Research Center, 31 Jan, 2014,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01/31/countdown-to-sochi-olympics-what-the-world-thinks-of-russia/>; “Survey Report, Global Opinion of Russia Mixed: Negative Views Widespread in Mideast and Europe”, Sep 3, 2013, <http://www.pewglobal.org/2013/09/03/global-opinion-of-russia-mixed/>

③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2 and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4”, <http://trends.gmfus.org/>

④ 这一修正案最终却被否决，参见<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14/cr/2014-2015/20150252.asp#P546367>

⑤ “Franco-Russian Relations: A Long Way to Go”, 8 Dec 2012, https://sputniknews.com/voicofrussia/2012_12_08/Franco-Russian-relations-a-long-way-to-go/

作所为。^①

第二种观点关注经济，认为俄罗斯市场是法国的重要机会。第三种观点充满了对普京的仰慕，认为他是类似于戴高乐的、在国际舞台上坚定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和独立的最后一位“真正的政治家”。^②持这些观点的比如疑欧派和主权主义者，他们认为，在反对民族国家瓦解、寻求独立外交方面，是与俄罗斯站在同一战壕里的。这三种认知主要分布在法国非外交的政界和商界。与此同时，在市民社会层面，众多的俄罗斯移民活跃于非政府组织中，他们的工作得到俄罗斯文化外交政策的大力支持，卫星（sputnik）新闻网站是他们工作的重要界面。^③

2、对法俄关系的认知：信任-怀疑-摇摆

尽管新世纪以来，法俄双边经济往来有所增加，但法国的政治关系与贸易的增长之间，却并非是完全正相关的关系。法俄关系的政治化，是反俄阵营中观点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与克宫一起介入将是一个危险的组合。俄罗斯外贸银行（Vneshtorgbank）在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EADS）取得股份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决定向外国公司关闭希托克曼气田（Shtokman field），都让法国当局大为惊讶。这些决定让巴黎担心俄罗斯的真正意图：是想破坏稳固的法德关系还是要将法德与美国拉开距离？^④

乌克兰危机之前，法俄双边关系总体向好，双边互信，法国精英层总体对双边关系抱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首先，认为法俄两国间有着稳固的制度性交往框架。两国主要通过部长级政府间会议的形式进行接触。在两国外长和防长之间设有安全事务合作委员会，在2002-2012年间共举行了11次会议。在经济领域，双边关系有着CEFIC（le Conseil économique, financier,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经济、金融、工业及商业理事会）框架。双边议会关系得到法俄议会委员会（Grande Commission parlementaire France-Russie）的支撑，在法国国民议会和俄罗斯

① “Nicolas Sarkozy légitime l’annexion de la Crimée par la Russie”, *le Figaro*, 02.10. 2015.

② Lilia Shevtsova, “Putin’s Legacy: How the Russian Elite Is Coping with Russia’s Challenges”, Carnegie Moscow Center Briefing 8, Jun 2006, No.4, p.2, http://www.carnegie.ru/en/pubs/briefings/Briefing-2006-04-web_en.pdf

③ Matthias Waechter, EU-28 Watch, by 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Politik, No.11, Oct, 2015.

④ Thomas Gomart, “France’s Russia Policy: Balancing Interests and Values”, pp.147-148.

杜马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①

其次，认为法俄两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国际化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景，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立场接近，在重大战略问题包括反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等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基于国际秩序国际化的共同愿景，法国推动 G20 的努力得到了莫斯科的大力支持。此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俄两国都认为对国际事务有着责任。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法国一直认为欧洲大陆的安全需要俄罗斯。这种视角成为法国对俄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基础。法国是欧俄四个空间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努力将俄罗斯纳入欧盟安全的倡议之中，同时还倡议设计新型的欧洲安全架构。在一些人看来，法俄关系有助于巴黎为其多极化的愿景添砖加瓦。作为全球伙伴，莫斯科已经扩大了其能为巴黎提供的外交选项范围。比如，法俄双边关系被认为是一种定位欧俄对话的方式；巴黎认为莫斯科是处理伊朗问题的一个关键伙伴。法俄两国总统之间持续的个人纽带关系，也有利于缓解紧张局势，并且在特定情况下能促进一些危机的缓解。

然而，伴随着新世纪以来三次危机事件的爆发，法国精英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在悄然发生改变，他们逐渐不再信任俄罗斯，对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心存疑虑，不再认为欧洲的转型必然需要与俄罗斯的合作。^②同时，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在蔓延。^③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又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即，尽管美国公然敌视俄罗斯，但法国主流媒体包括《世界报》等，依旧毫不掩饰他们对于马克龙调整对俄政策的欢呼。^④法国媒体中所出现的这种共识，反映出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上层社会中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法国学界也主张反思法俄双边关系，在重新界定法国国家利益的基

① Isabelle Facon, “La Relation France-Russie à l’Epreuve”, p.118.

② Ibid, pp.121-122.

③ Arnaud Dubien, “Indifference Threatens Russia-France Relations”, 4 Oct 2017, <http://eng.globalaffairs.ru/book/Indifference-Threatens-RussiaFrance-Relations-19029>

④ 《世界报》欢呼马克龙将抓住“欧洲时刻”，“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重商孤立主义背景之下，欧盟必须强化其在当前国际重大事件上的身份认同，包括：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和全球变暖。”这种观点得到法国左、中、右三种政治色彩的报纸的一致赞同。右翼的《费加罗报》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有利于法国，十分赞赏马克龙对于会晤时机的把握；《自由报》也为此欢欣鼓舞。

础之上，深度审视法国对俄政策。^①马克龙可能不会再对美国马首是瞻，而是在重振欧洲的基础上向更紧密的法俄关系回归。^②

总 结

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法国的对俄政策是在法国经济增长乏力、大国地位日渐衰退、俄美欧三边关系发生重大转型、欧盟和北约双东扩、法国对俄认知变迁的多重背景之下制定的。在法国的国家利益中，其战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经济利益，而且由于法俄双边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法国对俄罗斯的战略依赖要更多一些。法国一方面要维护其大国地位，但由于经济不景气，只能更多地借助于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文化资本以及在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位，来赢取转圜空间并进而运筹帷幄。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短短十七年，对于法俄之间跨越三个世纪的双边关系而言，只不过是短短一瞬，是漫长法俄关系史中的一个小小篇章。这就决定了，这一短时段内法俄双边关系的发展，离不开长时段法俄双边关系历史规律的惯性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法国对俄政策游走于戴高乐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间，这一特点是由法俄双边关系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正如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所认为的，俄德之间是围绕着“所有权目标”而展开关系的，比如在领土、人口及东欧的合法性等方面的争夺；而法俄关系则更多的是围绕着“环境目标”而展开的，双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环境以及地区格局的影响。^③正

① Arnaud Dubien, “Reconstruire la Relation Franco-russe”, p.24.与此同时，法国学界和外交界精英也围绕着法国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比如 Thierry de Montbrial, Thomas Gomart, *Notre Intérêt National: Quelle Politique Etrangère pour la France?*, Editions Odile Jacob, Janvier 2017.其中，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提出法国需要摆脱美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对俄罗斯采取较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以增强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参见该书第86页。

② 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法国自2011年以来就支持北约进行的旨在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战争，马克龙则提出可以在大马士革重开法国大使馆，甚至提议与俄罗斯开展更为紧密的反恐合作。参见“Russian Reactions To The Putin-Macron Meeting”, 2 Jun 2017, Special Dispatch, No.6949, <https://www.memri.org/reports/russian-reactions-putin-macron-meeting>

③ Pierre Hassner, “Western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the USSR”, *Daedalus*, Winter, 1979, Vol.108, No.1, pp.113-151.

是基于这种本质属性的考量，法俄之间大体上能维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而德俄之间则要么甘之如饴，要么视对方如仇讎。^①也正基于此，法俄双边关系一方面延续了冷战时期的特点，具有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但同时因为地缘因素的牵制，也体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从未走向彻底恶化。

第二，法国对俄政策远远超出了法俄双边关系的范畴。法俄两国在国际上相互借重，法国要借助俄罗斯来制衡美国和德国，而俄罗斯则希望借助法国来削弱北约和动摇西方联盟，两国关系中更多的是关注于实现多边目标^②而非双边的关切，更多地呈现出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其实，回望长时段法俄关系史，也可以发现两国间分分合合、起起落落背后的历史定律。早在18世纪，法国国力强大，与德国、俄罗斯都有直接的敌对举动，但是到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败北，法国精英开始认识到，单纯依靠一己之力已无法击败德国，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俄罗斯则为法国提供了模仿的榜样。于是，1891年法俄正式缔结联盟，两国形成一种相对“紧密”的关系。而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对苏联推行东方缓和政策，以及在该政策框架下形成了法苏（俄）特殊伙伴关系，德国因素和美国因素都是法国制定对俄政策不能绕开的关键考量。法国正是通过构建其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殊地位来提升自身的地位，从而实现其外交政策的目标。

第三，囿于自身实力不足，法国在胸怀“世界使命”的同时，在对国际、国内局势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巧妙借助外力来博取其国际战略空间；通过或接近或疏远对手，主动在东西方之间承担优先对话者、调停者或者中间人的角色；将危机解决纳入到多边机制和多边框架中以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其全球影响力。新世纪以来，法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伴随着其国家实力的逐渐式微，法国谋求国家利益的途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对“硬实力”的倚重逐步转变为对“软实力”的借助。根据2017年7月英国公共关系机构波特兰战略传播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软实力”^③排名，法国跃居全球第

① Angela Stent, “Franco-Soviet Relations: from De Gaulle to Mitterand”, Report to National Council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 Mar 1989, p.2.

② Ibid, p.4.

③ “软实力”概念最初由美国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但现在随着数字革命，该概念的内涵得以扩展，偏向于指协作、构建新的网络和联系的能力。

一，超过英国和美国。法国发达的外交网络、丰富的文化积淀以及马克龙在合作和一体化方面的政策，都是其软实力独占鳌头的助力。^①

第四，法国的对俄政策一直游走于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国家利益与价值关切素来是法国对俄外交的两个思考角度，新世纪以来的法国对俄政策也是始终摇摆于二者之间。然而，法国左右逢源式的、“夹缝型”的对俄政策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雷声大，雨点小；在国际秩序中不能独立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其实也是由法国的中等国家实力决定的。在此情势之下，法国日益将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位与其所处的欧盟情境结合起来，力图通过重新整合的欧洲和德美嫌隙来扩大法国的影响力。^②

马克龙治下的法国对俄政策，将依旧受制于这些历史定律的影响，将在对法国国家利益以及所处的全球及地区的结构性因素进行深入考量的基础上制定。以“法德双核”为推进器的欧盟转型将更为深刻地影响法国的政策，其中德国的作用将十分关键，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的强势制衡也将十分重要。但同时，基于俄罗斯对于欧洲整体安全及和平的重要性，法国也会避免与俄罗斯之间永久性的、结构性的冲突关系。^③马克龙在对俄政策上可能会发生话语的改变，侧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但却不会改变总体的方向：即在坚持欧盟立场的基础之上，在多边主义的推进之中，一方面与美国紧密合作，另一方面尝试与俄罗斯建立新型合作关系。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France's Russia policy has swung between Atlanticism and Gaullism, balancing between values and interests. On the whole, since 2000, for the evolution of France's Russia policy under the three presidents, it has mainly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balance strategy, but gradually with a shift from benefit orientation to value orientation. Actually, France's Russia policy has been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both at home and

① Alex Gray, "France Becomes the World No 1 for Soft Power",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7/07/france-new-world-leader-in-soft-power/>, 27 Jul 2017

② [法]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第 1660 页。

③ David Cadier, Detour or Direction: The Europeanisation of France's Policies towards Russia, FIIA Briefing Paper 195, May 2016, p2.

abroad, primarily including Europe-U.S.-Russia triangle relationship, the enlargements of both the EU and the NATO, French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nd its domestic elites' perceptions towards Russia and France-Russian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France under Macron relies on the core of constructing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dheres to balanced principles among the U.S., Russia and China by strategic means of multilateralism, aiming at achieving the "French dream".

【 Key Words 】 French Foreign Policy, France-Russia Relationship, Russia-Europe Relationship, Russian Diplomacy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нового века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колеблется между атлантизмом и Голлизмом, время от времени ориентируясь то на ценности, то на интересы. Начиная с 2000 г.,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трёх президентов Франц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а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но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ереходила от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на интересы к ценнос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На политику Франц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лияют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факторы, как внутренние, так и внешние, в том числе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расширение НАТО и ЕС на восток,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 Франции и восприятие французскими элитами России 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Франц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од властью Макрона французы будут полагаться н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ЕС как на ядро сво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ь как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румент,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принципа равновесия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мечт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Франции, францу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欧亚经济**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经济障碍与现实选择——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GMR-CGE***

丛晓男**

【内容提要】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作备受关注，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被认为是一种可能性较大的选项。通过构建全球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对双边关税削减的不同组合开展情景分析，可知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壁垒的下降使中国受益明显，但欧亚经济联盟受益程度较为有限，仅能在中国积极减税而自身保守减税的情景下实现经济福利的小幅提升。欧亚经济联盟产业结构偏重资源产品和重工业，民生相关产业发展较滞后，居民消费大量依赖进口产品，这些结构性因素是导致其无法有效利用中国市场开放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推进的最大经济阻力。当前欧亚经济联盟将关税壁垒削减议题排除在双边 FTA 谈判之外的原因，也在于此。短期来看，欧亚经济联盟倾向于同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中小型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避免对其经济系统产生较大扰动。

【关键词】 欧亚经济联盟 欧亚经济联盟产业结构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中图分类号】 D7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8)01-0082(30)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极航道的发展前景、经济影响与中国的参与机制”（项目批准号：15CGJ024）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国家经济安全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批准号：41171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丛晓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引言

欧亚经济联盟是成立于后苏联空间的重要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它脱胎于2010年建立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目前包含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五个成员国。^①欧亚经济联盟旨在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展现了俄罗斯重新整合欧亚地区的战略意图，是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强化对欧亚地区影响的重要一步。^②作为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国际经济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建立后迅速引起全球关注。

欧亚经济联盟正在积极同其他经济体建立广泛的经贸合作关系。其中打造以双边层面为主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网络，是其与外界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形式，^③其终极目标是同欧盟和中国等大型贸易伙伴达成全面的FTA。^④2015年5月，越南成为首个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FTA的经济体，此外还有40多个国家和组织表达了相关合作意愿。^⑤中国是欧亚经济联盟FTA网络的重要对接对象。欧亚开发银行将欧亚经济联盟的FTA对接对象分为“已签署”、“谈判中”和“潜在候选者”三类。截至2017年5月，正在谈判和潜在候选者分别有7个和6个，中国被列为谈判中对象。^⑥

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空间上具有一定

① S.P. Roberts, A. Moshe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 case of reproductive integration?”, *Post-Soviet Affairs*, 2016, Vol.32, No.6, pp.542-565.

② N. Popescu, “Eurasian Union: the Real, the Imaginary and the Likel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4, Vol.24, No.1, pp.153-181.

③ 即使从全球范围看，区域贸易协定（RT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和自由贸易协定（FTA）也在快速扩张。截至2017年7月30日，全球已生效的RTA共有296项，其中FTA共244项。2009年之后签署的RTA共138项，其中FTA共117项，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RTA和FTA数量几乎增长一倍。详见世界贸易组织RTA数据库，<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④ E. Vinokurov,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Current state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Vol.3, No.1, pp.54-70.

⑤ 弗拉基米尔·普京：“寻求开放与平等的合作”，《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1日。

⑥ E. Vinokurov, M. Demidenko, D. Korshunov, V. Pereboev, T. Tsukarev, R. Gubenko and E. Khmarenko,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2017”, Report 43,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Centre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2017.

重叠性。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也是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个重要空间。加强与俄罗斯主导下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系、共同推进地区合作，是必然趋势。^①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深入推进经贸合作高度关注，双方就建立自贸区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接触与交流。2015年5月，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欧亚经济委员会关于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的联合声明》，表示拟致力推进双边FTA建设；2016年6月，中国商务部和欧亚经济委员会共同签署了《关于正式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FTA谈判。目前，前三轮谈判已分别于2016年10月、2017年1月、2017年4月完成，双方就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海关合作和知识产权等议题进行了积极磋商，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FTA被认为是加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的一种较为现实的形式，将有助于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对接合作模式。当前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其前景较为光明。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双方在某些领域存在较大分歧，达成全面FTA的难度较大，对其顺利签署持保守看法。因此，在谈判持续推进的形势下，有必要对以下问题予以回应：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经济与贸易影响如何？欧亚经济联盟为何撇开最为核心的关税削减问题不谈，而选择推进签订一个“半成品”FTA？^②未来该FTA的现实出路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辨识各方的潜在立场，发现FTA推进的主要经济障碍并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法，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 J. L. Wils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China’s silk road: implications for the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hip”,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6, Vol.17(sup1), pp.113-132.

② 根据《关于正式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双边贸易谈判暂不涉及互降进口关税问题。详见中国商务部：“欧亚经济联盟同中国启动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2016年7月1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607/20160701351179.shtml>

二、欧亚经济联盟FTA相关研究综述

（一）欧亚经济联盟FTA推进策略

欧亚经济联盟FTA网络推进策略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想通过打造FTA网络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为自身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外在需求动力。由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市场体量较小，需要借助域外市场以扩大出口，构筑“欧亚壁垒”并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隔离的行为对其经济而言是致命的。^①另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又对强化对外贸易、参与全球化过程存有疑虑，存在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各成员国的再工业化，并建立商品、服务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空间。由于其整体工业化水平低、出口结构偏重资源品，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无法与其他经济体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盲目深化对外经贸合作将使其失去互利共赢的经济基础。^②因此，在再工业化时期，为减轻产业所受进口冲击而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措施，有一定必要。但同时，这也给欧亚经济联盟的对外贸易合作制造了较多制约因素，对其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市场开放程度等形成较多限制，掣肘欧亚经济联盟在国际贸易中的作为。

由于欧亚经济联盟在推进FTA网络建设中存在上述矛盾心态，即，既要寻求世界市场，又要通过一定的贸易保护来推进再工业化，这就决定了其在选择FTA合作对象时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在俄罗斯的主导下，欧亚经济联盟在选择FTA达成对象时必须满足三条标准，即，（1）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俄罗斯的地区主导性地位；（2）具备一定经济体量为联盟发展提供经济动能；（3）不能具有完全超越俄罗斯的经济优势。^③这些标准在历史上就曾经影响了俄罗斯-欧盟FTA的建立。早在20年前，俄-欧FTA的设想就曾提出过，但由于欧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对俄罗斯关税水平本就很低，俄罗斯-欧盟

① E. Vinokurov,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Current state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Vol.3, No.1, pp.54-70.

② 王维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经济学分析”，《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第70-73页。

③ 顾炜：“欧亚经济联盟的新动向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6期，第36-49页。

FTA很难使俄罗斯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①，这是该FTA至今仍未达成的重要原因。由于俄罗斯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最大经济体（2016年俄罗斯GDP占欧亚经济联盟GDP的86.6%），对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贸易政策有较强的主导性，俄-欧FTA的难产，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欧亚经济联盟-欧盟FTA的前景。一些经济模拟结果显示，即使欧亚经济联盟能够与欧盟达成FTA，俄罗斯也只能在资源产业方面受益，而其蔬菜、水果甚至汽车产业都将面临负面冲击，^②这无疑给FTA的签署带来阻力。欧亚经济联盟-欧盟全面FTA的建立需要长期分阶段才能实现^③，甚至有学者推断，即使按照最乐观的进展估计，也需要到2021-2024年才能达成。^④从实际推进情况看，除中国、印度外，欧亚经济联盟FTA的谈判和潜在候选对象均为小型经济体。

（二）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可行性研究

欧亚经济联盟对FTA谈判对象的选择标准，也必定在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推进中有所体现。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可行性和经济影响开展了研究，其中既有积极观点也有消极观点。一些学者建议，应当将签订FTA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内容抓紧推动，另有一些学者则对该FTA的可行性和经济效应持怀疑态度。积极的观点一般认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有着巨大的贸易合作潜力，双方结成FTA的可能性较大。为此，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开展了一系列定性与定量研究，用以支持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可行的结论。^⑤

① P. Brenton, Tourdyeva Natalia, Whalley John, “The Potential Trade Effects of an FTA between the EU and Russia”,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97, Vol.133, No.2, pp.205-225.

② G. Felbermayr, J. Gröschl, 2017, “Free trade from Lisbon to Vladivostok: Who gains, who loses from a Eurasian trade agreement?”, CESifo Forum. Ifo Institute - Leibniz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 2017, pp.52-62.

③ E. Vinokurov, P. Balás, M. Emerson, et al., 2016, “EU-EAEU in Greater Eurasia: Long-Term Agenda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Workshop Report, IIASA proje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in a Wider European and Eurasian Space”, IIASA, Laxenburg, 2016.

④ E. Vinokurov, 2014, “Mega Deal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Munich: MPRA Paper No. 61802*, 2016, <http://mpra.ub.uni-muenchen.de/61802/>

⑤ 邓羽佳、秦放鸣：“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效应及潜力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第55-65页；周延丽：“抓住核心要素打造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利益共同体”，《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第78-81页。

在一些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积极看待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发展前景的同时,另有部分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则对该FTA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表示怀疑,对其发展前景表示担忧。^①其基本依据是,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从FTA中获得的经济效益不对等,同中国签订全面的FTA将使欧亚经济联盟的产业处于危险境地,从而使FTA合作更有利于中国而非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基于这一顾虑,尚无法同中国签订全面的FTA,而只能将谈判议题限定在海关管理和资本流动等非关税领域。^②

上述分歧主要体现在 FTA 对欧亚经济联盟影响预估的差异上。国内学者多从中国所受经济影响开展分析,强调该 FTA 能给中国带来正面的经济刺激,相较于国外学者,他们对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的签署多持积极观点。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更多考虑了欧亚经济联盟所受负面经济影响,并据此对该 FTA 的可行性提出质疑。本文认为,影响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可行性的核心问题,并非欧亚经济联盟的市场潜力与中国的经济受益程度,而是欧亚经济联盟能否从中获得足够经济利益的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研究多从地缘政治视角切入,较多强调了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及其维护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所起的作用,这对于从战略高度理解FTA签署过程中的机制障碍和地缘态势具有一定帮助,但对各方真实的经济损益情况,以及由此导致的谈判立场差异,仍缺乏深入分析。国内的经济学分析多着眼于双边贸易潜力核算,更多关注该FTA可能给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忽视了对联盟的负面影响,这显然有失偏颇。有鉴于此,本文认为,需要从国际经济学角度对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影响开展研究,经济效应分析是一个必要的切入点。尽管确有部分FTA带有政治动机而非完全服从经济利益,但通常情况下,经济利益仍是一国决定是否签订FTA的主要出发点。^③因此,本文设定的逻辑起点是:FTA的签署和实施受

① J. Schubert, D. Savkin, "Dubious Economic Partnership: Why a China-Russia Free Trade Agreement Is Hard to Reach",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2016, Vol.2, No.4, pp.529-547; S. Malle,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Moving Towards Cooperative Behaviour",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7, Vol.8, No.2, pp.136-150.

② E. Vinokurov, M. Demidenko, et al,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2017".

③ J.H. Bergstrand,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Heterogeneous 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 Effects", in A. Dur and M. Elsig (eds.), *Trade Coope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55-373.

经济受益程度影响，经济受益程度是各当事方能否达成一致的重要因素。本文拟通过构建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拟系统GMR-CGE，对中国-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削减的经济影响开展分析。该方法能够充分反映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实现对各类经济指标的多情景分析，从而有利于解读欧亚经济联盟在FTA谈判中的基本立场，剖析该FTA存在的基本经济障碍及其现实走向。

三、模型、数据与模拟系统

（一）模型设计

本文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架构基础上，开发可计算一般均衡模拟系统GMR-CGE。GTAP由普渡大学农业经济系赫特尔（T.W. Hertel）教授的团队构建，其初衷是为全球农产品贸易政策提供评估工具。目前除农业贸易领域外，该模型也被广泛应用于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移民、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失衡等各类政策评估当中。^①该模型基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假设，采用新古典主义闭合方式。模型的方程体系，主要包括账户平衡方程和经济主体行为方程两部分，前者包括居民、政府、厂商、区域账户、全球运输的供需平衡关系，后者则描述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包括厂商生产、政府购买、居民消费、区域账户收入分配和全球运输等。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贸易模块主要方程，完整的非线性和线性方程体系可分别参考丛晓男^②和赫特尔^③的文献。

不同国家或地区间通过贸易相互关联。产品的离岸价格等于产品的国内

① T.W. Hertel, “Global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Using the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Framework”, in Peter Dixon and Dale Jorgenson (ed.), *Handbook of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ing, Vol. I*,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 2013, pp.815-876.

② 丛晓男：“面向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的全球多区域CGE建模、开发与应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论文，2012年，第22-45页。

③ T.W. Hertel, *Global Trade Analysis: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市场价格与出口补贴（出口关税）强度（Power of the Ad valorem Tax）之商，即

$$PFOB(i, r, s) = PM(i, r) / TX(i, r) / TXS(i, r, s) \quad (1)$$

其中 $PFOB(i, r, s)$ 表示商品 i 从区域 r 出口至区域 s 的离岸价格， $PM(i, r)$ 表示商品 i 在区域 r 的国内市场价格， $TXS(i, r, s)$ 和 $TX(i, r)$ 分别表示区分出口目的地和不区分出口目的地的出口补贴强度。需要指出的是， $TXS(i, r, s)$ 和 $TX(i, r)$ 没有采用补贴率或税率的表达形式，而是采用补贴或税收强度的形式^①。商品离岸后经运输到达出口目的地 s ，则到岸价格 $PCIF(i, r, s)$ 表示为离岸价格 $PFOB(i, r, s)$ 与单位运费 PT 之和：

$$PCIF(i, r, s) = PFOB(i, r, s) + PT \quad (2)$$

商品运达后，区域 s 将会对商品 i 征收进口关税并允许进入其国内市场，商品 i 在区域 s 的价格 $PMS(i, r, s)$ 为到岸价格 $PCIF(i, r, s)$ 与关税强度之积：

$$PMS(i, r, s) = PCIF(i, r, s) \times TM(i, s) \times TMS(i, r, s) \quad (3)$$

式(3)中， $TMS(i, r, s)$ 和 $TM(i, s)$ 分别是区分进口源和不区分进口源的关税强度。区域 s 可能从不同的区域进口商品 i ，模型采用常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函数对来自不同进口源的商品进行复合：

$$QIM(i, s) = A_{QIM} \left(\sum_{r \in REG} \delta_{QIM}(i, r, s) \times QXS(i, r, s)^{-\rho(i)} \right)^{-1/\rho_{QIM}(i)} \quad (4)$$

其中， $QIM(i, s)$ 为区域 s 对进口品 i 的复合进口量， $QXS(i, r, s)$ 为区域 s 从区域 r 进口的商品 i 的数量， $A_{QIM} > 0$ 表示效率参数或规模参数， $\delta_{QIM}(i, r, s)$ 表示进口源为 r 的商品 i 的份额参数， $\rho_{QIM}(i)$ 为贸易替代弹性参数。复合前后的价值量不变，应满足如下关系：

① 税收（或补贴）变量均采用强度而非税率的表达方式。强度即征税前后的商品价格之比，表示为 $T = P_2/P_1$ ， T 为征税强度， P_1 和 P_2 分别是征税前后的价格，方程两侧全微分后可得税收强度变动率 $t = p_2 - p_1$ ，小写字母为对应大写字母的变动率。由于线性化后的方程更加简单和直观，因此非常适合CGE求解的线性化表达。

$$PIM(i,s) \times QIM(i,s) = \sum_{r \in REG} PMS(i,r,s) \times QXS(i,r,s) \quad (5)$$

其中， $PIM(i,s)$ 为区域 s 进口商品 i 的复合价格。进口品 i 的使用途径包括家庭消费、政府消费和厂商中间投入，即

$$\begin{aligned} VIM(i,s) &= PIM(i,s) \times QIM(i,s) \\ &= VIPM(i,s) + VIGM(i,s) + \sum_{j \in PROD} VIFM(i,j,s) \end{aligned} \quad (6)$$

其中， $VIPM(i,s)$ 为家庭消费进口品价值量， $VIGM(i,s)$ 为政府消费进口品价值量， $VIFM(i,j,s)$ 为厂商 j 的中间投入所使用的进口品 i 的价值量。

CGE求解时需采用线性化方程，方程(1)–(6)对应的线性化方程如式(7)–(12)所示：

$$pfob(i,r,s) = pm(i,r) - tx(i,r) - txs(i,r,s) \quad (7)$$

$$pcif(i,r,s) = FOBSHR(i,r,s) \times pfob(i,r,s) + TRNSHR(i,r,s) \times pt \quad (8)$$

$$pms(i,r,s) = pcif(i,r,s) + tm(i,s) + tms(i,r,s) \quad (9)$$

$$qxs(i,r,s) = qim(i,s) - \sigma(i) \times [pms(i,r,s) - pim(i,s)] \quad (10)$$

$$pim(i,s) = \sum_{r \in REG} MSHRS(i,r,s) \times pms(i,r,s) \quad (11)$$

$$\begin{aligned} VIM(i,r) \times qim(i,r) &= \sum_{j \in PROD} VIFM(i,j,r) \times qfm(i,j,r) \\ &+ VIPM(i,r) \times qpm(i,r) + VIGM(i,r) \times qgm(i,r) \end{aligned} \quad (12)$$

式(7)–(12)中的小写变量为式(1)–(6)中对应大写变量的变动率形式。式(8)中的 $FOBSHR(i,r,s)$ 和 $TRNSHR(i,r,s)$ 分别表示到岸价格和运费所占比重，式(10)中 $\sigma(i)=1/\rho_{QIM}(i)$ 为贸易替代弹性，式(11)中的 $MSHRS(i,r,s)$ 表示区域 r 出口至区域 s 的商品 i 的价值量占区域 s 进口商品 i 总价值量的比重。

在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商品关税减免影响的政策模拟中，相关的外生变量为关税强度变动率 $tms(i,r,s)$ 。假设从价关税税率由原来的 TF 变动为 TF' ，则可求得 tms ：

$$tms(i,r,s) = \frac{(1+TF'(i,r,s)) - (1+TF(i,r,s))}{1+TF(i,r,s)} = \frac{TF'(i,r,s) - TF(i,r,s)}{1+TF(i,r,s)} \quad (13)$$

由式(13)可知关税强度变动率，即为关税税率削减幅度与原关税强度之比， tms 即为CGE模型受到的外生冲击。假设区域 s 降低后的关税税率为降低前的 $1-ratio$ 倍，即 $TF'(i,r,s)=(1-ratio(s)) \times TF(i,r,s)$ ，其中 $ratio \in [0,1]$ ，则式(13)可变形为：

$$tms(i,r,s) = -\frac{ratio(s) \times TF(i,r,s)}{1+TF(i,r,s)} \quad (14)$$

当 $ratio(s)=0$ 时， $tms=0$ ，表示区域 s 维持关税税率不变，当 $ratio(s)=1$ 时，表示区域 s 关税削减为零关税。因此，参数 $ratio(s)$ 实际上表达了区域 s 的整体关税削减力度。 $ratio$ 越大则区域整体减税倾向越积极，相反， $ratio$ 越小则整体减税倾向越保守。

(二) 数据设置

采用GTAP最新发布的9.0版数据库。原始数据包含140个国家或地区、57个部门、5种要素禀赋，为减少计算复杂度，需要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归并。在区域设置上，除了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外，还保留了东盟、美国、欧盟等与双方存在紧密贸易关系的主要经济体。由于前苏联其他地区是联盟的重要贸易对象和主要扩容空间，在模拟中可观察FTA对其的经济影响，因此也保留了该区域。由此，将全球划分为欧亚经济联盟(EAEU)、中国(CHN)、东盟(ASEAN)、美国(US)、欧盟(EU)、前苏联其他地区(XSU)^①和世界其他地区(ROW)共7个国家或地区。在部门设置上，按GTAP默认的部门归并方式，将部分合并为10类，分别是粮食、肉类、采选业、食品制造、纺织服装、轻工业、重工业、基础设施与建筑业、交通通信业和其他

① “前苏联其他地区”，是指除了欧亚经济联盟五国、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之外的前苏联地区。

服务业，这一划分方式能够满足刻画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产业结构的需要。要素禀赋仍保留为 5 类，不作归并。将区域、部门和要素禀赋按上述方式归并后，GMR-CGE 系统共包含方程 74 组、9556 个，内生和外生变量共 96 组、14841 个。

（三）GMR-CGE 模拟器开发

由于模型包含的方程和变量数量庞大、计算耗时长，必须采用相应的政策模拟工具才能够完成计算。目前以 GTAP 模型为内核的政策模拟器，主要包括 GTAPinGAMS^① 和 RunGTAP^② 两种，分别采用 GAMS 和 GEMPACK 开发环境编程，国内学者大多使用 RunGTAP。这两种模拟器的缺陷在于，政策分析者不能完全理解底层模型，也很难根据需要修改模型和程序。此外，这些模拟器还存在求解规模限制的问题，例如，RunGTAP 公开版要求区域数和部门数均不多于 10 个，从而限制了适用问题的范围。

为从底层完全掌握方程体系，以便于对模型进行适应性修改，同时也为了增强模拟器开发的自主性，作者基于 C#.NET 和 GAMS 混合编程技术，独立开发了政策模拟器 GMR-CGE。其中 GAMS 脚本用于开发模型的计算内核，采用任意目标下的非线性规划求解线性方程组，高级语言 C# 用于封装可视化界面及整合数据流。^③ GMR-CGE 模拟器不受求解规模的限制，并能根据问题特征任意设置区域和部门的归并方式，从而增强了政策分析能力和适用范围。

四、情景模拟结果

就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互征关税的现状来看，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所征关税的总体水平，显著高于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所征关税的总体水平。按

① T.F. Rutherford, S.V. Paltsev, “GTAPinGAMS and GTAP-EG: global datasets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illustrative model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0.

② K. Pearson, M. Horridge, A.N. Pratt, “Hands-on Computing with RunGTAP and WinGEM to Introduce GTAP and GEMPACK”, the Center for Global Trade Analysis, 2003.

③ 丛晓男、王铮：“全球多区域 CGE 模拟系统开发与应用——兼论政策模拟器的自主开发”，《软科学》，2015 年第 11 期，第 119-123 页。

GTAP 给出的 57 个商品类别看，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所征关税税率在 10% 以上的仅有 8 类产品，20% 以上的则仅有 1 类。其中，羊毛蚕丝（20.55%）、纺织（17.35%）、果蔬（16.37%）、服装（15.26%）等税率相对较高；对水稻、甘蔗、甜菜、原奶等农产品和原油、天然气等资源品均实施了零关税；对林业产品、牛肉制品、煤炭、木材等也近乎实施了零关税。而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所征关税税率在 10% 以上的则有 18 类，20% 以上的有 3 类，分别是精米（122.08%）、饮料烟草（22.86%）和服装（20.11%）。欧亚经济联盟对自中国进口的水稻、甘蔗、甜菜、原奶、羊毛蚕丝等农产品和原油、天然气等资源品均实施了零关税，植物纤维、油籽等也维持了较低关税水平。按本文给出的 10 个商品大类看，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所征关税均高于中国对联盟所征关税，其中食品制造、纺织服装相差不大，但采选业、轻工业联盟则明显高出，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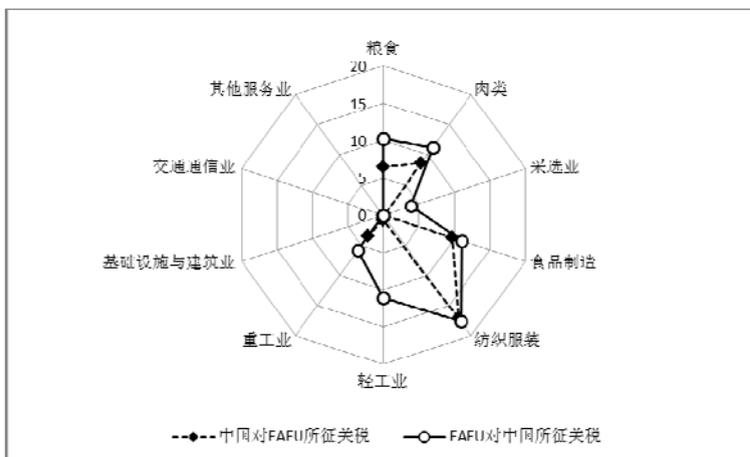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分部门互征关税税率比较

在 FTA 谈判中，各参与方可以采取较为激进的关税削减策略，也可以采取相对保守的削减策略，具体要在综合考虑产业的技术与市场竞争能力、培育阶段、降税所受潜在冲击，以及对方削减策略等后做出安排。尽管目前大多数 FTA 的降税清单，能够覆盖绝大多数商品品目，但各方仍然会根据

自身情况，通过设置一定的减税缓冲期、征收配额税率、提高技术标准、排除在降税清单之外等壁垒形式，对某些商品实施保护。从整体降税策略看，FTA 参与方需要根据对方降税策略相互博弈，采取能充分保障己方利益的降税策略。为反映双方关税削减的积极或保守程度，本文分别以 0.25 为步长，将双方的关税削减策略设置为 $ratio=0.25、0.5、0.75、1$ 四种情况，分别表示保守、较保守、较积极、积极减税。双方不同关税削减策略组合共形成 16 种情景，例如，当 $ratio(CHN)=1$ 且 $ratio(EAEU)=1$ 时，表示双方均对对方所有商品实施零关税。由于 GMR-CGE 在全球层面实现新古典主义闭合方式，即使在不强制全球资本供需平衡（即资本供给和资本需求均为内生变量）的情况下，模拟前后全球资本供需仍将满足平衡关系，全球资本供需变动率之差即瓦尔拉斯松弛变量变动率仍会趋近于 0。表 1 显示，16 种情景下相应的瓦尔拉斯松弛变量变动率均趋近于 0，表明 CGE 模型实现了严格均衡闭合，模拟结果可信。

表 1 关税削减的情景组合及相应的瓦尔拉斯松弛变量变动

中国 \ 欧亚经济联盟	0.25 (保守)	0.5 (较保守)	0.75 (较积极)	1 (积极)
0.25 (保守)	情景 1 (-1.133E-10)	情景 2 (-2.088E-10)	情景 3 (-3.150E-10)	情景 4 (-5.491E-10)
0.5 (较保守)	情景 5 (-1.148E-10)	情景 6 (-2.034E-10)	情景 7 (-3.088E-10)	情景 8 (-5.035E-10)
0.75 (较积极)	情景 9 (-9.032E-11)	情景 10 (-1.973E-10)	情景 11 (-3.072E-10)	情景 12 (-3.929E-10)
1 (积极)	情景 13 (-1.176E-10)	情景 14 (-2.054E-10)	情景 15 (-3.076E-10)	情景 16 (-4.742E-10)

注：括号内数值为瓦尔拉斯松弛变量变动。

(一) 贸易影响

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关税削减对全球贸易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进出口价格、贸易条件、进出口数量和进出口额变动等方面，不同部门的进出口消长亦有所差异。由于涉及指标较多，此处仅给出价格贸易条件、进出口额等关键指标。其中，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率为出口价格变动率与进口价格

变动率之差，以此反映出口竞争力情况，贸易条件上升表示出口相对进口的盈利能力有所增强；进出口总额是以货币衡量的各区域进出口整体变动情况，其差额为贸易平衡变动，反映了进出口额的相对消长情况。

1、贸易条件影响

关税税率变动引起进出口价格变动，进而引起各经济体贸易条件随之变化。表 2 为所有情景下各经济体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

表 2 各经济体价格贸易条件变动（%）

情景	中国降税	联盟降税	联盟	中国	东盟	美国	欧盟	前苏联其他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情景 1	0.25	0.25	-0.041	0.037	-0.005	-0.004	-0.007	-0.042	-0.005
情景 2	0.25	0.5	-0.109	0.078	-0.009	-0.008	-0.012	-0.088	-0.011
情景 3	0.25	0.75	-0.176	0.119	-0.013	-0.011	-0.018	-0.133	-0.016
情景 4	0.25	1	-0.243	0.160	-0.017	-0.014	-0.023	-0.178	-0.022
情景 5	0.5	0.25	-0.015	0.034	-0.005	-0.006	-0.007	-0.039	-0.005
情景 6	0.5	0.5	-0.083	0.074	-0.009	-0.009	-0.013	-0.085	-0.010
情景 7	0.5	0.75	-0.150	0.115	-0.013	-0.012	-0.019	-0.130	-0.016
情景 8	0.5	1	-0.217	0.156	-0.017	-0.015	-0.024	-0.175	-0.021
*情景 9	0.75	0.25	0.011	0.030	-0.006	-0.007	-0.008	-0.037	-0.004
情景 10	0.75	0.5	-0.056	0.071	-0.010	-0.010	-0.014	-0.082	-0.010
情景 11	0.75	0.75	-0.124	0.112	-0.014	-0.013	-0.020	-0.127	-0.015
情景 12	0.75	1	-0.191	0.152	-0.018	-0.016	-0.025	-0.172	-0.021
*情景 13	1	0.25	0.037	0.026	-0.007	-0.008	-0.009	-0.034	-0.004
情景 14	1	0.5	-0.030	0.067	-0.011	-0.011	-0.015	-0.079	-0.009
情景 15	1	0.75	-0.098	0.108	-0.015	-0.014	-0.020	-0.124	-0.015
情景 16	1	1	-0.165	0.149	-0.019	-0.018	-0.026	-0.169	-0.020

注：带“*”的情景表示联盟的贸易条件有所提升。“联盟”指的是欧亚经济联盟，下同。

据表 2 可知，在任何一种情景下，中国的贸易条件均有所提升，最大幅度达 0.16%，且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税削减力度越大、自身降税力度越小，贸易条件改善越明显。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条件，只有在其自身保守减税而中国积极或较积极减税时才会有所提升，其他情景下均有所下降。其他经济体

的贸易条件均有小幅下降，其中以前苏联其他地区最为显著，其下降幅度为美国的 4-13 倍、欧盟的 3-7 倍。前苏联其他地区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传统贸易伙伴，彼此保持较为密切的贸易往来，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的关税削减，增强了中国商品在欧亚经济联盟市场上的相对竞争能力，使前苏联其他地区的出口价格被动下调，除采选业产品外，大多数产品的离岸价格降幅超过 0.25%，肉类、粮食和服装纺织下降最为明显，降幅分别达到 0.61%、0.57% 和 0.38%，这是导致前苏联其他地区贸易条件较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2、贸易额影响

各类商品贸易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动，导致各相关经济体的进出口总额、贸易平衡等指标发生一系列变化。出口额方面，在所有情景下，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额均有所增加，且关税削减幅度越大，双方出口额增幅越明显（表 3）。

表 3 关税削减对各经济体出口额的影响（%）

情景	中国降税	联盟降税	联盟	中国	东盟	美国	欧盟	前苏联其他 地区	世界其他 地区
情景 1	0.25	0.25	0.245	0.126	-0.012	-0.019	-0.023	-0.135	-0.016
情景 2	0.25	0.5	0.425	0.234	-0.021	-0.039	-0.046	-0.273	-0.032
情景 3	0.25	0.75	0.605	0.343	-0.031	-0.058	-0.070	-0.411	-0.048
情景 4	0.25	1	0.785	0.451	-0.040	-0.077	-0.093	-0.550	-0.064
情景 5	0.5	0.25	0.311	0.144	-0.014	-0.019	-0.022	-0.131	-0.017
情景 6	0.5	0.5	0.491	0.253	-0.024	-0.039	-0.045	-0.270	-0.033
情景 7	0.5	0.75	0.671	0.361	-0.033	-0.058	-0.069	-0.408	-0.049
情景 8	0.5	1	0.851	0.469	-0.043	-0.077	-0.092	-0.546	-0.064
情景 9	0.75	0.25	0.376	0.163	-0.017	-0.019	-0.021	-0.128	-0.018
情景 10	0.75	0.5	0.556	0.271	-0.026	-0.039	-0.045	-0.266	-0.034
情景 11	0.75	0.75	0.736	0.379	-0.036	-0.058	-0.068	-0.404	-0.049
情景 12	0.75	1	0.916	0.487	-0.045	-0.077	-0.092	-0.543	-0.065
情景 13	1	0.25	0.442	0.181	-0.019	-0.019	-0.021	-0.124	-0.019
情景 14	1	0.5	0.622	0.289	-0.029	-0.039	-0.044	-0.263	-0.034
情景 15	1	0.75	0.802	0.397	-0.038	-0.058	-0.067	-0.401	-0.050
情景 16	1	1	0.982	0.505	-0.048	-0.077	-0.091	-0.539	-0.066

关税的降低使得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关系更加紧密,对其他经济体的进口需求有所下降,致使其他经济体出口额下滑,但这种下降幅度不大。即使在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实施零关税的情景下,大多数相关经济体的出口额降幅都不会超过 0.1%。然而,前苏联其他地区较为例外,其出口额下降幅度相对明显,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实施零关税情景下,前苏联其他地区的出口额下降幅度约为美国的 7 倍、欧盟的 6 倍。由此可见,在欧亚经济联盟削减关税的情况下,前苏联其他地区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受中国替代和挤占最为严重。

各经济体的进口额同样也发生一系列变动,如表 4 所示。随着关税削减力度的加大,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的进口额增长越明显,在其他经济体中,前苏联其他地区的进口额下降幅度亦最为明显。

表 4 关税削减对各经济体进口额的影响 (%)

情景	中国降税	联盟降税	联盟	中国	东盟	美国	欧盟	前苏联其他 地区	世界其他 地区
情景 1	0.25	0.25	0.397	0.118	-0.009	-0.014	-0.021	-0.129	-0.014
情景 2	0.25	0.5	0.718	0.211	-0.017	-0.028	-0.044	-0.260	-0.027
情景 3	0.25	0.75	1.039	0.305	-0.024	-0.043	-0.066	-0.391	-0.041
情景 4	0.25	1	1.360	0.399	-0.032	-0.057	-0.088	-0.522	-0.054
情景 5	0.5	0.25	0.472	0.141	-0.011	-0.014	-0.020	-0.126	-0.014
情景 6	0.5	0.5	0.794	0.235	-0.019	-0.028	-0.043	-0.257	-0.028
情景 7	0.5	0.75	1.115	0.329	-0.026	-0.043	-0.065	-0.389	-0.041
情景 8	0.5	1	1.436	0.422	-0.034	-0.057	-0.087	-0.520	-0.054
情景 9	0.75	0.25	0.548	0.165	-0.013	-0.014	-0.020	-0.124	-0.015
情景 10	0.75	0.5	0.869	0.259	-0.021	-0.028	-0.042	-0.255	-0.028
情景 11	0.75	0.75	1.190	0.353	-0.028	-0.042	-0.064	-0.386	-0.041
情景 12	0.75	1	1.512	0.446	-0.036	-0.057	-0.086	-0.517	-0.055
情景 13	1	0.25	0.623	0.189	-0.015	-0.014	-0.019	-0.121	-0.015
情景 14	1	0.5	0.945	0.283	-0.023	-0.028	-0.041	-0.253	-0.028
情景 15	1	0.75	1.266	0.376	-0.030	-0.042	-0.063	-0.384	-0.042
情景 16	1	1	1.587	0.470	-0.038	-0.057	-0.085	-0.515	-0.055

对比各经济体的出口额与进口额变动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和欧亚经济联

盟的关税削减对进口额和出口额都有正向刺激作用，但不论出口额还是进口额，欧亚经济联盟的增幅均高于中国，且进口额增幅尤其如此。例如，在双方实施零关税情景下，欧亚经济联盟的进口额增幅约为中国进口额增幅的3.4倍，相比之下，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额增幅仅为中国的1.94倍。即使在中国实施积极减税而欧亚经济联盟实施保守减税的情景下，欧亚经济联盟的进口增幅仍约为中国的3.3倍，而出口增幅仅为中国的2.44倍。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双边贸易额变动来看，任何一方的关税削减均能促进双方的对向出口额，但不论何种情景，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额增幅均显著高于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的出口额增幅（表5）。上述结果表明，关税减免对双方进出口的刺激并不对等，对欧亚经济联盟的进口刺激要相对大于出口刺激，对中国的出口刺激要强于对联盟的出口刺激。

表5 中国和联盟双边贸易额变动（%）

情景	中国降税	联盟降税	中国出口至联盟	联盟出口至中国
情景1	0.25	0.25	10.66	2.11
情景2	0.25	0.5	21.23	2.36
情景3	0.25	0.75	31.80	2.60
情景4	0.25	1	42.38	2.84
情景5	0.5	0.25	10.75	3.98
情景6	0.5	0.5	21.32	4.23
情景7	0.5	0.75	31.89	4.47
情景8	0.5	1	42.47	4.71
情景9	0.75	0.25	10.84	5.85
情景10	0.75	0.5	21.41	6.10
情景11	0.75	0.75	31.98	6.34
情景12	0.75	1	42.55	6.58
情景13	1	0.25	10.93	7.72
情景14	1	0.5	21.50	7.97
情景15	1	0.75	32.07	8.21
情景16	1	1	42.64	8.45

进出口额的变动导致贸易平衡随之发生变化，如表6所示。中国方面，

在任何一种情景下，其贸易顺差均有较大幅度增加，最大增幅发生于中国保守减税而欧亚经济联盟积极减税的情景之下，增幅为 0.74%，最小贸易顺差增幅发生于中国积极减税而欧亚经济联盟保守减税的情景下，增幅为 0.13%。欧亚经济联盟方面，在绝大多数情景下，其贸易顺差有所减少，最大降幅发生于中国保守减税而联盟积极减税的情景下，减少 0.47%。值得注意的是，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相一致，只有欧亚经济联盟实施保守减税且中国实施积极或较积极减税时，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顺差才可能增大，且最大增幅只有 0.05%。其他经济体方面，美国的贸易逆差小幅降低，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贸易从美国转向欧亚经济联盟，美国的进口额缩减大于出口额缩减；其他经济体均表现为贸易顺差缩小或逆差增大，其中前苏联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降幅最为显著，其次为世界其他地区、东盟和欧盟（逆差增大）。

表 6 各经济体贸易平衡变动（%）

情景	中国降税	联盟降税	联盟	中国	东盟	美国	欧盟	前苏联其他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情景 1	0.25	0.25	-0.085	0.175	-0.060	-0.002	0.044	-0.156	-0.069
情景 2	0.25	0.5	-0.214	0.363	-0.110	-0.004	0.077	-0.320	-0.131
情景 3	0.25	0.75	-0.343	0.551	-0.160	-0.007	0.110	-0.483	-0.193
情景 4	0.25	1	-0.472	0.739	-0.210	-0.009	0.144	-0.646	-0.255
情景 5	0.5	0.25	-0.042	0.161	-0.071	-0.001	0.054	-0.149	-0.076
情景 6	0.5	0.5	-0.171	0.349	-0.121	-0.004	0.087	-0.313	-0.138
情景 7	0.5	0.75	-0.300	0.538	-0.171	-0.006	0.121	-0.476	-0.200
情景 8	0.5	1	-0.429	0.726	-0.221	-0.009	0.154	-0.639	-0.262
*情景 9	0.75	0.25	0.002	0.148	-0.081	-0.001	0.065	-0.142	-0.084
情景 10	0.75	0.5	-0.127	0.336	-0.131	-0.003	0.098	-0.306	-0.146
情景 11	0.75	0.75	-0.256	0.524	-0.181	-0.006	0.131	-0.469	-0.207
情景 12	0.75	1	-0.385	0.712	-0.231	-0.008	0.164	-0.632	-0.269
*情景 13	1	0.25	0.045	0.134	-0.091	-0.000	0.075	-0.135	-0.091
情景 14	1	0.5	-0.084	0.322	-0.141	-0.003	0.108	-0.299	-0.153
情景 15	1	0.75	-0.212	0.510	-0.191	-0.005	0.142	-0.462	-0.215
情景 16	1	1	-0.341	0.699	-0.241	-0.007	0.174	-0.625	-0.277

注：带“*”的情景表示联盟的贸易顺差有所增长；美国、欧盟为贸易逆差变动幅度，其他经济体为贸易顺差变动幅度。

（二）宏观经济影响

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和福利水平变动率作为宏观经济影响的主要评价指标，分别用以反映产出增长和福利效应的变化情况。两者结合分析是GTAP政策模拟常用的研究范式。由于静态CGE不存在要素禀赋的外生增长，因此实际GDP的变动，仅能反映要素禀赋再配置引起的生产前沿变动，这会低估对GDP影响的真实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补充分析福利水平变动更有价值。^① 区域福利来源于区域收入，用于居民消费、政府购买和区域储蓄三个方面。

1、地区生产总值

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对各经济体的 GDP 产生一定影响。表 7 给出了不同情景下各经济体实际 GDP 的变动情况。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实际 GDP 均有所增长，且后者增幅高于前者，其他经济体均出现微小下滑，其中以前苏联其他地区较为明显。

关税削减对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实际GDP变动的存在巨大差异，欧亚经济联盟陷入了两种“政策怪圈”。第一，尽管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各自关税的降低都会导致自身实际GDP的增长，但欧亚经济联盟的实际GDP增长对自身降税力度非常敏感。当中国降税策略不变而欧亚经济联盟的降税力度 *ratio* 从 0.25 增至 1（即从保守转为积极）时，将导致欧亚经济联盟实际GDP增长 0.057%；在中国分别采取保守减税、较保守减税、较积极减税、积极减税时，欧亚经济联盟的GDP实际增长率对自身降税力度的弹性值^②分别高达 0.011、0.012、0.014 和 0.016；而同样情景下中国的这一弹性值仅为 0.0018、0.0010、0.0007、0.0005，联盟是中国的 6-32 倍。这意味着，欧亚经济联盟陷入了“自身关税下降导致GDP较大幅度增长”的第一种政策怪圈。模拟结果似乎显示，为了追求GDP的大幅增长，欧亚经济联盟只需要大幅降低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即可，即，单纯开放自身市场就可以达到促进GDP增长的目的。

① T.W. Hertel, *Global Trade Analysis: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采用弧弹性计算， $\varepsilon = (\Delta GDP / GDP) / (\Delta ratio / ratio)$ ，即 GDP 增长率之变动率与减税力度变动率之比。

第二，当欧亚经济联盟的减税策略固定不变时，随着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削减力度的加大，欧亚经济联盟的实际GDP反而出现小幅下滑。中国减税力度 $ratio$ 从 0.25 增加至 1，将反而导致欧亚经济联盟的实际GDP下降 0.0056%。相比之下，欧亚经济联盟的 $ratio$ 从 0.25 增至 1，将导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 0.0073%。尽管上述变动率非常小，但这反映了欧亚经济联盟无法有效利用中国的市场开放，并将陷入“对方关税壁垒削减导致GDP小幅下降”的第二种政策怪圈。

表 7 各经济体实际 GDP 变动 (%)

情景	联盟降税	联盟	中国	东盟	美国	欧盟	前苏联其他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情景 1	0.25	0.017	0.003	-0.000	-0.000	-0.001	-0.004	-0.000
情景 2	0.5	0.036	0.005	-0.000	-0.000	-0.001	-0.009	-0.001
情景 3	0.75	0.055	0.008	-0.001	-0.001	-0.002	-0.014	-0.001
情景 4	1	0.074	0.010	-0.001	-0.001	-0.002	-0.019	-0.001
情景 5	0.25	0.015	0.003	-0.000	-0.000	-0.001	-0.003	-0.000
情景 6	0.5	0.034	0.006	-0.000	-0.000	-0.001	-0.008	-0.001
情景 7	0.75	0.053	0.008	-0.001	-0.001	-0.002	-0.013	-0.001
情景 8	1	0.072	0.011	-0.001	-0.001	-0.003	-0.018	-0.001
情景 9	0.25	0.013	0.004	-0.000	-0.000	-0.001	-0.002	-0.000
情景 10	0.5	0.032	0.006	-0.000	-0.000	-0.001	-0.007	-0.001
情景 11	0.75	0.051	0.009	-0.001	-0.001	-0.002	-0.012	-0.001
情景 12	1	0.070	0.011	-0.001	-0.001	-0.003	-0.017	-0.001
情景 13	0.25	0.012	0.004	-0.000	-0.000	-0.001	-0.002	-0.000
情景 14	0.5	0.030	0.007	-0.001	-0.000	-0.001	-0.006	-0.001
情景 15	0.75	0.049	0.009	-0.001	-0.001	-0.002	-0.011	-0.001
情景 16	1	0.068	0.012	-0.001	-0.001	-0.003	-0.016	-0.001

上述两类政策怪圈的根源在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三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其居民消费率较高，达到 50.1%，尽管低于美国的 70.1%和欧盟的 59.7%，但远超过中国的 36.3%。二是其居民消费中进口品比重明显偏高。据表 8 可知，除食品制造、基础设施与建筑业、交通通信业外，欧亚经济联盟居民消费商品或服务对进口品的依赖程度，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服装纺织和轻工

业尤其严重，其居民消费因域内供给不足长期处于受抑制状态。三是产业结构仍未摆脱重工业和资源采选业相对发达而轻工业相对落后的问题，发展路径受到锁定，纺织服装、轻工业等与民生关系较密切的产业产出比重偏低，域内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如表 9 所示。这些结构性问题是欧亚经济联盟意欲推进再工业化进程并对贸易合作对象遴选较为苛刻的原因。消费率较高且国内供给不足，意味着联盟一旦开放市场将对进口品形成巨大需求，进口额大幅增加；产业结构畸形则意味着欧亚经济联盟无法有效利用外部市场，欧亚经济联盟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将处于劣势，通过贸易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被极大地削弱了。在本文研究中，当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的关税水平降低后，中国商品，尤其是欧亚经济联盟不甚发达且严重依赖外部供给的轻工业品等，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量大增，长期受到抑制的居民消费将大幅增长。从支出法 GDP 核算来看，欧亚经济联盟居民消费大增将导致其 GDP 的增长。因此，欧亚经济联盟的 GDP 增长对自身关税削减力度的高度敏感性，主要是源于其居民消费的大幅增长。尽管欧亚经济联盟自身关税降低能够通过大规模进口中国商品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和 GDP 增长，但对区域内的资本形成、就业需求增加并无益处，此为第一种政策怪圈形成的原因。当中国降低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税水平时，由于欧亚经济联盟存在的畸形产业结构，轻工业等产业供给能力不足，对华出口优势不明显，食品制造和重工业的出口优势反而进一步放大，从而导致欧亚经济联盟的要素禀赋流入其少数几个对华出口优势部门，进一步强化了其优势部门的产出能力。以对欧亚经济联盟相对有利的情景 9、13 为例，当 $ratio(EAEU)$ 固定为 0.25，而 $ratio(CHN)$ 由 0.75 上升至 1 时，欧亚经济联盟食品制造和重工业的对华出口实物量增长率，分别从 29.2% 和 17.44% 增至 38.81% 和 23.06%，产出量增长率分别由 0.262% 和 0.263% 增至 0.341% 和 0.343%，但其他大部分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反而有所下滑。这种出口需求刺激将加剧欧亚经济联盟产业结构畸形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导致其生产前沿反而出现微量下滑，此为第二种政策怪圈的形成原因。

表 8 各经济体居民消费中进口品所占比重 (%)

部门	联盟	中国	东盟	美国	欧盟	前苏联其他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全球总体
粮食	16.18	3.48	11.20	27.78	54.25	7.05	10.31	14.72
肉类	10.66	1.63	8.33	3.45	25.00	2.74	6.62	9.17
采选业	38.07	2.57	2.40	6.90	49.92	0.73	12.40	15.77
食品制造	13.04	3.62	18.76	11.14	21.00	37.62	14.89	14.77
纺织服装	68.74	3.93	25.50	40.85	48.53	68.85	31.16	36.54
轻工业	54.63	7.32	25.45	35.09	40.73	81.62	37.79	36.33
重工业	39.08	13.62	38.49	30.81	45.45	40.27	35.94	35.83
基础设施与建筑业	1.63	0.20	4.19	1.04	5.67	2.82	2.29	2.76
交通通信业	3.45	4.03	7.82	1.72	9.99	6.58	4.72	5.38
其他服务业	11.14	0.98	7.01	0.72	6.14	4.43	1.86	2.45
总体平均	15.32	3.80	13.98	6.45	18.36	18.09	10.24	10.96

表 9 各经济体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 (%)

部门	联盟	中国	东盟	美国	欧盟	前苏联其他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全球总体
粮食	1.72	2.79	5.52	0.86	0.76	5.48	3.16	2.12
肉类	3.19	2.53	1.84	1.28	1.28	5.38	2.03	1.80
采选业	13.72	3.59	5.37	1.43	0.85	21.22	5.57	3.58
食品制造	3.79	4.29	6.09	2.43	4.14	2.14	4.17	3.89
纺织服装	0.68	3.84	2.58	1.04	1.39	1.14	1.66	1.78
轻工业	4.25	12.02	8.45	7.93	10.85	2.07	7.61	9.00
重工业	17.33	34.71	23.65	14.47	17.97	11.67	17.56	19.66
基础设施与建筑业	14.56	10.56	10.13	8.62	9.08	21.63	9.82	9.67
交通通信业	21.23	10.39	17.55	17.04	15.60	14.71	18.46	16.40
其他服务业	19.53	15.28	18.82	44.91	38.07	14.57	29.97	32.11
总和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福利水平影响

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降税对各经济体的总体福利水平也产生一定影响。FTA 非参与方的福利水平均有一定程度下滑，尤其是前苏联其他地区最为明显。与实际 GDP 增长中欧亚经济联盟全面高于中国的情况相反，欧亚

经济联盟的福利水平变动几乎在所有情景下均远低于中国。中国的福利变动在所有情景下均为正，且随欧亚经济联盟关税的降低而提升，随自身关税的降低而下滑。欧亚经济联盟福利提升方面，当中国保守减税时，欧亚经济联盟只有保守减税才能实现福利提升；当中国较保守减税时，欧亚经济联盟在保守和较保守减税两种情景下能够实现福利提升；当中国较积极减税时，欧亚经济联盟在保守、较保守、较积极减税情景下能够实现福利提升；当中国积极减税时，欧亚经济联盟不论以何种减税倾向均能实现福利提升。欧亚经济联盟最大的福利提升，出现在中国积极减税而自身保守减税的情景下，也仅在此情景下，其福利提升幅度才高于中国，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各经济体福利水平变动 (%)

情景	中国降税	联盟降税	联盟	中国	东盟	美国	欧盟	前苏联其他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情景 1	0.25	0.25	0.001	0.029	-0.004	-0.001	-0.004	-0.034	-0.003
情景 2	0.25	0.5	-0.008	0.060	-0.008	-0.002	-0.008	-0.071	-0.005
情景 3	0.25	0.75	-0.017	0.090	-0.011	-0.003	-0.011	-0.108	-0.008
情景 4	0.25	1	-0.026	0.121	-0.014	-0.004	-0.015	-0.145	-0.011
*情景 5	0.5	0.25	0.011	0.027	-0.005	-0.001	-0.005	-0.031	-0.002
*情景 6	0.5	0.5	0.002	0.058	-0.008	-0.002	-0.008	-0.068	-0.005
情景 7	0.5	0.75	-0.007	0.088	-0.012	-0.003	-0.012	-0.105	-0.008
情景 8	0.5	1	-0.016	0.119	-0.015	-0.004	-0.015	-0.142	-0.011
*情景 9	0.75	0.25	0.021	0.025	-0.005	-0.002	-0.005	-0.028	-0.002
*情景 10	0.75	0.5	0.012	0.056	-0.009	-0.003	-0.009	-0.065	-0.005
*情景 11	0.75	0.75	0.003	0.086	-0.012	-0.003	-0.012	-0.102	-0.008
情景 12	0.75	1	-0.006	0.117	-0.016	-0.004	-0.016	-0.139	-0.011
*情景 13	1	0.25	0.030	0.023	-0.006	-0.002	-0.006	-0.025	-0.002
*情景 14	1	0.5	0.021	0.054	-0.009	-0.003	-0.009	-0.062	-0.005
*情景 15	1	0.75	0.013	0.085	-0.013	-0.004	-0.013	-0.099	-0.008
*情景 16	1	1	0.004	0.115	-0.016	-0.005	-0.017	-0.136	-0.010

注：带“*”的情景表示联盟人均福利有所提升。

对比表 10 的福利水平变动和表 7 的实际 GDP 变动，可以发现，欧亚经济联盟的总体福利变动趋势与其实际 GDP 变动趋势呈现反向关系，其自身

关税水平的削减将导致 GDP 增长、福利水平下降，而中国的关税水平的削减将导致其 GDP 下降、福利水平上升。尽管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的关税削减能够促进居民消费增长，进而提升居民消费所带来的福利，但由于贸易顺差减少，导致政府购买福利（政府购买主要为服务业，约占购买总额的 98%）和区域储蓄均有所下降，最终导致总体福利水平下降（表 11）。因此，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削减幅度越大，其 GDP 增幅越大，福利水平下降越大。

表 11 欧亚经济联盟福利变动分解（%）

情景	中国降税	联盟降税	居民消费福利	政府购买福利	区域储蓄	总体福利
*情景 1	0.25	0.25	0.042	-0.022	-0.092	0.001
情景 2	0.25	0.5	0.080	-0.039	-0.220	-0.008
情景 3	0.25	0.75	0.118	-0.057	-0.349	-0.017
情景 4	0.25	1	0.155	-0.074	-0.478	-0.026
*情景 5	0.5	0.25	0.047	-0.026	-0.054	0.011
*情景 6	0.5	0.5	0.085	-0.043	-0.183	0.002
情景 7	0.5	0.75	0.123	-0.061	-0.312	-0.007
情景 8	0.5	1	0.160	-0.078	-0.440	-0.016
*情景 9	0.75	0.25	0.052	-0.030	-0.017	0.021
*情景 10	0.75	0.5	0.090	-0.047	-0.146	0.012
*情景 11	0.75	0.75	0.127	-0.065	-0.275	0.003
情景 12	0.75	1	0.165	-0.083	-0.403	-0.006
*情景 13	1	0.25	0.057	-0.034	0.020	0.030
*情景 14	1	0.5	0.094	-0.051	-0.109	0.021
*情景 15	1	0.75	0.132	-0.069	-0.238	0.013
*情景 16	1	1	0.170	-0.087	-0.366	0.004

注：带“*”的情景表示联盟总体福利有所提升。

五、障碍、前景与现实选择

（一）经济障碍

本文研究证明了中国是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减税的主要受益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相互破除贸易壁垒有助于中国扩大出口、增加产出、提升福利

水平。然而，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能否顺利签署及具体覆盖内容并不由中国单方面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盟的受益程度及由此导致的合作意愿。不考虑政治因素，单纯从经济受益程度看，欧亚经济联盟难以从 FTA 市场开放中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某些情景下甚至还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这成为推进全面 FTA 的重要经济障碍。因此，短期内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全面的 FTA 仍然面临较大困难，其根源在于欧亚经济联盟经济韧性较差，内部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1、欧亚经济联盟经济体量相对较小

即使中国在关税减让、市场开放方面做出较大让步，欧亚经济联盟也不可能实现对等的关税削减，而只能采取保守降税策略，否则其贸易条件、贸易平衡等都将下滑，贸易利益受损、福利水平下降。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体量小，与其所辖空间范围极不相称。2016 年联盟的区域生产总值约为 1.48 万亿美元，不到同年全球生产总值的 2%，仅相当于中国的 1/7.6。经济体量较大的地区和体量较小的地区签订 FTA，后者经济系统抗扰动能力较差，在市场相互开放情况下，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的分部门出口、产出变动幅度要高于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其原因在于，出口受正面刺激较大的部门出口量和产出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对要素禀赋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即使出口需求增加较小的部门未受外部冲击，其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也会流入出口需求较大的部门，造成部门产出的增减幅度都比经济体量大的地区明显。此外，由于当前联盟对中国的总体关税税率显著高于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总体关税税率，如果降税清单涵盖大部分商品且最终实施零关税，则欧亚经济联盟产业将受到较大的负面冲击，从而打乱其再工业化进程。因此，关税壁垒削减是 FTA 谈判的敏感问题。

2、欧亚经济联盟难以有效利用中国市场开放

通过降低中国的关税壁垒、促进市场开放来提升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利益的设想并不完全成立。双方福利提升难以实现帕累托改进。中国完全可以受益于该 FTA，在大多数减税情景下都能够实现贸易条件、贸易平衡的改善和

福利水平的提升。然而，随着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欧亚经济联盟的总体福利水平反而有所下降，尽管其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有所提升。这意味着欧亚经济联盟将难以有效利用中国的市场开放，不论这种开放来自于关税壁垒还是非关税壁垒的下降。欧亚经济联盟至今仍深受前苏联时期产业结构扭曲的影响，与此同时，“荷兰病”效应也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畸形，导致其产业结构偏重采选业和重工业。可供出口至中国的商品主要集中于资源品、食品加工业产品和重工业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中国的市场开放将进一步强化欧亚经济联盟少数主力出口商品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吸引要素禀赋流入这些部门，产业结构畸形状态难以改善，生产要素配置扭曲加剧，生产前沿面下降。因此，一味强调欧亚经济联盟市场开放对自身的经济损害并不全面，欧亚经济联盟无法有效利用中国的市场开放也是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原因。

3、欧亚经济联盟福利改善与GDP增长之间呈反向变动

在通常情况下，区域福利改善与 GDP 增长趋于一致，但在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关税削减实施中，欧亚经济联盟的福利改善与 GDP 增长之间，呈现反常的反向变动关系。特别是随着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关税水平下降，其自身 GDP 反而有较大幅度增长，而总体福利水平则持续下滑。由于欧亚经济联盟民生相关产业发展相对薄弱，域内供给能力有限，居民消费严重依赖进口，随着关税水平的下降，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出口的民生类商品大幅增长，居民消费量大增，从而造成居民消费福利和 GDP 的增长。这种增长对欧亚经济联盟并不完全有利。一方面，尽管居民福利有所提升，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居民消费需求，但其政府购买福利和区域储蓄随之下降，造成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这种 GDP 增长主要受居民消费增长驱动，对于资本形成、生产扩大、就业增加不会有明显促进。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着在居民福利改善与产出增长间做出选择的两难境地。

（二）前景与现实选择

中国-欧亚经济联盟的谈判进展与发展前景，要置身于“一带一路”倡

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和而不同”、寻求共同利益的基本框架下。尽管双方之间存在某些分歧，但共同利益导向下的合作仍是主流，双方应有能力找到共同利益基础并加大区域合作力度。^①这一点对于双边经贸合作亦不例外。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推进，需要考虑到以俄罗斯为主导方的欧亚经济联盟在推进对外贸易合作方面的战略诉求。这意味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是大势所趋，但FTA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将不得不考虑到欧亚经济联盟的现实需求。

1、欧亚经济联盟可能采取的策略

一是欧亚经济联盟将偏好与中小型经济体打造FTA。鉴于欧亚经济联盟的较小经济体量及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欧亚经济联盟与较大经济体签订FTA将存在较大的经济风险，其短期策略将主要与中小型经济体签订FTA。通过“小步快跑”的形式与其他经济体开展双边贸易合作，以此逐步适应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种策略一方面能够使欧亚经济联盟同广大小型经济体快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扩大欧亚经济联盟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塑造开放、共赢的经济发展形象；另一方面，此类FTA对其经济的扰动较小，所产生的冲击影响能够被较快吸收和克服，通过这种温和的外部刺激促进其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链完善，增强经济系统的韧性。

二是欧亚经济联盟将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来推进与中国的FTA建设，避开关税壁垒削减议题。在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谈判中，欧亚经济联盟并不情愿积极开放市场，这与越南-欧亚经济联盟FTA的积极减税形成鲜明对比。^②本文模拟结果解释了欧亚经济联盟避开关税壁垒削减议题的原因，即，只有在中国相对积极开放市场、联盟相对保守开放市场的情况下，欧亚经济联盟才能保证福利水平不至于下降。在推进过程中，即使双方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轻工业品等民生需求较大的商品，将极有可能被欧亚经济

① [俄]C·比留科夫：“‘丝绸之路’与欧亚一体化——两大战略项目相结合的前景”，《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6期，第31-57页；李永全：“和而不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页。

② 越南-联盟FTA的减税计划是，到2025年，欧亚经济联盟对越南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9.7%降低至2%，越南则从10%降至1%，双方大约有60%的商品将最终实施零关税。

联盟列入敏感品目录，并通过设置较长的降税期限、征收配额关税甚至排除在减税清单之外等方式来对待。

三是欧亚经济联盟将继续推进内部的结构性的改革。欧亚经济联盟要真正受益于与中国建立 FTA，必须加快推进其内部的结构性的改革。在产业结构方面，要从根本上扭转前苏联发展模式和“荷兰病”效应带来的弊端，提高民生产业比重；在消费品来源结构方面，既要刺激居民消费总量，又需要不断提升国产品的供给能力。

2、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并不介意达成一个仅仅包含贸易壁垒削减和商品市场开放计划的 FTA，但这对欧亚经济联盟将产生不利影响。欧亚经济联盟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其参与国际分工及 FTA 建设的软肋。欧亚经济联盟能否通过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改变“去工业化”的消极影响，恢复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能否成功地实现对本国经济结构的改造。^①然而，欧亚经济联盟的结构性调整短期内无法一蹴而就，中国需要针对这一瓶颈问题采取相应策略。

一是深化跨区产业合作。深化双边贸易合作要将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欧亚经济联盟的内部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区产业合作，为联盟快速调整扭曲的产业结构提供了重要机遇，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尤其是在轻工业等自身发展滞后的民生型产业领域。跨区产业合作应当成为中国-欧亚经济联盟 FTA 的核心内容，这有利于实现双方合作共赢的帕累托改进。二是将 FTA 与投资协定打包进行谈判。在促进欧亚经济联盟商品进入外部市场的同时，增大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投资规模，特别是针对欧亚经济联盟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部门。三是允许欧亚经济联盟采取分阶段降税策略，适时推出早期收获计划。鉴于双方在贸易壁垒降低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且可能影响谈判结局，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深度开放市场不能抱有过高期望，短期内欧亚经济联盟积极减税的可能性极小，双方只能暂且

^① 王维然、王京梁：“试析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8期，第51-56页。

达成一个不包含关税壁垒削减的“半成品”FTA，如果要顺利达成全面自贸协定，中国需要在确保自身贸易利益和福利水平不受损情况下，对欧亚经济联盟给予适当让步，允许其薄弱产业实施较长的降税缓冲期。

【Abstract】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among which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is considered as a probable op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bilateral tariff reductions by constructing a global multi-reg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t is found declining EAEU tariff barriers obviously benefit China, but the benefits for the EAEU are quite limited. Only when China actively reduces tariffs and the EAEU do it to a certain extent, can the EAEU achieve a slight increase in its economic welfar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EAEU consists of a large share of resource goods and heavy industries,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related industries is lagging behind. Residents of the EAEU mainly rely on imports. All these structural factors are root causes rendering the EAEU unable to effectively employ China's open market. Meanwhile, they are also the biggest economic obstacles against promoting China-EAEU FTA. This also explains why currently the EAEU excludes the reduction in tariff barriers issue from the bilateral FTA negotiations. In the short term, the EAEU tends to sign FTAs wit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conomies with traditional friendly relations in order to avoid disturbances to its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EAEU, China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торгов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союзом привлекло к себе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Подписание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е (СС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наиболее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й вариант.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путём постро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много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модели общего

равновесия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различные комбинаци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тарифных сокращений. Установлено, что снижение тарифных барьеров ЕЭАС принесло пользу Китаю, однак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ЕЭАС очень ограничены, и только в ситуации, когда Китай активно снижает тариф, ЕЭАС добивается небольшого увели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ЕЭАС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долю занимают ресурсная и тяжел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а развитие отраслей, связанных с повседневны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м населения, отстаёт.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граждан стран, входящих в ЕЭАС,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зависит от импорта. Да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факторы являются основной причиной того, что ЕЭАС не мож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открыт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рынка, что и формирует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ЕЭАС в рамках ССТ. Этот факт может объяснить, почему ЕЭАС исключает проблему снижения тарифов на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ССТ.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ЕЭАС имеет тенденцию подписывания ССТ с малыми и средними экономиками, с которыми уже имеет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друж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целью избежания крупных потрясений для сво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итай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乌兹别克斯坦汇率市场化改革问题研究*

刘文翠 刘遵乐**

【内容提要】为改善外贸和引资环境,2017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开启了汇率市场化改革。此次改革的内容涉及外汇交易的全环节,其目的在于消除汇率双轨制和资本管制对于乌涉外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形成外汇交易的市场属性和良性循环,体现出乌政府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新动向。由于改革进程仍在进行,成效有待进一步评估。

【关键词】乌兹别克斯坦经济 乌兹别克斯坦金融 乌兹别克斯坦汇率

【中图分类号】D751;F752.7**【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1-0112(16)

乌兹别克斯坦(以下简称乌)地缘位置重要,是中亚^①第一人口大国,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支点作用。2016年9月2日,乌前总统卡里莫夫因病突然去世,政府总理米尔济约耶夫在12月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成功当选。新总统继任后,在经济层面进行了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努力改善引资环境,注重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为祛除原有汇率体制及严格的外汇管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本文仅代表个人研究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 刘文翠,新疆财经大学教授;刘遵乐(通讯作者),新疆财经大学中亚经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新疆金融学会中亚金融研究中心。

① 本文中提到的“中亚”,特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个国家。

2017年9月2日，乌政府发布《乌货币政策自由化首要实施细则》^①总统令（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开启了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因

1994年，乌开始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于当年8月确定苏姆为官方货币。乌法律规定，苏姆与其他外币可自由兑换，但因长期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实操作中存在三种汇率，即官方汇率、交易所汇率和黑市汇率。其中官方汇率为央行发布汇率，主要用于宏观经济统计、计算关税和其他的支付项目；^②交易所汇率主要用于银行间结算和企业换汇；黑市汇率主要为民间小额换汇。因为黑市汇率是参照交易所汇率进行定价，两者汇率接近，为论述清晰，本文将两者统称为外汇结算价^③，并定义存在汇率双轨制^④，即政府官方汇率与外汇结算价并存。

（一）官方汇率高估导致苏姆贬值压力巨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运用宏观经济平衡法（macroeconomic balance approach）进行的测算，苏姆官方汇率存在明显高估。^⑤2013年，乌政府曾提出实施汇率并轨，推动本币苏姆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但由于当年通胀压力较高、国家缺乏外汇储备等因素，加上担心改革造成的不利影响，导致此项改革不了了之。其后，乌仍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见表1），官方汇率与外汇结算价存在较大差距。

① 乌兹别克斯坦央行，“Decre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No. UP-5177 On Priority Measures for Liberalization of Currency Policy”，dated 2 September 2017, <http://www.cbu.uz>

② 乌官方汇率牌价由央行每周二上午公布。张棚：乌兹别克斯坦金融环境发展新趋势及对中国涉外企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当代经济》，2017年2月刊第5期第12页。

③ 交易所汇率与黑市汇率参照中国20世纪90年代汇率双轨制时期称谓，统称为外汇结算价。

④ 乌政府并不否认存在另外一种汇价，但认为其主要成因与非法活动和逃税有关，并不具有代表性，是非法的、规模较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epublic Of Uzbekistan 2012-Article IV Consultation”，September 2013, No.13/278, <http://www.imf.org/>

⑤ 同上。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苏姆官方汇率呈现出单边贬值走势（见图 1）。2009-2014 年贬值区间基本控制在 11%以内。2015 年，苏姆贬值加速，全年贬值幅度达 15.9%；2016 年全年贬值幅度为 16%；进入 2017 年，苏姆贬值速度明显加快，8 个月货币贬值幅度已达 30%。虽然苏姆官方汇率贬值不断加速，但仍与外汇结算价存在较大差距。2017 年 8 月初，在塔什干几个较大的外汇交易市场上，苏姆对美元的外汇结算价为 8300 : 1,而同期苏姆对美元的官方汇率约为 4100:1。

表 1 改革前乌兹别克斯坦资本管制措施

对私限制措施	对公限制措施
规定每人每季度仅允许按官方汇率用本国货币兑换一次美元，金额不超过 2000 美元，且兑换的外汇仅允许在国外使用。	1、允许企业在当地设立外汇帐户后可以汇进汇出，但从严格要求企业外贸合同的事前备案审批手续，且对外兑换支付需要银行配额和提前预约。 2、限制货币兑换必须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银行办理，其他银行暂时不能受理货币兑换和外汇业务。

资料来源:综合采用商务部驻乌兹别克斯坦商务参赞处,以及我国银行机构驻乌兹别克斯坦工作组调查反馈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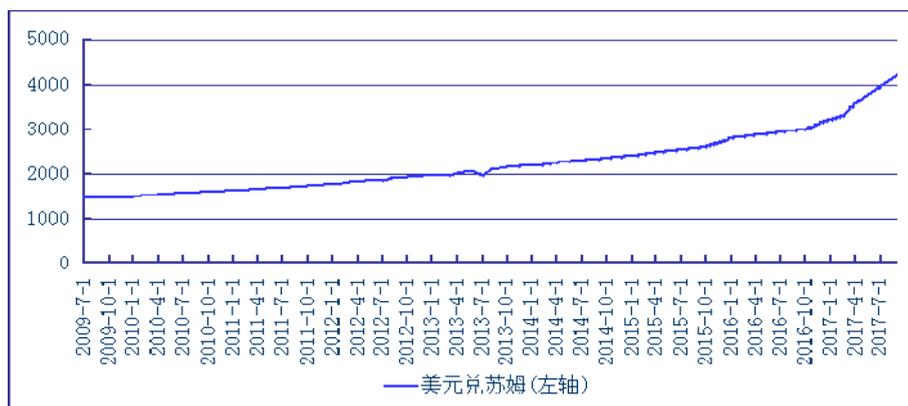


图 1 2009-2017 年 8 月苏姆官方汇率变动图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世界银行, <http://www.worldbank.org>

(二) 汇率双轨制破坏了国家营商环境

乌汇率双轨制对其发展国际贸易和吸引外资造成不利影响,降低了正常

经济活动的效率，成为阻碍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汇率双轨制影响正常经贸活动的开展。乌官方汇率高估，出口企业按照官方汇率对所得外汇收入进行强制结汇，降低了本币收入，形成产品出口与所得收入倒挂，导致大多数公司不愿通过官方渠道出口，并探寻各种各样的漏洞，结果使得出口收入大幅下降。^①而对于进口企业，政府为应对国内的通胀压力，维持本国外汇储备规模，多次采取限制进口的行政措施，对进口企业造成不利影响。同时，由于换汇渠道不畅通，进口企业需要依赖外汇交易所进行换汇，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

二是汇率双轨制制约了技术创新进步。世界银行 2015 年工业调查结果显示，3/4 的乌被调研企业在过去 3 年里没有引入任何新的技术，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外汇及换汇成本高。^②在世界银行的年度营商环境报告中，乌长期处于第 170 位左右，汇率双轨制和外汇交易中的诸多限制，阻碍了国家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降低贸易壁垒并推进外汇交易自由化，将有助于促进乌经济增长和提升长期竞争力。

（三）资本管制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乌资本管制与外汇交易中的诸多限制，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在结汇以及汇出利润方面存在较多的困难。根据中国驻乌企业反馈，乌政府实行强制结汇，对入账的外汇仅允许自由支取 50%，另 50%需要兑换成本币。同时，外资企业汇出利润还需缴纳 10%的所得税。上述举措导致外商企业外汇收入难以完全收回，影响投资积极性。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条件

（一）政权平稳交接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乌自 1991 年独立以来，政局一直保持稳定。卡里莫夫长期担任总统，

① 伊尔纳扎罗夫：“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的转型战略：悖论和前景”，《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86 页。

②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6-Asias Potential Growth”，p120-121, March 2016, <https://www.adb.org>

其执政期间，通过一系列渐进式改革，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卡里莫夫总统去世后，乌政权平稳过渡，权力交接顺利。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卡里莫夫时期担任政府总理 13 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在民众中具有较高的威望。

（二）经济的平稳增长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乌独立之初，在经济发展上并未采取“休克疗法”和快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方法，选择了“渐进式”的发展道路，进行分阶段改革。乌采取了“五项原则”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推动国家向前发展，即：经济优先、国家调控、法律至上、社会保障和循序渐进。这一发展思路贯穿了前总统执政的始终，重点强调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有利于规避外部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使得乌能够平稳应对 1998 年俄罗斯经济危机^①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受益于政局稳定及资源优势，乌经济保持平稳增长。2009-2016 年，乌 GDP 增长率保持在 7.8-8.5% 区间（见表 2）。虽然同期通胀率位于 8.4-14.1% 的高位，但呈逐年下降趋势。乌外汇储备也逐年增长，截至 2016 年底，已达到 246.5 亿美元，可覆盖 24 个月的进口额，远超过外汇储备至少要相当于 3 个月进口额的国际标准。外汇储备充足，使得乌偿付外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稳步提升。

表 2 2009-2016 年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指标

经济指标/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8.1	8.5	8.3	8.2	8.0	8.1	8.0	7.8
通货膨胀率 (%)	14.1	9.4	12.8	11.9	11.7	9.1	8.5	8.4
外汇储备总额 (亿美元)	122.26	145.79	180.49	221.33	225.15	241.4	244	246.5

数据来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https://www.adb.org>)、《亚洲经济展望报告》(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3、2014、2015、2016) 相关数据综合整理。

（三）国家发展战略为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

^① 依马木阿吉·艾比布拉、阿布来提·麦麦提：“金融危机对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的影响及遏制对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第 57 页。

2017年2月7日，乌发布了《乌兹别克斯坦2017-2021年国家发展战略》^①（以下简称《发展战略》），这是未来五年乌政府外交、经济调整的新政策路径。《发展战略》确定了改革的五个优先领域，其中第三条“经济发展与自由化”明确提出，实施金融业改革，扩大经济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资。这为本轮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半年后发布的《实施细则》^②对此作了进一步补充，指出：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发展方向之一，就是形成本币苏姆的汇率市场化机制。其目的在于发展并完善外汇政策的自由化、发展外汇市场、提高外汇使用效率、改善企业外贸环境、为外国投资者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四）债务流动性风险较小为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乌外债总额呈逐年上升的态势，2014、2015年负债率^③一度超过国际上普遍认可的20%安全线，但2016年回调到了16.97%（见表2）。外债中85%以上为优惠性质并且期限超过15年的长期贷款。^④短期外债占比较低（见图2），2016年短期外债比例^⑤仅为3.03%。乌外债负债率控制在安全线以下，短期外债比例低，偿债压力不大，外债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小。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 Стратегии действий по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развитию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2017.02.07. <http://www.press-service.uz/>

② 乌兹别克斯坦央行，“Announcement of the CBU,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National Currency In Relation to Foreign Currency”，published 4 September 2017, <http://www.cbu.uz>

③ 负债率为年末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用于衡量通过将资源从国内生产转向出口产品生产以偿还外债的潜力，反映该经济体外债总规模与其整体经济实力的关系。本文外债指标原则上均根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8家机构联合编撰的《外债统计指南》（2003年版）。

④ 2015年11月5日，乌时任第一副总理阿济莫夫在由乌主办的国际投资论坛的发言。<http://review.uz/index.php/novosti-main/item/5394-rustam-azimov-v-osnove-politiki-vneshnikh-zaimstvovaniy-uzbekistana-investitsionnye-tseli>

⑤ 短期外债比例（ratio of short-term external debt）是指一国短期外债余额与外债总余额的比率，可以表明该经济体对于短期外债的依赖程度。本文短期债务包括所有原定偿还期一年（含）以下的所有债务和长期债务的当年支付利息。外债总额包含公共债务、公共担保债务和私人无担保长期债务、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短期债务，数据取自世界银行。

表 3 2009-2016 年乌兹别克斯坦负债率指标（亿美元）

经济指标/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国内生产总值	328.2	389.8	453.2	518.22	576.9	626.44	667.33	672.7
外债余额	49.22	58.04	60.9	66.6	106.75	133.08	148.38	114.13
负债率 (%)	15.00	14.89	13.44	12.85	18.50	21.24	22.23	16.97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综合整理，<http://www.worldbank.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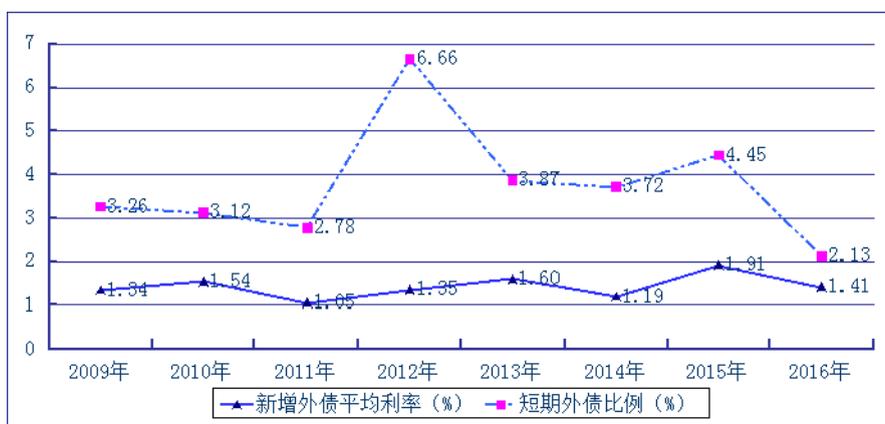


图 2 2009-2016 年乌兹别克斯坦短期外债比例及新增外债平均利率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取得，<http://www.worldbank.org>

（五）银行资产结构的稳健性为抵御改革风险提供了保障

2010-2016 年，乌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见图 3）。2016 年，整体资本充足率为 10.68%，高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 8% 资本充足率的要求。^①不良贷款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2016 年仅为 0.44%，低于 2% 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加上较低的不良贷款率，确保了银行体系信用风险可控。

乌银行体系掌握了 95% 以上的金融部门资产；2015 年，乌 8 家国有银行控制了 75% 的银行资产。^②国有资产对于金融的高度垄断，降低了金融市

① 作为全球银行业监管标杆，2010 年新出台的巴塞尔协议 III，维持了 8% 的资本充足率标准，但是将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从现行的 4% 上调到了 6%。

②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6-Asias Potential Growth”，pp.120-121。
<https://www.adb.org>

场运行效率，但有利于政府防范和控制改革可能引致的金融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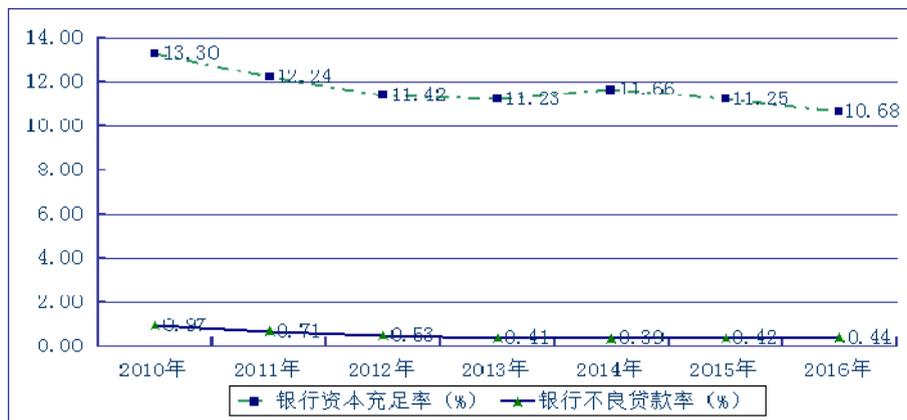


图3 2010-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取得，<http://www.worldbank.org>

三、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期准备及内容评价

(一) 前期准备

在《国家发展战略》发布后不久，乌政府就着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改革创造条件，并进行前期准备。

一是通过利率政策的配合，预防货币大幅贬值可能引发的高通胀。2017年6月27日，乌央行宣布，即日起大幅提高再融资年利率5个百分点，再融资利率由9%提升至14%。^①提高再融资利率，目的是通过利率工具的传导，降低市场流动性，以缓解调整官方汇率后货币贬值所造成的通胀压力。

二是推出新支付系统，注重与国际支付体系的连接。2017年5月，央行宣布将推出新的乌兹别克斯坦全球支付系统，将与国际支付系统Visa、万事达、银联国际、JCB、美国运通和其他支付系统建立联系，以确保用与系统匹配的乌兹别克斯坦全球银行卡(GlobUzCard)开展外汇业务，以及在乌

^① 中央银行动态网站，<https://www.centralbanking.com/central-banking/news/2482227/central-bank-of-uzbekistan-issues-new-highest-denomination-banknote>

境内使用国外银行卡。^①

三是多部门共同协作，为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全方位保障支持。乌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系列措施，以应对改革对经济的冲击。在金融系统内，乌政府要求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2017年上半年，乌央行通过增资的方式对国有银行补充了流动性。在行政执法领域，对乌境内的外汇黑市进行整治，限制外币现金在乌境内非法交易和流通。在财政领域，乌财政部门对基础经济领域给予支持，避免改革后可能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

四是积极沟通国际性金融组织，为改革寻求技术支持。2017年7月初，乌政府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双方主要就乌货币政策改革方案、推动外汇体系改革等紧迫的现实问题举行首轮磋商。IMF表示愿意支持乌国货币系统实现自由化，并愿意向乌国政府的改革计划提供进一步的技术合作和政策建议。^②同时，乌政府聘请麦肯锡等国际咨询机构为改革进行前期评估，并借鉴哈萨克斯坦、埃及等国的汇改经验，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二）内容评价

在《实施细则》颁布两天后，9月4日，乌央行发表《关于总统令“货币政策自由化的有效措施”的评论》^③及《对乌兹别克斯坦本外币汇率设定的规定》^④，对《实施细则》的具体执行措施进行了补充。综合上述文件，下文对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评价。

一是统一外汇汇率的设定。2017年9月4日，乌央行宣布，根据《实施细则》，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发展方向之一，就是形成本币苏姆的汇率市

①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явится новая платёжная система. 2017.5.23, <http://www.anons.uz/article/economics/19442/>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tatement at the Conclusion of an IMF Staff Visit to Uzbekistan”，July 24, 2017. <http://www.imf.org>

③ 乌兹别克斯坦央行，“Commentary to Decree of the President On Priority Measures for Liberalization of Currency. Policy”，published by the CBU on 4 September 2017, <http://www.cbu.uz>

④ 乌兹别克斯坦央行，“Announcement of the CBU,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National Currency In Relation to Foreign Currency”，published 4 September 2017, <http://www.cbu.uz>

场化机制。根据对 2003-2017 年影响汇率相关因素所进行的分析测算，确定苏姆的平均汇率，应在 1 美元兑 8000-8150 苏姆的区间，并明确 9 月 5 日苏姆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为 8100: 1，较前一天贬值 48%，以准确反映苏姆的市场价值。对本币苏姆汇率的调控，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最重要环节。乌央行主动调控汇率区间，旨在彻底解决苏姆汇率实际存在的汇率双轨制问题。这一举措与 2014 年哈萨克斯坦央行主动调控坚戈汇率、大幅贬值本币的政策举措高度相似。^①通过一次性调控，使得乌官方汇率与货币实际价格趋近，对于打击外汇黑市、减少外汇交易套利空间、避免外汇黑市引发的逃漏税行为、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积极意义。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增长及通胀控制造成冲击，但长期对于改善乌营商环境、形成开放经济意义重大。

二是取消出口收汇强制结汇。乌央行取消了外贸出口收汇强制结汇的要求。在 2017 年 2 月之前，政府要求出口商将 50% 的出口收汇，按照官方汇率兑换成苏姆。2017 年 2 月之后，乌央行将某些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商的强制结汇比例减少到 25%。改革之后，彻底取消了出口收汇强制结汇的要求。改变出口收汇强制结汇，使得外汇使用的自由度增加，外汇交易主体的自主性增强，有利于提高外贸积极性，保护出口商的利益。

三是放开对外汇交易银行的牌照要求。《实施细则》允许商业银行根据合同双方签订的协议，建立外币贷款的发放和接收条件；银行购买和出售外币有关的佣金由银行自行确定；放开了外币经营业务资格管制，经营外币业务的银行不再需要执照。这些举措的实施，增加了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放宽了交易限制，完善了市场机制，提升了竞争和服务水平。

四是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自由换汇。在外汇交易环节，保障法人和自然人的自由换汇权利。乌法人企业可以在被授权商业银行不受数额限制的自由购买外汇，用于国际贸易业务付款（包括商品和服务进口、跨国劳务、利润返还、贷款偿还、旅行费用支出及其他非贸易性质的资金转移）。同时规定，该国境内所有自然人，均可在官方认可的外币兑换网点或被授权商业银行，按照有关规定自由兑换外币，但是需将兑换的外币存入具有国际支付功能的

^① 刘遵乐：“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调控坚戈汇率的影响”，《欧亚经济》，2014 年第 3 期，第 73 页。

银行卡，才可在国外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法人自由兑换外币，标志着乌长期的外汇管制结束，虽然与实现外汇完全自由汇兑还有一定差距，但比之前严格的外汇管制已出现明显改善。自然人自由购汇增加了居民使用外汇的便捷性，使用银行卡的限制则利于掌握资金流向，防控套汇、洗钱等风险。

五是强化在乌境内使用本币的相关规定。禁止在境内使用外汇支付货款（劳务或服务费用），但允许按照国际交易规则，使用有跨国支付功能的银行卡付款；货物、劳务及服务的价格和运费标准，以及注册当地法人企业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均以本国货币进行定价；国家关税和其他强制性支付只能以当地货币进行缴纳。乌央行在汇率市场化改革中同时推出在境内使用本币的相关规定，可防范由于本币贬值引发的国内美元化加剧的问题。在缴税、重要工程结算等关键领域对本币结算进行强制规定，确保了汇改后本币的使用率，以保障本国货币主权。

汇率市场化改革覆盖了乌外汇操作的全流程，对制约外汇自由流动的不利因素进行了修正，有利于形成外汇从商品交易到外汇与本币的结算、再回到银行业体系的良性循环过程，回归了外汇交易的市场属性，提升了外汇使用效率。

四、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及前景展望

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措施，紧密围绕新总统扩大开放的经济战略，是系列金融改革的开端，目标在于将外汇制度与国家战略相协调，提升外汇政策、汇率制度对于经济开放的支持度。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世界主要经济金融组织，都对乌汇率市场化改革给予了明确的肯定与支持。在世界银行 2017 年 11 月公布的《2018 年营商环境报告：以改革促就业》中，乌 2017 年度进行的系列改革，被列入世界营商改革前十名。^①由于改革涉及范围广、力度大，将对经济金融的多方面造成影响和冲击。

（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

^① 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 2018: reforming to create jobs”，October 31, 2017, <http://www.worldbank.org>

一是本币支付能力大幅减弱，企业外汇流动性紧张。乌央行通过对市场形成的真实汇率水平进行测算，然后行政定价确定新的汇率水平。这种汇率调控方式，优点在于，短期内实现了官方汇率与外汇交易价的并轨，有助于消除汇率双轨制的套利空间，打击汇市投机行为。缺点则在于，官方汇率大幅贬值，本币支付能力下降，对存在外币债务的垄断性国企影响较大。以乌国家电力公司为例，其收入为本币，但是其债务及后续投资需要大量外币支出，苏姆汇率大幅贬值，可能会造成这类企业短期内的外汇资金流动性紧张。

二是外部经济风险传导性增强，易对乌国内经济造成冲击。资本管制的放松、外汇交易的自由化，将放大外部经济变化对乌国内经济的影响。美联储加息、国际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都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基于此，乌央行原定于2017年10月1日开放对于个人账户提取外汇的限制，现已推迟，具体执行日期尚未确定。

三是投资产出不及预期，发生外债风险的可能性增加。乌政府通过大力引资发展国内经济，从长期来看，外债增长将是必然趋势。如果投资不能够投向有效率的产业或者投资产出不如预期，将加大外债偿付的流动性风险。

四是物价大幅上涨，对人民生活产生负面影响。此次改革将对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产生较大影响。乌作为一个农业国，人均收入较低，贫困问题仍未解决。同时，国内通胀压力较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7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为8%，根据2017年前三季度情况估算全年将上升至13%，2018年也将维持在12.7%的高位。^①短期内本币汇率大幅贬值将造成物价上升，对人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这是乌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乌政府自身也对改革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了预判和防范。为应对汇率并轨造成的货币贬值可能引发市场大额现钞供应不足的问题，乌央行在2017年3月、8月，分别发行面值为10000和50000苏姆的新钞。^②并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在9月2日起一个月内，根据改革的实际进度，央行将与财政部和司法部共同向政府提交一项关于《实施细则》的修改和增补方案。至

①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7, p.251, <https://www.imf.org>

② 乌兹别克斯坦央行网站，http://www.cbu.uz/en/banknoty-i-monety/bank_noty/

2018 年上半年，央行将根据改革进度制定新的货币监管法案，这可能取代 1993 年 5 月 7 日颁布的第 841 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货币监管法案》^①，形成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景展望

从长期看，外汇交易自由化，形成本国货币汇率的市场机制，将有利于营商环境的改善，提升外商信心，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商而言，本币汇率的大幅贬值有利于提升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获取更多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对于进口商而言，外汇使用的便捷性增加有利于引入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改进本国生产效率。

改革还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转型方向。改革前，乌央行对货币政策的阐述是：保持本国货币购买力的稳定，创建稳固持续的货币、信贷和外汇交易市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并融入世界经济。结合米什金的货币政策分类^②，以及具体的操作实践，乌货币政策应诠释为：以外汇储备和国内信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管理框架，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障本国金融稳定。

乌本次改革的思路与之前货币政策目标有所区别。《实施细则》中提到：将外汇资源集中在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技术进步、现代化发展和多元化发展上；消除货币流通领域过度的行政监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限制货币供应量，维持国家预算平衡。这体现了外汇政策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诉求。对货币市场监管的目的在于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在于防范改革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防控通胀风险。乌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已经由原来的侧重于维护货币购买力、保障国内金融稳定，向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转型。

①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в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 Валютном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1993.5.7. http://lex.uz/pages/GetAct.aspx?lact_id=81670

② 米什金 (Mishkin) 认为有 5 种基本的货币政策及汇率框架：(1) 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2) 以货币供应总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管理框架；(3) 固定汇率框架或紧盯其他主要币种汇率的汇率制度；(4) 多种目标并行的货币政策管理框架；(5) 以外汇储备和国内信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管理框架。Frederic S. Mishki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with Different Monetary Policy Regime”, NBER Working Paper 7044, 1999.

五、汇率市场化改革对中乌合作的影响

汇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开端，将带动金融开放加速，其对中乌政治、经贸、金融合作产生的全方位影响，值得关注。

从短期看，对两国经贸合作有负面影响

一是苏姆贬值对两国贸易造成不利影响。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中乌贸易中属于贸易顺差国，顺差规模最高时接近两国贸易总额的 30%。苏姆贬值将削弱乌进口商的购买能力，对中国对乌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虽然乌总统要求政府部门制定并采取相关措施，减少货币贬值对涉外经济造成的影响，如优化海关税率以避免进口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但具体能否发挥作用，仍需进一步观察。

二是可能对中乌重点合作项目的推进产生影响。目前，中国企业在乌承建有安格连-帕普铁路、安格连热电厂改造等多个项目。中方参与建设的重点项目，多以美元计价为主。^①苏姆大幅贬值将削弱乌政府的支付能力，中国企业应密切关注项目资金的持续投入情况。

从长期看，有利于深化中乌合作

本次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相关举措并未完全展开，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且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但是改革体现了乌改善本国营商环境的决心。中国作为乌的第一大投资国，苏姆官方汇率的大幅贬值，降低了对乌直接投资的成本；外汇管制的放松，方便了中国企业在乌结汇以及回收利润，为投资提供了更好的金融环境。改革呈现出的乌政府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新动向。

一是乌推进对外开放，将有利于中乌深化双边合作。自 1992 年中乌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形成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鉴的合作新格局。^②2013 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

^① 以安格连-帕普铁路甘姆奇克隧道为例，2013 年 7 月，中铁隧道集团与项目建设方签订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造价 4.55 亿美元。新华网，“甘姆奇克隧道进入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收官阶段”，<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9/c-128642952.htm>

^②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访问中国”，中国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ae/201705/20170502574561.shtml

到乌政府的响应和支持。2017年5月，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来华访问，并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两国元首在会面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战略主线。本次乌加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改革举措，与“一带一路”倡议内涵高度吻合，将为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二是乌地缘位置重要，其政策调整将有助于改善中亚区域营商环境。乌与中亚其他四国都有接壤，其首都塔什干早在苏联时期就是中亚地区的中心城市。卡里莫夫时期，乌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存在水资源矛盾和领土边界纠纷，与哈萨克斯坦一直在争夺区域的领导权。新总统执政后，认识到邻国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缓和区域矛盾，并将中亚地区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乌外交政策的调整，有助于中亚地区的稳定，对中亚一体化进程重启具有积极意义。^①虽然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区域的安全稳定正呈现向好的趋势，整体营商环境得到改善。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与和睦的中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对促进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互通重点项目的实施，意义重大。

三是中乌金融合作基础良好，金融改革将为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契机。在央行层面，2011年，为促进中乌两国贸易和投资，中国人民银行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银行签署了金额为7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有效期三年，到期后双方未进行续签，但为两国央行间开展金融合作奠定了基础。银行业金融机构层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在乌设立工作组，并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平台作用，支持中乌石油管道建设等重点项目，为两国能源合作提供金融保障。中国进出口银行中亚工作组也已移驻乌兹别克斯坦，作为我国政府对乌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行，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低息信贷支持。央行以及大型银行业金融机构间的合作为两国深化金融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汇改成功，乌可能持续推出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举措，这将为两国在原有基础上深化金融合作提供良好契机。

^① 焦一强：“‘继承’还是‘决裂’？——‘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8页。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September 2017, Uzbekistan launched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exchange rates. This reform involves the whole process of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 aiming at eliminating negative influences of the dual-track system of exchange rates and capital controls over foreign-rel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zbekistan. Uzbekistan's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exchange rates is beneficial to form the market property and benign circul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s, demonstrating Uzbekistan government's new orientation to expand its opening-up policies and firm determination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Since the reform is still on the road, results need to be further assessed.

【Key Words】 Uzbekistan Economy, Uzbekistan Finance, Uzbekistan Exchange Rate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целях улучшения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среды в сентябре 2017 год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началась рыночная реформа обменного курса.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анной реформы охватывает весь процесс валютных операций. Целью же является устранение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двухсторонней системы обменного курса и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капиталом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Реформа рыночного курс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рыночного цикла и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му обороту валютных операций, что отражает новую тенденцию узбек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открытию страны внешнему миру и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глобаль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Процесс реформ всё ещё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ег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требует дальнейшей оценк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кономик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финансы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бменный курс Узбекистан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苏研究

冷战以来西方学者有关 19 世纪俄国官僚史的研究：理论、观点和趋势

张广翔 周嘉滢*

【内容提要】西方学者有关 19 世纪俄国官僚史研究的兴衰，是冷战以来西方史学发展和美苏关系变化的缩影。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使西方学者对俄国当代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西方学者以现代化理论和“1917 年范式”为依托，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构建出有关俄国政治史研究的理论体系。这些研究揭示了 19 世纪俄国文官制度的内在演进趋势，肯定“开明官僚”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还对俄国官僚的派系斗争和政府部门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并考察改革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苏联解体后，现代化理论和“1917 年范式”面临挑战，“新政治史”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俄国史研究格局。

【关键词】俄国“大改革” 俄国国家与社会 俄国官僚制 俄国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1-0128(31)

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使西方学者对俄国当代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①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在现代化理论和“1917 年范式”的研究

* 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周嘉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中的“西方学者”主要是指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学者，与 English-speaking Scholar 或 Anglo-American Scholar 的表述对应。

框架下，二战后从事俄国史研究的第一代西方学者主要关注俄国 1917 年革命的起源，^①探讨革命运动的形成与发展、革命政党的组织和思想等问题。^②在西方学界的传统视野下，十月革命迫使俄国未能朝着西方民主式的议会制政治制度方向发展，^③而“大改革”仅被视为俄国民主化失败长路上的一个节点。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大改革”才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这与美国国内的局势密不可分。当时，年鉴学派的学术影响、美国政坛的动荡不安和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不仅使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走到了历史学家的面前，也使新社会史研究在美国学界异军突起，并成为二战后从事俄国史研究的第二代西方学者的主要研究手段。自此，作为研究俄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切入点，俄国“大改革”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议题。

随着马克斯·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理论在英语国家的传播和盛行，西方学者对俄国“大改革”前后官僚史的兴趣大增。西方学者围绕 19 世纪俄国文官制度的演进、“大改革”前后“开明官僚”的形成与作用以及“大改革”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展开大量讨论，用以揭示官僚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引领了国际学界有关俄国政治史研究的学术潮流。同时，西方学者有关 19 世纪俄国官僚史研究的兴衰，也反映出冷战以来美苏关系的某些变化和西方俄国史研究领域的理论转向。

本文将梳理西方学者有关俄国“大改革”与官僚关系问题的主要研究成

① 美国学者按照二战后从事俄国史研究的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将其分为老、中、青三代。三代学者分别活跃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期、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末和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参见 Майкл Дэвид-Фокс. Введение: отцы, дети и внуки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ост. Майкл Дэвид-Фокс. Вех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амара, Самар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0. С.7-20.

② Ben Eklof, “Introduction”, in Ben Eklof, John Bushnell, Larissa Zakharova, eds., *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viii-ix.

③ 参见 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The First Year of Soviet Rule in Petrogr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13; [美]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危机时刻的政治领袖：克伦斯基与列宁”，张广翔、周嘉滢译，《北方论丛》，2017 年第 5 期，第 38 页。

果，^①总结西方学者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国的俄国政治史研究与西方的俄国政治史研究存在的差距，^②借以深化中国学者对俄国史、美国史、冷战史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最终推动中国俄国史学科的发展。

一、“官僚制”理论在西方学界的传播

“层级官僚制理论”在 20 世纪初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马克斯·韦伯，1864 年出生于德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毕生致力于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强调新教教派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理性教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这时起，“社会的理性化”成为韦伯著述的核心内容。后来，韦伯围绕政治支配和权威形式等政治问题，以及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印度的佛教、古犹太教等宗教问题开展研究，试图挖掘东西方文化发展存在差距的根源。1920 年韦伯离世，其遗著两卷本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分别于 1921 年和 1922 年出版，其中包含了韦伯的社会学观点及对现代文明本质的看法。美国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后将该书的部分内容由德文译成英文，并于 1947 年在美国出版。韦伯的著作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与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帕森斯的宣传有着密切的联系。^③1930 年，帕森斯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出版，并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中阐述了韦伯在社会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1947 年节选《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① 有关国外学界的阶段性进展，参见 Daniel T. Orlovsky, “Recent Studies on the Russian Bureaucracy”, *The Russian Review*, 1976, Vol.35, No.4, pp.448-467; Marc Raeff,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a of Imperial Russia, 1700-190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9, Vol.84, No.2, pp.406-411; Большакова О.В. Влас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19-начала 20 века: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М., Наука, 2008. С.106-133.

②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从事俄国史研究的“学术中心”有三个，分别为俄国学界、英美学界和欧洲学界（以德法为主）。

③ 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结构功能理论逐渐在西方形成。结构功能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并将其不断发展，主要关注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及其对行动者的限制作用等问题。

Organization) 的出现,^①使西方学界掀起了有关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大讨论。

韦伯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形式,分别是传统型权威(宗主、父权和封建制度)、魅力型权威(家族和宗教)和法理型权威(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层级官僚制理论”正是源于第三种权威形式即法理型权威。^②

“层级官僚制理论”包含以下几个基本内容:分工合理(科层化),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清晰且固定(法制化);官僚组织是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组织成员必须依照规程办事;决定和命令均以决策文书为准;组织管理非人格化,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规范成员的行为;注重专业培训(专业化),满足工作需要;人事行政制度合理化和合法化。^③韦伯还分析了三种组织类型发生改变的可能,认为传统组织和官僚组织较为稳定,尤为推崇以分部一分层、集权一统一、指挥一服从为特征的官僚组织。20世纪50年代以后,韦伯的许多著作被译成英文出版,西方学界兴起了“韦伯热”。西方学者热衷于研究韦伯的理论,并使用韦伯的理论开展“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有关非西方世界政治问题的著作大量涌现。^④其中,在韦伯100周年诞辰之际出版的三本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官僚问题的论文集,推动了西方学界有关俄国官僚史研究活动的开展。

1960年,由美国政治学家编纂的论文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和《从帝国到国家》(*From Empire to Nation*)相继出版。两书试图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Structural-Functional Theory)基础上,构建新的政治分析模型。第一本书关注东南亚、南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近东和拉丁美洲地区,提倡将人类学和社会学引入政治问题研究当中;第二本书关注亚洲和非洲地区由殖民统治到争取独立的国家,强调研究制度变革的重要性。1963年出版的论文集《官僚和政治发展》

① 1968年,更为完整的英文译本出版, Guenther Roth, Claus Wittich, eds.,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② A. M. Henderson, Talcott Parsons, eds.,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324-406.

③ 《韦伯作品集(三):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30页。

④ 在西方学者眼中,“非西方世界”等同于“欠发达国家”。

作为对《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1960）一书的补充，通过比较研究和个案分析的手段，试图阐释国家官僚和政治体制在苏联、东欧、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越南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①韦伯的理论在这里遭到了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文化范围；第二，在非西方的欠发达国家，官僚的非理性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官僚的理性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必然的联系”需要重新审视；第三，“官僚制”未必迎合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有关官僚制的结构及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应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开展。^②默尔·范塞德在考察俄国官僚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时发现，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官僚成为俄国国家的领导力量，19世纪下半期他们胜任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职务，却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政治需求，从而为1917年革命的发生埋下了隐患。^③范塞德的研究同时表明：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未必和政治现代化同步，而在低效和腐败的官僚体制下，经济现代化进程同样可能发生。至此，韦伯的理论被应用于俄国历史研究当中，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引发西方学者有关现代化理论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除了这一坚实的理论基础外，还有两点现实因素促进了西方学界有关俄国官僚史研究的开展。第一，在肯定官僚制“理性化”积极作用的同时，韦伯还曾指出这种“理性化”潜在的消极影响：人类生活的理性化可能铸造以权力统治和理性为基础的牢笼，使人类生活在“冰冷又黑暗的极夜”（polar night of icy darkness and hardness），远离“夏日盛开的花朵”（summer's bloom）。^④十月革命以后，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期间，斯大林就已通过身兼

① Joseph La Palombara, “An Overview of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oseph La Palombara, ed.,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3-6.

② Joseph La Palombara, ed.,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ugene V. Schneider, “Review”,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5, Vol.360, p.181.

③ Merle Fainsod,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The Russian and Soviet Case”, in Joseph La Palombara, ed.,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246-249.

④ M. Weber, H. Gerth,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28.

数职、任命“在册权贵”等途径扩大权力，在政治领域加强控制和专政，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斯大林模式下逐渐形成。这一历史现象符合韦伯提出的“牢笼”和“极夜”般的结果，只是作为原因的“理性化”趋势及其发展程度仍需检验。于是，西方学者密切关注十月革命前俄国官僚组织的发展历程，以便认清“当代俄国”的政治问题并预测这一政权的未来走向。第二，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著名学者П.А·扎伊翁契科夫斯基培养出一大批从事帝俄国家机构和官僚制度研究的美国学者，^①为西方学界的俄国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与冷战期间苏联国际政策的改变有着密切的联系。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便着手调整对外政策，缓和紧张的美苏关系，主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并平稳发展国内经济。1958年，苏联与美国签署了广泛的学术交流计划，为美国师生提供了前往苏联深造和搜集资料的宝贵契机。^②扎伊翁契科夫斯基十分重视原始档案，专长于帝俄政治史研究，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培养出特伦斯·埃蒙斯、丹尼尔·菲尔德、阿尔弗雷德·里伯、布鲁斯·林肯、理查德·沃特曼、丹尼尔·奥尔洛夫斯基、提多尔·塔拉诺夫斯基等一大批从事俄国政治史研究的美国学者，为西方学界的人才储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上述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的双重影响下，西方学界有关俄国“大改革”前后官僚史的研究逐渐崭露头角。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揭示了19世纪俄国文官制度的演进趋势、“大改革”前后“开明官僚”的形成与作用以及俄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二、19世纪俄国文官制度的演进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常被冠以反动的标签，在亚历山大二世即位短短几年内，俄国政府实行了“大改革”。不论改革的原因为何，改革本

^① Сост., Л.Г. Захарова, С.В. Мироненко, Т. Эммонс.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к столетию истори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8.

^② [俄]О.В·波丽莎科娃：“П.А·扎伊翁契科夫斯基与20世纪60-80年代美国的俄罗斯学”，张丁育、周嘉滢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53-154页。

质上是一场由俄国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进行的政治行为。为了回答“改革为何会发生”，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大改革”前俄国官僚的社会背景、工作经验等问题，试图揭示这一时期俄国官僚的主要特征，希望能在“新型官僚”和“国家改革的需要”二者之间建立联系。

西方学界有关 19 世纪俄国官僚主要特征的研究，不仅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国家现实需要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美国“新政治史学”的部分思想。^①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新政治史学”一词便已产生，到 70 年代中期发展成为西方政治史研究的主流范式。“新政治史学”以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定量分析为主要方法，研究特定时期内大众选举、议会表决选举等政治行为。^②西方从事俄国史研究的学者深受这一新史学的影响，兼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和计量史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 19 世纪俄国文官制度的演进史，其中尤以理查德·沃特曼、沃尔特·品特、布鲁斯·林肯和丹尼尔·奥尔洛夫斯基的学术贡献最大。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理查德·沃特曼便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初步分析了参与 1864 年司法改革准备过程的俄国官僚的人事制度。^③沃特曼研究了 19 世纪 50 年代俄国重要法律部门官僚的教育经历，发现早在 40 年代，法律人才便在司法部出现，50 年代以后，毕业于高等法律院校的官僚所占比例提高。^④囿于资料的限制，沃特曼并未分析这些教育经历对俄国官僚价值观念和工作态度的影响，直到后来才在《俄国法律意识的形成》一书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⑤

沃尔特·品特在俄国官僚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品特主要研究了 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俄国官僚的社会出身、经济地位、民族、教育程

① 此时美国的“新政治史”与苏联解体后西方俄国史研究领域兴起的“新政治史”有着根本不同。

② 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70-373 页；于沛主编：《20 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13-215 页。

③ Richard S.Wortman, “Judicial Personnel and the Court Reform of 1864”,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1969, Vol.3, No.2, pp.224-234.

④ Ibid, pp.226-227.

⑤ Richard S.Wortman, *The Development of a Russian Legal Conscious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度、任职经验等问题。最初，品特以 1798 至 1824 年的 1923 名官僚和 1846 至 1855 年的 2952 名官僚为样本，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 19 世纪上半期这些官僚的主要特征，^①不过，品特的这些讨论并不深入，于是此后数年他继续围绕这一问题开展研究，探讨俄国文官制度的演进及其成因。

品特又以 1846 至 1857 年在俄国中央机构任职的 350 名高级官僚为研究对象，并将官僚视为独特的职业群体，与领地贵族、军人、牧师、商人和农民区别开来。品特发现，这些官僚多为贵族家庭出身，且以无地贵族居多；官僚具有接受正式教育的经历；官僚-技术型人才涌现，主要集中在俄国参议院、内务部和财政部。^②1980 年，论文集《俄国官僚：17 至 20 世纪俄国社会的官僚化》出版，旨在探讨帝俄时期和苏联初期俄国官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为主编之一的品特在其中一连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讨论了“大改革”前俄国文官制度的特征和俄国贵族在文官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品特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尽管俄国官僚的人数不断增加，但其社会出身、经济地位和所属民族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俄国官僚的教育背景和任职经验有所改变，有军人背景的官僚在中央和省级机构所占比例降低，国民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官僚初入政坛时的年龄增加；^③俄国官僚内部分化趋势显著，非贵族官僚代替贵族地主管理俄国地方社会，^④反映出俄国政治制度的官僚化趋势。品特不仅揭示了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新旧两种类型官僚并存的现象，同时还注意分析他们彼此之间力量的消长关系。第一，新型官僚的出现并未对凭财富和门第晋升的传统官僚造成太大冲击；第二，新旧官僚在求学经历和任职经验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第三，新旧官僚在步入仕途时地位平等，客观上

① Walter M. Pinter,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Bureaucracy”, *Slavic Review*, 1970, Vol.29, No.3, pp.429-443.

② Walter M. Pinter, “The Russian Higher Civil Service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Reform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75, Vol.8, No.3, pp.57-63.

③ Walter M. Pinter, “The Evolution of Civil Officialdom”, in Walter McKenzie Pinter, Don Karl Rowney, eds., *Russian Officialdom: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pp.210-224.

④ Walter M. Pinter, “Civil Officialdom and the Nobility in the 1850s”, in Walter McKenzie Pinter, Don Karl Rowney, eds., *Russian Officialdom: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229-247.

增加了新型官僚在国家机构任职的概率。^①在品特的影响下，苏联学者С.М·特罗伊茨基和П.А·扎伊翁契科夫斯基分别考察了18和19世纪俄国部分官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②布鲁斯·林肯、丹尼尔·奥尔洛夫斯基、理查德·沃特曼等西方学者研究了“大改革”前俄国新型官僚的出身与形成问题。

另一位在19世纪俄国文官制度演进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西方学者是布鲁斯·林肯。林肯是美国研究俄国政治史的专家马克·拉伊夫的得意门生，并在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受益于美苏学术交流计划，前往苏联师从П.А·扎伊翁契科夫斯基研习俄国政治史。林肯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揭示了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重要政府部门官僚的特征，二是分析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开明官僚”的形成及其在“大改革”准备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三是描绘了革命前后俄国主要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③四是讨论了革命前俄国公民社会的形成问题。^④林肯有关19世纪俄国文官制度演进的观点体现在其数篇论文之中。

与品特采用的宏观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林肯兼用微观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尼古拉一世时期和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各部大臣的社会出身、民族、教育背景和任职经验等问题。林肯分别以尼古拉一世时期52名和亚历山大二世时期73名非皇室成员出身的大臣为研究对象，^⑤证实了俄国

① Walter M. Pinter, “The Russian Higher Civil Service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Reform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75, Vol.8, No.3, pp.64-65.

② Троицкий С.М. Русский абсолютизм и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XVIII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бюрократии. М., Наука, 1974;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П.А. Высшая бюрократия накануне Крымской войны//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74. №.4. С.154-164;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П.А. Губернска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накануне Крымской войн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75. №.9. С.33-51;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П.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аппарат самодержавной России в XIX в. М., Мысль, 1978.

③ W. Bruce Lincoln, *War's Dark Shadow: The Russians before the Great War*, New York: Dial Press, 1983; W. Bruce Lincoln, *Red Victor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④ W. Bruce Lincoln, *The Great Reforms: Autocracy, Bureau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Imperial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W. Bruce Lincoln, “The Ministers of Nicholas I: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ir Backgrounds and Service Careers”, *The Russian Review*, 1975, Vol.34, No.3, pp.308-323; W. Bruce Lincoln, “The Ministers of Alexander II: A Survey of their Backgrounds and Service Careers”,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976, Vol.17, No.4, pp.467-483.

官僚军人出身比例降低、文官所占比例提高、官僚教育程度高和技能专业化的趋势，并就庇护人制度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庇护人制度与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品质忠诚和在省级机构的任职经验等因素均有利于官僚的晋升。

林肯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尼古拉一世时期国务会议的组成和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编纂委员会成员的社会背景和任职经验。^①林肯分别以国务会议 148 名非皇室成员和编纂委员会 38 名常驻成员为研究对象，^②从官僚组成的角度揭示“大改革”发生的原因。林肯的研究表明：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各部大臣的贵族出身反映出沙皇和官僚认为俄国现存制度具有合理性，相信俄国的农民问题可以通过小修小补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局面；^③当俄国面临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维持自身大国地位的双重挑战时，尼古拉一世并未将国务会议视为重要的管理和决策机构（很少任命亲信），国务会议成员本有能力为俄国寻求解决方案，但因其服从于沙皇的绝对领导、秉承沙皇求稳的政治风格，最终没有成为“改革的先锋”。^④林肯还研究了 1847 至 1857 年俄国官僚的组成，揭示了改革前俄国政府对文官的具体需求。^⑤林肯发现，俄国官僚总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不均，不同部门的官僚总数年均增长速度不一，通过择优途径晋升的官僚在不同年份和不同部门同样有所差别；同时，在“大改革”的前几年，内务部、司法部和国有资产部等参与改革的主要部门，已经做好了吸纳优秀人才并借助其知识和能力改变俄国现状的准备。林肯的这些发现分别从沙皇态度和人才储备两个方面解释了“大改革”没有发生在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原因。

与林肯采用的微观研究方法相类似，丹尼尔·奥尔洛夫斯基以 1855 至

① W. Bruce Lincol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State Council under Nicholas I",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1976, Vol.10, No.3, pp.369-381; W. Bruce Lincoln, "The Editing Commissions of 1859-1860: Some Notes on Their Members' Backgrounds and Service Careers",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78, Vol.56, No.3, pp.346-359.

② 编纂委员会成员由 17 名国家官僚和 21 名地方专家共同组成，加上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夫采夫，共计 39 人。

③ W. Bruce Lincoln, "The Ministers of Nicholas I: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ir Backgrounds and Service Careers", *The Russian Review*, 1975, Vol.34, No.3, pp.322-323.

④ W. Bruce Lincol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State Council under Nicholas I",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1976, Vol.10, No.3, pp.379-381.

⑤ W. Bruce Lincoln, "A Profile of the Russian Bureaucracy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Reforms",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Neue Folge, 1979, Bd.27, H.2, pp.181-196.

1881 年间俄国内务部官僚为研究对象，在考察这群官僚的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任职经验、晋升条件等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内务部政治角色的变化和成因。奥尔洛夫斯基以身居要职的 87 名高级官僚为样本（约占高级官僚人数的 80%），发现其特征与此前品特等学者进行宏观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同时，奥尔洛夫斯基还指出了内务部官僚的独特性：在任职经验方面，专业技术人才数量有限，官僚组成仍以有多方面知识和经验的通才为主，延续了“在职训练”的传统；在晋升条件方面，因改革后官僚人数无法满足国家管理需求，官僚可以不按法律规定晋升，或可因表现优异优秀而被破格提拔，或因某些岗位人才短缺而正式晋升或充当临时工，各部拥有很大的提拔权，而且，与负责人的私人关系会对官僚的晋升产生很大影响。^①奥尔洛夫斯基的研究表明：1855 至 1881 年间，俄国内务部官僚的晋升与专业化训练的关系不大，反而更取决于工作经验、政治觉悟和私人关系。这些现象间接解释了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内务部政治倾向日趋保守的原因。

品特、林肯和奥尔洛夫斯基等学者有关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官制度演进问题的研究，其实质是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考察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官僚制度的发展史，19 世纪以前和 19 世纪中期至革命前俄国的官僚制度同样不容忽视。罗伯特·克拉米考察了 17 世纪俄国贵族官僚的起源，即，波雅尔贵族在俄国政治舞台的表现。布伦达·沃特斯指出，《官秩表》在为非贵族阶层打开政治通道时，并未切断 17 至 18 世纪贵族的仕途。唐·罗尼发现，1905 至 1917 年间专业性人才在俄国内务部高级官僚中所占比例不高。^②这些研究成果与沃特曼、品特、林肯和奥尔洛夫斯基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共同揭示了

① Daniel T. Orlovsky, “High Officials in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1855-1881”, in Walter McKenzie Pintner, Don Karl Rowney, eds., *Russian Officialdom: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265-275.

② 例如 Robert O. Crummey, “The origins of the noble official: the Boyar elite, 1613-1689”, in Walter McKenzie Pintner, Don Karl Rowney, eds., *Russian Officialdom: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46-75; Brenda Meehan-Waters, “Social and care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ministrative elite, 1689-1761”, pp.76-105; Don Karl Rowney,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e Pre0revolutionary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pp.283-315.

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官僚制度的变革与延续。其中，“变革”的表现包括教育程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家庭纽带的影响越来越小，军官与文官的职责日渐分离；“延续”的表现，包括俄国官僚组成仍以贵族为主，客观性的选拔标准对官僚成分的影响不大，中央官僚与地方官僚在教育程度、思想观念等方面始终存在较大差异，等等。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有关俄国社会阶层的研究只涉及沙皇、农民和贵族三个方面。沙皇的权力、贵族的地位和农民的解放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俄国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官僚则被视为贵族的附庸或者等同于贵族本身。西方学者有关 19 世纪俄国文官制度演进史的研究，无疑扩大了俄国史研究的范围。他们兼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和计量史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将俄国官僚看作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善于比对俄国官僚是否与官僚化、社会化和专业化这三个“理性化”特征相符。其中，官僚的官僚化和社会化特征较为明显，而其专业化程度不可高估。

与此同时，这些成果还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马克·拉伊夫等学者的观点。^①根据传统观点，“大改革”的进行必须从外部寻找原因：尼古拉一世在位的 30 年是俄国历史上最为反动的一个时期，来自外部的压力迫使俄国沙皇和官僚改变思考方式并着手改革。上述成果无疑揭示了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官僚制度内在的演进趋势，肯定了部分官僚在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上为改革所做的准备。

然而，这些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并未说明“国家改革的需要”的具体内容，并未回答新型官僚究竟如何满足“国家改革的需要”这一问题，更未反映出新型官僚对俄国政策的实际影响。究其原因，是定量分析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缺陷，制约了有关俄国新型官僚与“大改革”关系的研究的深入，直到有关“开明官僚”与“保守官僚”的二分法研究的兴起，这一研究缺点才逐渐被克服。

^① Marc Raeff, “The Russian Autocracy and Its Officials”, *Harvard Slavic Studies*, 1957, Vol.4, pp.77-91; Hans-Joachim Torke, “Das russische Beamtentum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Forschungen zur Ost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1967, Bd.13, pp.158-159.

三、“开明官僚”的形成与作用

由于俄国官场确实存在懒散、腐败等作风，“官僚”一词最初在从事俄国史研究的西方学者眼中带有贬义色彩，这与革命前的史学著作和苏联时期的多数著作如出一辙，并在西方学者特伦斯·埃蒙斯和丹尼尔·菲尔德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

特伦斯·埃蒙斯考察了特维尔省贵族委员会改革方案的提出及其最终命运，^①描述了在农民改革准备过程中贵族和官僚的斗争。埃蒙斯将1858年《十二月提纲》取代《四月提纲》和1859年省贵族代表大会的召开视为政府制约地方贵族的有力举措，认为二者分别从立法程序和具体职能上限制了地方贵族的作用，最终加强了中央对立法结果的影响。^②埃蒙斯由此断定，俄国官僚制与韦伯提出的“合理化”官僚制相去甚远，沙皇的个人影响依旧很大，甚至可以选派亲信来左右国家的决策^③而无视贵族的想法。^④丹尼尔·菲尔德将改革视为旧时代的结束和沙皇的胜利，从而回答了“这场改革为何在那种政权下发生”这一问题。^⑤菲尔德描绘了官僚安抚贵族和推进改革等行动，认为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副内务大臣H.A·米留金、编纂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夫采夫等官僚将贵族视为顽强、统一的对手，他们通过赢得沙皇信任的手段来打击贵族势力。^⑥但是，在菲尔德看来，俄国官僚和贵族的斗争及其结果并不是农民改革的真实原因，根源在于农奴制丧失了道德和文化基础，贵族不再维护农奴制。

俄国官僚制与韦伯提出的“合理化”官僚制概念并不吻合，这一情况基本属实。然而，埃蒙斯和菲尔德有关俄国官僚作用的论述显然存在问题。埃蒙斯总结了特维尔省自由主义贵族的改革提议，其中至少有三点非常激进，

① Terence Emmons, *The Russian Landed Gentry and the Peasant Emancipation of 18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② Ibid, pp.209-318.

③ 《十二月提纲》的出台确实是罗斯托夫采夫和兰斯科伊联合的结果。

④ Terence Emmons, *The Russian Landed Gentry and the Peasant Emancipation of 1861*, pp.416-417.

⑤ Daniel Field, *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55-186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3.

⑥ Ibid, pp.265-323, 364.

即赋予农民完全的自治权、直接废除地主对农民的所有控制权、跨越临时义务农阶段。^①这些“进步”举措无非想让农民以最快的速度转变角色，但是没有考虑几个世纪以来农奴制下俄国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农民的适应能力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特维尔省贵族的“自由主义”倾向同样不可大力赞扬，因为特维尔情况较为特殊，位于非黑土区、许多农民靠外出打工谋生，黑土区才与农奴制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菲尔德没有分地区考察俄国贵族的態度，其提出的“文化因素说”和农奴制终结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必然的和有说服力的联系；同时，俄国官僚作为沙皇意志的執行者，官僚与贵族斗争的实质是沙皇与贵族的周旋。值得注意的是，菲尔德的研究缺陷并非个案，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缺少必然的联系正是将文化史引入政治史研究后西方学者普遍面临的研究困境。

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影响下，布鲁斯·林肯、理查德·沃特曼等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自由派”官僚群体的形成与作用等问题，从而将有关“大改革”动力的研究向前推进。

林肯在此前近 20 年的研究生涯中，曾为 H.A·米留金、尼古拉一世等人编写传记，^②并围绕俄国文官制度的演进和开明官僚问题撰写了若干论文。林肯证实了大公夫人巴甫罗夫娜在扶持“开明官僚”、扩大“改革者圈子”、加强贵族与编纂委员会成员联系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③初步研究了改革前内务部和国有资产部“开明官僚”是如何形成的，^④介绍了 H.A·米留金等官僚在 1846 年城市改革和 1848 至 1856 年有关农民改革问题讨论过程中

① Terence Emmons, *The Russian Landed Gentry and the Peasant Emancipation of 1861*, pp.89-151.

② W. Bruce Lincoln, *Nikolai Miliutin: An Enlightened Russian Bureaucrat of the 19th Century*, Newtonville: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1977; W. Bruce Lincoln, *Nicholas I: Emperor and Autocrat of All the Rus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W. Bruce Lincoln, *Petr Petrovich Semenov-Tian-Shanskii: The Life of a Russian Geographer*, Newtonville: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1980.

③ W. Bruce Lincoln, “The Circle of the Grand Duchess Yelena Pavlovna, 1847-186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70, Vol.48, No.112, pp.373-387.

④ W. Bruce Lincoln, “The Genesis of an ‘Enlightene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25-1856”,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Neue Folge, 1972, Bd.20, H.3, pp.321-330.

的观点。^①与以往的零散研究不同，林肯《改革的先锋：1825至1861年俄国的“开明官僚”》一书，在原有基础上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将“开明官僚”问题置于19世纪中期俄国的历史进程当中，从人才储备、组织机构和思想观念三个角度考察改革的立法过程和执行情况，试图回答“开明官僚”的形成、“开明官僚”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帝俄地理协会的作用、言论政策的变化和官僚的个人关系等问题。^②林肯指出了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有资产大臣基谢廖夫、内务大臣佩罗夫斯基、司法大臣帕宁等第一代“开明官僚”在选拔和培养人才方面所做的努力，^③分析了第二代“开明官僚”教育程度较高、追求高效率、与“圣彼得堡圈子”和帝俄地理协会保持密切的往来等特征，^④并将这群官僚的命运视为俄国不同沙皇政治理念的具体体现。1855年以后人数不多的“开明官僚”能够成功，与自身的经验、思想、地位和沙皇个人的支持密不可分；^⑤改革后俄国社会对“开明官僚”革新理念的排斥、官僚被阻挡在主要国家机构之外以及沙皇本人信心的动摇，使其最终失去了话语权。^⑥

理查德·沃特曼分析了“开明官僚”在俄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试图揭示“改革前俄国司法体制和司法观念的变化”。^⑦沃特曼考察了俄国法律意识的形成和19世纪俄国官僚内部的法律专业化趋势，重点关注司法改革前俄国官僚在人员组成和工作态度方面的变化。沃特曼将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官僚体制改革视为俄国司法改革的制度基础，分析了帕宁等高级官僚工作态度的转变，即由绝对服从于沙皇转变为追求真理和理想、倡导遵守法律并以在俄国法律机构工作为荣。沃特曼还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筹划1864年司

① W. Bruce Lincoln, "Russia's 'Enlightened' Bureaucrats and the Problem of State Reform. 1848-1856",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971, Vol.12, No.4, pp.410-421; W. Bruce Lincoln, "N. A. Miliutin and the St. Petersburg Municipal Act of 1846: A Study in Reform under Nicholas I", *Slavic Review*, 1974, Vol.33, No.1, pp.55-68.

② W. Bruce Lincoln, *In the Vanguard of Reform: Russia's Enlightened Bureaucrats, 1825-1861*,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Ibid.*, pp.30-40.

④ *Ibid.*, pp.41-138.

⑤ *Ibid.*, pp.168-202.

⑥ *Ibid.*, pp.207-210.

⑦ Richard S. Wortman, *The Development of a Russian Legal Consciousness*, p.5.

法改革的俄国新型官僚的教育背景和任职经验，发现来自中央和地方主要司法部门的官僚凭借自身教育背景和国家机构的任职经验而晋升。^①沃特曼在法律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框架内，考察了俄国 1864 年司法改革发生的原因。由于法律史研究跨学科较强，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沃特曼确实揭示了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开明官僚的形成及其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其一再强调的“法律意识”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的，实质是探讨俄国西方式法制观念何时形成、怎么形成等问题。第二，沃特曼不仅没有考察西方观念传入俄国以前俄国的司法制度和法律意识，在介绍 19 上半期西方式法律意识的形成过程时，同样没有明确法院制度、检察制度和法院体系等改革内容以及西方式法律意识与这些改革的关系。^②第三，沃特曼与菲尔德的选题性质较为类似，二者分别将 1864 年司法改革和 1861 年农民改革视为各自研究的“终点”，试图回答“司法改革或农民改革为何会在那种政权下发生”这一问题。1864 年以前俄国法官的形式主义、效率低下和工作不透明等弊端确实应该受到指责，但沃特曼仅以制度创新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并未探讨 1864 年以后俄国司法制度的运行以及改革后西方式法律意识在农民中间的传播情况，没有检验西方式法律意识在俄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长期影响。庆幸的是，在随后的二十余年，有关法律意识在俄国农民中间的传播情况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大讨论。

丹尼尔·奥尔洛夫斯基以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内务部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内务部的职能和组成及其在“大改革”准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奥尔洛夫斯基认为，内务大臣决定了内务部的总体政策和最终走向，内务大臣兰斯科伊深受国家利益至上观念的影响，其在位时又正值内务部成为俄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府部门。^③这三点因素推动了“大改革”的进行。在肯定“开明官僚”重要作用的同时，奥尔洛夫斯基、弗朗西斯·维斯勒等采用“二分法”

① Richard S.Wortman, “Judicial Personnel and the Court Reform of 1864”,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1969, Vol.3, No.2, pp.224-234.

② 近年来，中国学者梳理了近代俄国司法改革史，涵盖基辅罗斯至 20 世纪初俄国司法制度的变化和司法改革的内容。参见王海军：《近代俄国司法改革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年。这类研究与沃特曼的研究各有利弊，互为补充。

③ Daniel T. Orlovsky, *The Limits of Reform: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in Imperial Russia, 1802-18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52-63.

的学者，还以“开明官僚”的成功与失败为突破口探讨改革的局限。^①奥尔洛夫斯基努力寻找改革后俄国内务部的政治态度日趋保守、“由开明官僚的摇篮变为专制制度和领地贵族支持者”的原因，^②并从改革的原则、内务部的结构、官僚的组成和大臣的政策等四个方面加以阐释：第一，沙皇权力至上是革命前俄国官僚制度的总体原则。第二，1865至1881年间，俄国内务部的整体结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第三，1861年以后俄国官僚多有在警察和法律部门的任职经历且专业能力不强。第四，内务大臣依然决定着内务部的总体政策，^③奥尔洛夫斯基分析了内务大臣瓦鲁耶夫政治思想的两面性和延续性，^④并赞同И.А·扎伊翁契科夫斯基的观点，将这种“制度危机”（Autocracy in Crisis）视为俄国沙皇政权覆灭和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的根源。^⑤需要注意的是，奥尔洛夫斯基同时强调沙皇权力至上和内务部保守的政策，却没有考虑内务部政策是俄国沙皇政治态度的具体体现。实际上，“开明官僚”的成功与失败，同沙皇的态度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

林肯、沃特曼、奥尔洛夫斯基、维斯勒和约翰·基普在研究“开明官僚”的作用时，^⑥十分注重官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均认为时代思潮推动了改革的进行。提多尔·塔拉诺夫斯基不否认19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官制度的演进趋势、官僚的开明思想和部分官僚在改革准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塔拉诺夫斯基更为看重官僚在地方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并认为这些经验决定了官

① Francis William Wcislo, *Reforming Rural Russia: State, Local Socie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1855-191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5-17.

② Daniel T. Orlovsky, *The Limits of Reform: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in Imperial Russia, 1802-1881*, p.2.

③ Daniel T. Orlovsky, *The Limits of Reform: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in Imperial Russia, 1802-1881*, pp.3-12, 13-51, 63-84.

④ 瓦鲁耶夫的继任者季马舍夫（1868-1878）和马科夫（1878-1880）继续执行瓦鲁耶夫的政策，到1880年俄国内务部的政治态度已经非常保守。

⑤ Daniel T. Orlovsky, *The Limits of Reform: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in Imperial Russia, 1802-1881*, p.204.

⑥ 约翰·基普研究了陆军大臣 Д.А·米留金在19世纪中期俄国农民改革和军事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参见 John L. H. Keep, *Soldiers of the Tsar: Army and Society in Russia, 1462-187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pp.351-381.

僚的政治立场，即对俄国而言究竟选择哪条发展道路更为有效。^①塔拉诺夫斯基的观点富有启发性，但依然未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俄国哪些重要官僚属于这种“经验派”？“经验派”曾经在地方积累了哪些经验？在改革的准备过程中他们的哪些提议反映出他们的这些经验？“经验派”和“信念派”在俄国官僚群体中所占比例如何？等等。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对“自由与保守”的“二分法”研究提出了质疑，主张关注官僚内部的分歧和斗争。其中，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和阿尔弗雷德·里伯考察了利益集团在“大改革”过程中的活动。

与布鲁斯·林肯和理查德·沃特曼类似，斯塔尔同样未将 1856 年视为改革的起点，而是在考察 19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俄国政府有关地方自治改革立法活动的同时，兼顾改革前数十年官僚经验的积累和方案的构想等问题。^②斯塔尔较为详细地考察了俄国官僚有关“分权”和“地方自治”的构想和举措，将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实行视为官僚之间的斗争以及新的地方自治局和旧的地方省长管理体制之间的妥协。其中，内务部、司法部和国有资产部等中央官僚机构争取部门利益最大化，地方省长和贵族通过请愿的方式争取国家税收政策倾斜和提高贵族地位。^③斯塔尔排斥“二分法”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中央和地方官僚间的斗争，并考察俄国省长、贵族和地方自治局的矛盾，打破了官僚政治态度“自由与保守”的二元对立。但是，斯塔尔有关改革前社会舆论的研究多为罗列书名，只能证明当时确实出现了一批相关著作，并未深入分析英国、法国等模式的适用性和这些舆论的影响力，这一部分的论证显得非常薄弱。^④斯塔尔的研究还隐藏了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弱点：他主要利用俄国知识分子的计划、高级官僚的报告和相关会议记录，研究有关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思想史和制度史，而俄国知识分子一向将集权和官僚视为国家落后的主要标志，斯塔尔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一主张，缺少对俄国地

① Тарановски Т. Судебная реформа и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 Под. Л.Г. Захаровой, Б. Эклофа, Дж. Бушнелла. Великие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1856-1874. М., Изд-во МГУ Год, 1992. С.308-309.

② Frederick S. Starr, *Decentral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in Russia, 1830-18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③ Ibid, pp.175-184, 254-291.

④ Ibid, pp.51-109.

方社会适应能力的估计和判断,即并未分析俄国地方机构仍从属于中央机构这一现象的利弊。

里伯主要研究了“大改革”期间俄国利益集团的活动,希望借此对此前的“二分法”研究做出修正。^①里伯以内务大臣瓦鲁耶夫、陆军大臣Д.А·米留金等著名官僚为例,说明了“二分法”研究在结构分析和语言学方面存在的两个问题,认为“自由”和“保守”、“先进”和“反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等术语是以西欧经验为参照,一旦被用于俄国社会结构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当中,很容易产生问题,瓦鲁耶夫和米留金因其政策具有两面性而不能划入自由派官僚或保守派官僚阵营当中。^②里伯进而分析了“大改革”期间经济学家集团、工程师集团、军人集团和舒瓦洛夫集团围绕俄国铁路建设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军队改革和教育改革等问题进行的激烈斗争,^③并总结出这一时期俄国利益集团活跃的深层原因,即沙皇为了兼顾发展国内经济和维护财政稳定与建立现代军队和维护国际地位两条发展道路,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中间人,而沙皇本人和过于分散的利益集团却无法左右俄国的发展方向。^④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学者在俄国官僚的政治活动问题上著述丰富。他们采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分析了“开明官僚”在1861年农民改革、1864年地方自治改革和司法改革、1874年军事改革启动和准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发现了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官僚的分歧和斗争,意识到国家需要这一因素的影响,强调了不同沙皇统治时期俄国政治生活的连续性。据此,“大改革”既不是西方学者传统视野下自由派官僚和保守派官僚斗争的简单结果,也不是苏联学者一再强调的客观规律(“经济危机说”和“革命形势说”)的必然产物。这些方法和观点引领了国际学界的研究潮流,给予苏联解体前后摆脱思想束缚的俄国学者很

① Alfred J. Rieber, “Interest-Group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forms”, in Ben Eklof, John Bushnell, Larissa Zakharova, eds., *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 pp.58-83.

② Alfred J. Rieber, “Interest-Group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forms”, pp.62-63.

③ Alfred J. Rieber, “Bureaucratic Politics in Imperial Russi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978, Vol.2, No.4, pp.408-412; Alfred J. Rieber, “Interest-Group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forms”, in Ben Eklof, John Bushnell, Larissa Zakharova, eds., *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 pp.64-78.

④ Alfred J. Rieber, “Interest-Group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forms”, pp.78-80.

大的启发。^①

西方学者有关“二分法”争论的实质，在于对“开明官僚”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理解。林肯、沃特曼等“肯定派”学者强调官僚开明的世界观和削弱贵族势力、维护农民利益的开明举动；塔拉诺夫斯基等“中立派”学者建议以官僚的政治经验为首要评判依据，若按此类标准，部分官僚与肯定派学者提出的“开明官僚”有所重合；斯塔尔和里伯等“否定派”学者强调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的分歧和斗争，若按此类标准，部分“肯定派”学者提出的“开明官僚”则被排除在外。按照三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开明官僚”的人数必然有所差别。尽管“开明官僚”所包含的范围有大有小，但理论上那些未被“中立派”和“否定派”学者排除、三个派别共同认可的官僚群体必然属于“开明官僚”。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讨论还折射出西方学者之间另外一个重要的争论，即俄国官僚及其庇护人争取沙皇支持的举动，是俄国改革进程的主要动力还是属于俄国政治活动的派系斗争。实际上，这种分歧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俄国政治制度本身所决定。因此，学者究竟采用哪种评判标准，主要取决于研究角度和具体问题，即关注“大改革”的动力还是讨论“大改革”的局限。

四、改革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学者不仅关注 19 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官制度的演进和“开明官僚”的形成与作用，同时还围绕改革后官僚机构的作用和活动等问题展开讨论。在“1917 年范式”下，国家（State）与社会（Society）的关系是有关 20 世纪初俄国革命原因的重要议题，而官僚正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纽带。在研究帝俄最后几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时，西方学者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方面，他们集中探讨政府行为，分别从政治史角度考察中央政权改革社会的方案和能力，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改革方案对农民、工人和商人等社会阶层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密切关注社会阶层的政治活动，关注

^① Larisa Zakharova, “The Reign of Alexander II: A Watershed?”, in D.C.B.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93-616.

革命知识分子和贵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①在考察中央政权改革社会的方案和能力这一问题时，西方学者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将1864年以后成立的地方自治局作为突破口，在“上层政治”的研究框架下探讨“大改革”后至斯托雷平改革以前（即1905年革命以前）俄国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和地方社会的关系。

自19世纪中期开始，有关俄国地方自治局性质的讨论就已展开，^②两种理论成为长期争论的焦点。一种是“社会论”（public theory），兴起于19世纪60至70年代，主张地方自治局不具有国家行政职能而是属于社会组织。另一种是“国家论”（state theory），兴起于19世纪末，主张地方自治局是俄国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在研究俄国地方自治局的性质时，赞同“社会论”的学者强调地方自治局在教育、经济和医疗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赞同“国家论”的学者关注贵族在地方自治局中的主导地位。在研究地方自治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时，学者主要挖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寻找20世纪初俄国立宪主义运动的根源。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逐渐修正了传统观点。他们在考察地方自治局的性质时，将“国家论”与“社会论”相结合；在研究地方自治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时，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以及政府内部部门之间的斗争，揭示了俄国中央政权使地方自治局官僚化的趋势和俄国政府各部门的斗争对地方自治局的影响。

乔治·亚尼在“系统化”的框架下，考察1711至1905年间俄国管理体制的发展与演进，^③并率先对国家与社会相互对立的观点提出质疑。亚尼认为，“系统化”一词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以规章制度为基础的正式结构；第二，指国家官僚在正式结构中的组织方式。亚尼所采纳的正是第二种含义，用以考察俄国国家机构和国家政策的演进以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④并认为，

① 以利奥波德·海默森及其弟子为代表。Leopold Haimson, ed., *The Politics of Rural Russia, 1905-191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 俄国地方农民管理机构不仅包括1864年创建的地方自治局，还包括1861年改革法令明确规定的乡法院（volost' court）、村社（land commune）、村会（village assembly）等。

③ George L. Yaney, *The Systematiza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 Social Evolution in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Russia, 1711-190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④ Ibid, pp.5-6.

官僚机构在地方社会的微弱影响与其不断强化的政策不成正比。内务部与省长争夺控制地方社会的权力并最终占据上风，内务部与财政部就征税问题的斗争也一直在持续^①，改革后农民以承担间接税的方式延续了 18 世纪以前以征税和征兵为特色的管理体制。^②亚尼将这些现象视为俄国管理体制“系统化”失败的表现，强调中央政权现代化的决心与农村社会现实的冲突。亚尼还发现了俄国国家和社会进行合作的现象，尤其是 19 世纪末财政部为地方自治局偿清欠款并责成农业部向地方自治局施加援助，以及《1890 年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条例》规定县地方自治局递交给中央政权的请愿首先经由省地方自治局筛选^③，从而对国家与社会相互对立的观点做出修正，认为省地方自治局已成为中央政权的执行机构。亚尼研究的实质，是用“系统化”理论重新审视两百余年间俄国管理体制的变迁，但是他强于构建理论，疏于分析原因。在论证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和地方社会的关系时，亚尼更加关注政府法令和政策本身的演进，而非地方政权和农民的反应，其有关俄国地方社会面临的困境这部分内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在探讨改革后俄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时，还停留在“修正主义”时期以前的西方主流观点上，这一现象折射出从事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在考察俄国经济史问题时整体面临的局限。然而，这些缺陷不能仅归因于作者本人，实际上该书出版于 1973 年，成书时间必然更早。当时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正占据西方俄国史研究的主流地位，新社会史、文化史和新经济史的研究才崭露头角，这些缺陷反映出当时整个西方学界在研究俄国制度史时面临的问题。

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和乔治·亚尼在研究 19 世纪俄国官僚史时，虽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俄国地方自治局的问题，但并未探讨地方自治局内部贵族、农民和第三种人的关系，未深入分析地方自治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1978 年 4 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举办的一场题为“地方自治局：一场有关地方自治政府的实验”的学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④其中，由罗

① George L. Yaney, *The Systematiza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 Social Evolution in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Russia, 1711-1905*, pp.305-317, 327-330.

② Ibid, pp.38-45.

③ Ibid, pp.351-354, 357.

④ Terence Emmons, Wayne S. Vucinic, eds., *The Zemstvo in Russia: An Experiment in Local Self-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伯塔·曼宁和托马斯·法洛斯二位学者提交的论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俄国地方自治局与中央政权和国家官僚的关系。

曼宁将改革后俄国地方自治局与中央政权关系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1864至1905年、1905至1907年和1907至1914年，^①并以1905年后地方自治局温和力量（少数派）和左翼力量（多数派）斗争的开始为第二阶段的起点。曼宁认为，在第一阶段，俄国地方自治局的活动以请愿为主，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选派代表参加政府的立法工作或呼吁政府对地方灾情引起重视，以不改变俄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前提。曼宁将这一时期请愿的出现归因于地方自治局内争取政治权利的领地贵族，依据是他们在地方自治局内居于主导地位并且改革后经济水平和政治地位下降。^②曼宁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苏联学者和西方学者有关俄国地方自治局自由主义运动性质的论断，一系列研究已经表明俄国地方自治局并未完全代表俄国农民阶层的利益。^③但是，在解释地方自治局内领地贵族提出立宪要求的成因时，其有关改革后领地贵族经济水平的论断无法让人完全信服。同一时期，曼宁描绘了改革后俄国贵族经济水平和政治影响力下降、专注于地方事务的图景。她认为，农民改革和1876至1896年谷物价格的下降，对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造成很大冲击；贵族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举动是贵族重新参与国家事务的敲门砖，希望借此恢复对农民的控制权。^④西摩·贝克尔质疑了曼宁的观点，认为改革后俄国贵族地位下降的程度被夸大了，实际上，贵族已经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在国家官僚队伍中贵族数量增加，贵族在地方事务中仍居于主导地位。^⑤盖瑞·汉伯格和托马斯·法洛斯解释了二位学者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俄国贵族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学者应该考虑贵族的地区、文化、收入和

① Roberta T. Manning, "The Zemstvo and Politics, 1864-1914", in Terence Emmons, Wayne S. Vucinic, eds., *The Zemstvo in Russia: An Experiment in Local Self-government*, pp.133-168.

② Roberta T. Manning, "The Zemstvo and Politics, 1864-1914", pp.135-145.

③ Kermit E. McKenzie, "Zemstvo Organization and Role within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in Terence Emmons, Wayne S. Vucinic, eds., *The Zemstvo in Russia: An Experiment in Local Self-government*, pp.79-125.

④ Roberta T. Manning,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in Russia: Gentry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64.

⑤ Seymour Becker, *Nobility and Privileg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27.

职业差异，并从利益集团的角度重新研究贵族的经济和政治活动。^①

在研究国家政权与地方自治局的关系时，法洛斯建议将国家政权分为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两个部分。法洛斯认为，地方自治局与省长在多数情况下能和谐共处，只是偶尔存在分歧并尊重参议院的裁定结果。法洛斯以 1890 至 1914 年参议院收到的来自地方的 738 封请愿书为依据并将其分类，发现这些请愿书的内容主要是地方自治局指责省长和地方社会指责地方自治局，60%涉及地方自治局税收、公共事务和地方预算问题。^②与此同时，法洛斯还发现内务部和财政部努力控制地方自治局的政治和财政的意图，^③并指出了这些举动产生的两方面影响：第一，内务部和财政部控制力度的加强激起了地方自治局的反抗情绪，使地方自治局在 1905 年前后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第二，内务部和财政部之间的竞争关系，在地方自治局问题上得到了体现。^④值得注意的是，法洛斯取得了三点理论上的创新：第一，在研究国家政权与地方自治局的关系时，结合了“国家论”与“社会论”，强调地方自治局的双重性质；第二，在研究地方自治局参与俄国立宪运动的原因时，以各部斗争和革命形势代替政府行动能力虚弱和贵族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传统阐释；第三，在研究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关系时，强调中央部门分歧对地方政权和地方社会造成的影响，对此前乔治·亚尼提出的“地方政权斗争削弱中央政权实力”的“系统化”理论进行了补充。^⑤

苏联解体后，西方学界继续掀起了有关俄国地方自治问题的讨论。^⑥西方学者认为，革命前俄国的某些历史特征不仅延续到苏联时期，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依然得以保留，其中包括地方自治程度低、官僚腐败等难题。因此，

① Gary M. Hamburg, *Politics of the Russian Nobility, 1881-190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 Thomas Fallows, “Review”, *The Russian Review*, 1988, Vol.47, No.3, p.341.

② Thomas Fallows, “The Zemstvo and the Bureaucracy, 1890-1904”, in Terence Emmons, Wayne S. Vucinic, eds., *The Zemstvo in Russia: An Experiment in Local Self-government*, pp.180-214.

③ Ibid, pp.214-226.

④ Ibid, pp.214, 216, 227-228.

⑤ George L. Yaney, *The Systematization of Russian Government: Social Evolution in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Russia, 1711-1905*.

⑥ Alfred B. Evans, Vladimir Gel'man, eds., *The Politic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ussia*,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俄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与地方自治局的关系重新被西方学者提起。托马斯·皮尔森在乔治·亚尼和托马斯·法洛斯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 1861 至 1905 年俄国内务部和财政部之间的冲突及其对地方自治局的影响。^①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皮尔森便总结了 1861 至 1900 年间俄国政府进行地方自治改革的若干尝试，并试图分析 19 世纪 80 年代末俄国在地方自治领域实行“反改革”的原因和当时俄国政权的性质。^②皮尔森认为，“反改革”的实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大改革”后俄国政府因自身虚弱和官僚意见的分歧而一直没能有效地控制农村社会，^③并将洛利斯—梅里柯夫和卡恰诺夫委员会两种改革方案视为俄国政府积极调节中央政权与地方自治局关系的重要表现。其中，卡恰诺夫委员会的成立、方案的提出和讨论过程、委员会的解散，反映出俄国不同政府部门（内务部、司法部、教育部等）、贵族和委员会成员的不同利益。^④在论文集《俄国地方政府的政治活动》（2004）中，皮尔森以其早期作品的部分内容为基础，^⑤简要梳理了瓦鲁耶夫与赖藤、托尔斯泰与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戈列梅金与维特（分别担任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的争论，证实了内务部试图使地方自治局官僚化和财政部努力平衡国家预算的意图和举动。^⑥皮尔森结合了乔治·亚尼和托马斯·法洛斯的理论和观点，认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些争论和冲突削弱了沙皇个人的影响力和中央政权的凝聚力，破坏了俄国地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地方自治局的模糊地位和农民的税收负担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为 1905 年革命埋下了

① Thomas S. Pearson, “Minister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s of Zemstvo Reform, 1864-1905”, in Alfred B. Evans, Vladimir Gel'man, eds., *The Politic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ussia*, pp.45-67.

② Thomas S. Pearson, *Russian Officialdom in Crisis: Autocracy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 1861-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ix.

③ Ibid, pp.62-102.

④ Ibid, pp.121-153.实际上，卡恰诺夫委员会成员支持在上至各省下至各村范围内设立地方自治局，以实现全民参与，而各部门代表和贵族为了各自利益分别推崇由国家或贵族作为地方自治局的主导力量。

⑤ Ibid, pp. 164-244.

⑥ Thomas S. Pearson, “Minister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s of Zemstvo Reform, 1864-1905”, in Alfred B. Evans, Vladimir Gel'man, eds., *The Politic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ussia*, pp.47-57.

隐患。^①

苏联解体前后，弗朗西斯·维斯勒从俄国中央政权数次改革地方自治机构的努力和结局入手，试图分析沙皇政权覆灭的原因。^②维斯勒将俄国官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建立“法治国家”为目标的新型官僚，另一种是以建立“警察国家”为目标的传统官僚。^③维斯勒对洛利斯—梅里柯夫和卡恰诺夫委员会的方案赞赏有加，认为它们继承了“大改革”时代的精神，本有可能促使俄国逐步走向公民社会并迎来法治国家。^④维斯勒还总结了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失败的两大原因：一方面，以建立新的农村公共秩序为目标的公民文化与以维护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为原则的政治文化存在冲突；另一方面，改革者面临着传统官僚和贵族地主的双重挑战。^⑤维斯勒在“官僚制”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并将文化史引入政治史研究当中，用于分析俄国官僚的心态和行为，丰富了俄国史研究的手段。但是，维斯勒从传统政治史的视角研究俄国官僚史和政策史，这种“上层政治”研究忽视了地方农民管理机构在农村的具体表现，并未展现出作者反复提及的“互动”关系；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官僚阵营的做法，又忽视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兼顾中央政权与地方自治局的冲突与合作、中央机构的部门利益和国家官僚的价值观念，或许能更好地分析俄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总之，这些成果均从“上层政治”的研究视角出发，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考察中央政权改革地方社会的尝试及其失败的原因，揭示了俄国国家上层的统治政策、中央各部的利益冲突和高级官僚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19世纪90年代俄国政府在地方自治领域实行“反改革”的原因，并得出了俄国政治发展进程不符合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的结

① Thomas S. Pearson, “Minister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s of Zemstvo Reform, 1864-1905”, pp.57-58.

② Francis William Wcislo, *Reforming Rural Russia: State, Local Socie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1855-1914*, 1990.

③ *Ibid*, pp.xiii-xv.

④ *Ibid* pp.46-81.

⑤ *Ibid*, pp.305-308.

论。^①然而，这些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自上而下”研究方法的采用，忽视了地方农民管理机构在农村的具体表现和农民与国家的交往和互动。随着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盛行，以提奥多·沙宁、简·伯班克、斯蒂芬·弗兰克、凯茜·弗赖尔森、科琳·高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农村社会和农民文化的视角出发，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继续考察俄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探讨农民在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俄国精英阶层脑海中的农民形象和俄国农民的“真实”形象，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存在于传统政治史研究框架下的这一弊端。

五、超越“俄国官僚史研究”本身

冷战开始后，随着现代化理论和“1917年范式”的盛行，西方学界有关19世纪俄国官僚史的研究逐渐兴起。在现代化理论的阐释模式下，国家和国家机构是社会变革和工业化启动的主要动力；在“1917年范式”下，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是俄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西方学界有关俄国官僚史研究的繁荣，与理论和现实双重因素密不可分，既得益于西方俄国史研究领域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又体现出冷战期间西方学界有关“俄国与西方”的比较研究模式和美苏两国的文化交往。

苏联解体后，西方学界有关俄国官僚史的研究逐渐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方面，“1917年范式”和现代化理论面临挑战。苏联解体后，1917年革命不再被视为俄国历史的重要分界点，俄国也不再是注定灭亡和失败的“邪恶帝国”（Evil Empire）^②，有关“旧政权的危机”和“1917年革命的必然性”的讨论逐渐降温，西方学者甚至开始探讨1917年以前俄国的历史经验和1991年以后俄国的现实情况二者之间的联系，尤为

①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曾经指出，俄国的“官僚制”与韦伯提出的“官僚制”是两个概念，使用时需要加以区别。实际上，只要明确俄国实际情况与“官僚制”理论不符即可。相关争议可参见 Daniel T. Orlovsky, “Recent Studies on the Russian Bureaucracy”, *The Russian Review*, 1976, Vol.35, No.4, pp.452-455.

②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Has Post-Modernism Come to Russia? Comments on the Anthology ‘American Russian Studie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2003, Vol.4, No.1, p.213.

关注俄国司法和地方自治问题。^①而在现代化理论的阐释模式下，西方学者起初将俄国“赶超式”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尤其是欧洲的经验 and 模式加以比较，用以证明俄国历史发展的落后性和独特性。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史蒂文·霍克便将连环保制度、带状种植方式、土地定期重分制度等风险规避（risk-avoiding）现象视为俄国和欧洲村社内部机制的共同点，^②从而将有关俄国的农民学研究置于全球史视野之下。冷战结束后，“俄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最终遭到冷落，迈克尔·康菲诺、瓦莱丽·基弗森、简·伯班克等西方学者纷纷建议，应将俄国历史看作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注意比较俄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异同。^③另一方面，“新政治史”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俄国史研究格局。“新政治史”又称“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以“民族与国家”代替“国家与社会”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④吸收了“新文化史”的部分理论，旨在研究帝俄内部不同民族（俄罗斯族与非俄罗斯族）彼此的印象和相互的交往以及各个民族的自我认识和身份认同，^⑤与“旧帝国史”关注俄国对外扩张史和上层政治史的研究模式迥然不同。冷战期间以“自上而下”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和以“自下而上”为特征的社会史研究，在苏联解体后始终不敌以“边缘和内部”为特征且在当今西方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政治史”研究。^⑥结果，以“国家

① Peter H. Solomon, ed., *Reforming Justice in Russia, 1864-1994: Power, Culture and the Limits of Legal Order*, Armonk: M.E. Sharp, 1997; Alfred B. Evans, Vladimir Gel'man, eds., *The Politic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ussia*,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② Steven L Hoch, *Serfdom and Social Control in Russia: Petrovskoe, a Village in Tambov*,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③ Jane Burbank, “Revisioning Imperial Russia”, *Slavic Review*, 1993, Vol.52, No.3, pp.556-558;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Has Post-Modernism Come to Russia? Comments on the Anthology ‘American Russian Studie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2003, Vol.4, No.1, pp.213-214, 223.

④ 例如 Theodore R. Weeks, *Nation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Nationalism and Russific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1863-1914*,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Michael David-Fox, Peter Holquist, Marshall Poe, “Some Paradoxes of the ‘New Imperial History’”,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2000, Vol.1, No.4, pp.623-624.

⑥ 苏联解体后，俄国学者同样在“新帝国史”的研究范式下考察了俄国历史上的国家与民族问题，相关研究进展参见 Marina Mogilner, “New Imperial History: Post-Soviet Historiography in Search of a New Paradigm for the History of Empire and Nationalism”, *Revue d'études Comparatives Est-Ouest*, 2014, Vol.45, No.2, pp.25-67.

与社会”为核心内容的“直上直下”式俄国政治史研究逐渐走向衰落。

研究理论是一把双刃剑，在丰富俄国官僚史研究手段的同时，也限制了某些研究的深入。尽管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缺陷，但是他们对其他学科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理论的吸收和结合、对俄国政治史研究体系的思考和构建，仍对目前中国的俄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俄国学者是俄国史研究过程中的局内人（insider），而同为俄国史研究过程中的局外人（outsider），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在俄国政治史研究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中国传统史学本以政治史为中心，善于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总结历代政治得失。然而，在研究俄国政治史时，中国学者并未很好地延续这一治史传统。中国学者往往停留在政策和制度本身的沿革，对政策和制度的成因、运作、局限和影响的思考尚显不足，加上在构建理论框架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制约了俄国政治史研究的深度；改革开放至今已近四十年，但中国学者仍以现代化理论和传统政治史研究方法为主导，尚未充分利用社会学、新社会史、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等研究方法，制约了俄国政治史研究的广度。中国学者有关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至斯托雷平改革期间俄国政治史研究的薄弱，制约了有关 1905 年革命、斯托雷平改革乃至帝俄最后几十年政治史的研究水平，面临着割裂俄国和苏联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可能。

考虑到中国学界的治史传统和研究现状，未来中国学者最有可能在以下四个问题的研究中取得突破：第一，俄国社会尤其是农民阶层是否具有法治和理性传统；第二，在俄国君主专制政体之下，能否实现建立现代官僚制国家的目标；第三，“大改革”设计者规划的法治和理性蓝图是否与俄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情况相符；第四，如果改革方案与实际情况不符，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传统划分标准。总之，衷心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多研究些问题”，^①构建真正的中国特色俄国史研究体系，切实推动中国俄国史学科的发展。

① 此处引自 1918 年 7 月 20 日《新青年》每周评论栏目刊载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标题，无关胡适与李大钊之争，仅就其字面意义引而用之，借此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更新俄国史研究的理论、丰富俄国史研究的手段、扩大俄国史研究的范围。

【Abs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Western studies on 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19th century is a microcosm of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changes of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since the Cold War. In the wake of the Cold War, political needs aroused increasing interest among western scholar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Studies and Russian history-related issues. From the 1960s till the 1990s, based on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1917 Paradigm”, combining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ies, Western scholars created a theoretical system concerning Russian political history studies. They shed light on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civil service system in the 19th century, affirm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enlightened bureaucrats” during Russian modernization, analyzed factional and ministerial conflicts within the Tsarist bureaucracy, in addition to exploring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since the reform.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1917 Paradigm” were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al History” has altered traditional research pattern of Western studies in Russian History.

【Key Words】 “Great Reforms” in Russia, Russian State and Society, Russian Bureaucracy, Russian Historiography

【Аннотац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западными учёными роста и пад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бюрократии в XIX веке — это микрокосм развития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со времё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вызвала растущий интерес западных учёных к современным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проблемам в России. С 1960-х по 1990-е годы западные учёные опирались на теорию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модель 1917 года», абсорбировав теорию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методы истории, создал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ыявили внутреннюю эволюц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XIX века,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важную роль, которую «просвещённые бюрократы» играли в процесс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ли фракционную борьбу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бюрократами и конфликты интересов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ведомствами, рассмотрел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обществом после реформ.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еори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модель 1917 года» стали оспариватьс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н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зменило традицион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еликая реформа» в Росс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ая бюрократ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

论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形成、发展与终结*

张玉艳 杨恕**

【内容提要】19世纪中后期，俄国出现了以梅尔加尼、纳吉利和费兹汉尼等为代表的突厥语民族改革家，他们推动了俄国突厥穆斯林的民族自觉意识。在此背景下，迦斯普林斯基形成了自己对俄国突厥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教育等新思想，并成为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导人。扎吉德运动和全俄穆斯林大会，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两个主要载体，但二者之间相对独立。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结束后，由于帝俄政府采取限制性政策，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走向终结。

【关键词】俄国突厥穆斯林 全俄穆斯林大会 俄国民族问题 扎吉德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1-0159(22)

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社会状况的学术成果中，国内外学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泛突厥主义”，而且经常把它归入“社会运动”的范畴。所谓“社会运动”，是指一种促成或阻止社会变迁的集体努力，是有组织的一群人，有意识、有计划地改变或重建社会秩序或文化的一种功能，

* 本文受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泛突厥主义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17LZUJBWZY003）。

** 张玉艳，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博士，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涉及一般的社会关系、群众共同思想以及集体行为等问题。^①泛突厥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末俄国鞑靼族知识分子当中，但将其广泛传播的则是奥斯曼土耳其，至少在俄国和后来的苏联，泛突厥主义从未达到社会运动的程度。这便是本文使用“突厥穆斯林运动”而不使用“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原因。当然，在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泛突厥主义的作用。

一、引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穆斯林问题，一直是俄国官方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基本原因在于穆斯林群体在俄国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1897 年全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穆斯林是帝俄仅次于东正教信仰群体的第二大群体，有约 1400 万人。到 1917 年，俄国境内的穆斯林增长至 2000 万人。俄国大部分穆斯林属伊斯兰教逊尼派，仅在今阿塞拜疆境内什叶派占多数。在俄欧洲部分，穆斯林约占当地居民总数的 4%，主要分布在乌法省、喀山省、奥伦堡省、阿斯特拉罕省、萨马拉省。在俄西部和西伯利亚，穆斯林人数很少，但在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占当地居民的 1/3，在中亚地区则超过了 90%。^②现在，穆斯林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宗教群体（2010 年人口普查为 1500 万），而且由于穆斯林移民的到来、穆斯林较高的出生率以及俄部分民众改信伊斯兰教，俄罗斯穆斯林人数增长较快，有资料称，已超过 2100 万人。^③也就是说，国土面积的缩小（苏联解体造成）并没有降低穆斯林群体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当前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重视俄国穆斯林社会的一个基本考虑，其中就包括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的重新解读。

从研究历程来看，俄国官方和学术界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的关注，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立场。在 1860-70 年代的农

① 李天任、蔡顺慈：《中华百科全书》（典藏版），1983 年，<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2257>

② Арапов Д.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описания, статистика). М.: 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 Академкнига, 2001. С.27.

③ Сколько мусульман в России проживает? 10-06-2015. <http://fb.ru/article/189076/skolko-musulman-v-rossii-projivaet>

奴制改革中，俄国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穆斯林民族精英参与政治议程的权利受到更多限制，不仅代表名额被大大减少，而且代表的选举也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监督；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俄国穆斯林当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鞑靼族当中，这也推动了知识精英走向成熟。当时，鞑靼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下诺夫哥罗德）和两个知识分子中心（喀山和卡尔加拉），它们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使俄国穆斯林迫切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这种情况与当时兴起的“穆斯林东方的觉醒”以及愈发紧张的国际局势，都使帝俄政府更加重视其境内的穆斯林问题，彼时出现的各种相关的官方调查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①当时的学术研究比较薄弱，研究力量以鞑靼族知识精英为主，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从侧重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到逐渐侧重共同的民族身份（所谓的“突厥人”）的变化，但整体上还处于启蒙阶段。

苏联时期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和为政策服务的政治目的。这一时期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进行了民族识别划界和打击反苏的穆斯林武装力量，当时官方主导下的学术研究目的，是要逐渐弱化穆斯林的宗教身份认同。为此，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进行的研究就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是更多地强调俄国穆斯林历史上形成的区域和民族差异性及其影响；^②二是1930-80年代，特别是二战和冷战时期，由于伊斯兰世界处于不

① 相关内容可参考 Хасаншин Г.Р. Проблема «татаризации» не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Волго-Ур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 материалах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м делам 1914 г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2014. №.4.С.217-227; Арапов Д.Ю. Русский посол в Турции Н.В. Чарыков и его «заклочение» по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1911г.//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и. 2002. №.2. С.48-164; Гусева Ю.Н.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тюрко-татар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отражение е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ОГПУ (1922-1923 гг.)// Известия Уфим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РАН. 2013. №.1. С.86-92;等。

②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 Касымов Г. Очерки по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и анти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движению среди татар до и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Казань, 1932; Тарджемани К. Предыдущее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наш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слам маджалласы. 1925. №.5-6. С.194-204; Шигабдинов Р. Улама и реформы 1920-х годов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Pax Islamica. 2009. №.1(2). С.60-67; Набиев Р.А., Хабутдинов А.Ю.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20-1940-х гг. Ислам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Среднем Поволжье. Казань, 2002;等。

同的对立阵营当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包括苏联穆斯林在内的广大穆斯林群体中非常激烈。特别是土耳其和一些西方国家，曾多次利用泛突厥主义思想拉拢苏联的穆斯林，因此，不少学术研究开始从历史角度批判俄国穆斯林、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思想。例如，在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下，А·阿尔沙鲁尼和Х·加比杜林在 1931 年出版的专著《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概论》中，就把泛突厥主义描述为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①上述两个出发点具有相同的立场，即否定俄国穆斯林群体的整体性和历史作用，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应该指出的是，苏联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考虑，对泛突厥主义进行批判，有其合理性；但以此全盘否定俄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作用，显然是不合理的。对分裂主义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与生活在分裂地区的普通民众进行差异化对待，是非常重要的。

苏联解体后，新一轮的研究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近年来，以鞑靼族知识精英为主的一批突厥穆斯林人士，开始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不仅强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整体的爱国意识，而且大有要为迦斯普林斯基、（泛）突厥主义、扎吉德运动、全俄穆斯林大会等正名的态势。^②如鞑靼斯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明基梅尔·沙伊米耶夫（Минтимер Шаймиев）认为，“19 世纪出现在鞑靼人当中的改革派扎吉德提倡革新伊斯兰教并对俄罗斯和西方文化开放，因此，俄国的伊斯兰教才变得更加世俗，

① Аршаруни А., Габидуллин Х.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р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М.: Безбожник, 1931. С.47.

②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Гилязов И.А. Германская Служба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Востоку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ечат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сред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15. №.2(44). С.103-115; Iskander Gilyazov I., “‘Foreign People’ in the Perception of German Scientist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Muslims of Russia as an Object of Study”, *Terra Sebus*, 2016, №.8, pp.335-344; Матвее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й кавказ: от прошлого к настоящему».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2014. С.79-95; Сатушиева Л.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статуса мусульм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13. №.1. С.39- 43; Арапов Д.Ю.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восток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В. Фрунзе// Исла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2016. №.3(12). С.127-138; Гусева Ю.Н. Борьба за женщину: татарка-мусульманка в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практиках средневожских исламских общин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 Женщин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2012. №.4. С.72-78;等。

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更加包容。”^①近年来，他们每年都会举行一些与这些内容有关的活动。如，2005年11月在下诺夫哥罗德市举办了纪念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100周年研讨会，2006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则一直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场突厥穆斯林运动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它视为现今俄联邦突厥语共和国民族分裂主义的源头。究其原因，就在于泛突厥主义产生于这场运动，并屡次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统一构成威胁。这也是俄政府对任何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思想和行为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所在。在这个问题上，莫斯科金融法律大学政治学家А.Б·季科夫（Диков А.Б.）认为，这场运动为俄联邦几个主要的突厥语共和国（鞑靼斯坦、巴什基尔斯坦、萨哈/雅库特/）的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上升提供了重要基础。他指出，通过这场运动，帝俄时期的突厥穆斯林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虽然起初这种认同没有对帝俄的国家统一构成巨大威胁，但在政治化后的泛突厥主义的长期宣传之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2000年代俄罗斯中央化进程的不完善以及突厥语共和国地区政治家忠诚度不高，民族分裂主义在这些共和国境内得到发展；俄联邦法取消这些共和国的地区总统任期制和2016年7月通过的一套全新的反恐法，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共和国境内潜在的泛突厥主义和主权化支持者。^②俄罗斯学术界呈现出这种状况，不仅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和立场不同。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国际局势、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和主要突厥语民族的发展，俄罗斯学术界势必会做出更多的回应，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分歧，其中就包括如何评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

① Минтимер Шаймиев. У России нет «третьего пути»// Республика Татарстан. 2002. №. 46-47(24602).

② Диков А.Б.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 и институты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тюрк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ах Росс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6. №.4. С.101-112.

二、俄国突厥穆斯林的觉醒

在俄国穆斯林社会中，操突厥语的民族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一共同的身份并未被特别强调，而是默默地存在着。到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突厥学研究的兴起，特别是受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1839-1876年）的影响，俄国穆斯林精英在越来越感受到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压力的同时，开始尝试从突厥语民族身份中寻找出路。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代对俄国喀山鞑靼人的重要影响。因为他们而言，坦齐马特改革不仅是一场效仿西方的伊斯兰近代改革运动，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宗教的基础^①，更为重要的是，它恢复了奥斯曼自由主义者与喀山鞑靼族改革家之间的传统关系和联系，尤其是在教育领域。^②鉴于此，阿雅斯·伊沙基（Ayas Ishaky, 1878-1954年，鞑靼民族运动家、作家、政论家）在描述当时突厥语世界出现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加强时，非常直白地说：“在反抗守旧落后的传统中，鞑靼进步人士从奥斯曼土耳其的改革中找到了精神支持”。^③但是，与在行政、财政、司法、教育等社会各领域进行改革的坦齐马特改革不同，由于俄国社会条件和鞑靼人自身力量的限制，鞑靼改革家们关注的重点是宗教、教育和历史问题，并对突厥民族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影响力较大的改革家有希哈别金·梅尔加尼、凯尤姆·纳吉利、胡赛因·费兹汉尼等。

神学家、历史学家希哈别金·梅尔加尼（Сихабеддин Мергани或 Шигабутдин Марджани，1818-1889），是当时在俄国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家。喀山鞑靼人梅尔加尼，20岁之前一直在其父亲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学习，之后到中亚的两大宗教中心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求学。求学中亚期间，梅尔加尼开始反对当地阿訇的教条式教学，并积极参与神学问题争论，提出

① 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②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Алматы: Санат, 2006. С.154.

③ Ayas Ishaky, *Idel-Ural*, Paris: Wschod, 1933, p.30.

了神学与宗教分离和回归原始伊斯兰教两大目标^①，这对他后来提倡的伊斯兰改革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梅尔加尼的主要贡献，是努力使伊斯兰教在突厥人的生活中摆脱国家（集权化）的控制，认为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方式。此外，梅尔加尼最早提出了伊斯兰教可以与西方共存的观点，呼吁恢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整体而言，梅尔加尼学说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以下六大原则：（1）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找出古兰经里提出的宗教问题的答案；（2）应该从小学开始教授古兰经、哈底斯（即《圣训》）和伊斯兰教历史；（3）必须回归伊斯兰教的本源；（4）应该停止盲目服从；（5）应该清除中小学里形式主义的、中世纪的教学大纲；（6）欧洲知识和使用俄语教学不应与穆斯林教育相冲突。^②梅尔加尼的思想在怀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喀山鞑靼人上层当中影响很大，特别是鞑靼商人。由于鞑靼商人的足迹在 19 世纪下半叶已遍布俄国全境，因此梅尔加尼的思想逐渐传播到了俄国东部、哈萨克草原、突厥斯坦等地。事实上，梅尔加尼是第一个反对形式主义的宗教仪式和禁锢妇女的人，也是第一个研究鞑靼突厥母语的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的鞑靼人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民族复兴运动。

凯尤姆·纳吉利（Кайюм Назири或Абдул Кейюм Назири，1825–1902 年）的思想，比梅尔加尼更进一步。纳吉利是一位接受过伊斯兰宗教学校教育的现代主义者、教育家、改革家和作家，曾在俄国东正教神学院教授鞑靼语，后在喀山师范学校附属鞑靼小学任教，^③1871 年在喀山办学。在鞑靼民族复兴运动中，纳吉利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要保存并弘扬喀山鞑靼人的文学遗产。为此，他搜集了大量喀山鞑靼人的文学作品并汇编成了两本百科全书。第二，纳吉利在绘制鞑靼人日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帝俄政府禁止出版鞑靼语报刊后，纳吉利成为第一个用日历方式将他所收集的民族文学形象融合到大众印刷品中的人。利用这种宣传方式，纳吉利增

① Lazzarini Edward J., “Ġadid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view from withi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975, №2.

②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2-153.

③ Ауанасова А.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деи тюркизм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ред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естник Западн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 №.1.

强了喀山鞑靼人的民族自豪感，这也是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最后，纳吉利使用掺有奥斯曼语和察合台方言的喀山-鞑靼突厥语进行写作。他努力完善这一语言，使其成为标准语，使普通大众都能明白和使用这种语言。^①此外，他还撰写了两本最早的鞑靼民族语言教材《鞑靼语音词典》和《语法教科书》，^②因此被誉为鞑靼标准语的奠基人。

第三位著名的改革家是胡赛因·费兹汉尼（Хусейн Фейзхани或Хусаин Фаизханов，1826–1866年）。费兹汉尼接受的是欧洲式的东方学教育，因此他宣扬鞑靼文化的西方化和教育体系、教学大纲的完全现代化^③，企图借助的力量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④例如，在《宗教学校改革》（Islah-i-medaris）一书中，费兹汉尼认为，应该在喀山开办按照欧洲模式教授伊斯兰教、俄语和世俗课程的高级学校。但是，在梅尔加尼看来，费兹汉尼的教育改革方式过于冒险，具有为俄罗斯化广开通道的危险。^⑤尽管如此，19世纪90年代，费兹汉尼的支持者们还是在奥伦堡、喀山、乌法、托木斯克、维亚特卡省等地的伊斯兰宗教学校里，进行了教育改革实践，只是这些实践迅速融入了扎吉德运动的洪流之中。

努力追溯“伟大的过去”，也是鞑靼改革家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不仅宣扬伏尔加布加尔王国和喀山汗国的辉煌，而且还探讨蒙古帝国、金帐汗国、卡西姆王国、奥斯曼帝国对本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力图构建统一的突厥-鞑靼史，并逐渐形成了关于民族统一的历史根源和标准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历史根源和宗教构成了鞑靼人的统一。梅尔加尼在发出“鞑靼主义”的先声后，也把这一思想宗旨纳入了全突厥、全穆斯林的概念轨道上。这样，穆斯林突厥-鞑靼认同的观念，在这一时期鞑靼人的学术作品中就牢

①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4.

② Ауанасова А.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деи тюркизм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ред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③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4.

④ Ауанасова А.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деи тюркизм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ред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⑤ Mende G.v.,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n Frage in der Sowjetunion*,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36. S.45.

固地确立起来了。例如，Г.Ф.·费兹汉诺夫（Г.Ф. Фаизханов，1850–1910 年，伏尔加河鞑靼穆斯林活动家）曾写道：“今天，生活在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坦波夫、奔萨、辛比尔斯克、萨马拉、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奥伦堡、乌法、彼尔姆、维亚特卡的所有的穆斯林，和生活在克里米亚、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的所有穆斯林，以及撒马尔罕、希瓦、浩罕、塔什干、突厥斯坦的当地民众，和高加索的一半穆斯林——上述所有人都来自同一血源、同一部落，是同一个突厥祖先的子孙”。^①这种观点虽然根据不足，但却为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俄国突厥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是伴随着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宗教自决的兴起而出现的。在初始阶段，俄国突厥鞑靼社会改革运动的特点，是限于学校领域内的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实现教学方式和内容的现代化，拒绝并清除其中的经院式的和纯宗教的原则。^②这种改革虽然也得到了某些开明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和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支持，但他们更加倾向于依靠新兴的突厥穆斯林资产阶级。完善教育体系和教育现代化，成为团结突厥鞑靼资产阶级的口号。尽管梅尔加尼、纳吉利、费兹汉尼等人在推进全俄突厥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还不是经验丰富的革新者，不是能把斗争目标坚持到底的组织者，因此他们不可能谋求领导地位。而且，当时俄国突厥穆斯林的觉醒尚处于内部对话和争论中，统一的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条件还不够成熟。

三、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形成

19 世纪末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形成的标志，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梅尔·迦斯普林斯基（Исмаил Гаспринский，1851–1914）成为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真正领导者。

① Гафаров А.А., Галеева М.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татарско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й мысл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2. №.6. С.644.

②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5.

在法国的留学经历、社会交往活动、与泛伊斯兰主义创始人哲马路丁·阿富汗尼的交往等，使迦斯普林斯基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强烈的世界竞争意识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①与此同时，在与梅尔加尼、纳吉利等改革家的对话、博弈当中，迦斯普林斯基也获得了很多启发，特别是在宗教和教育问题上。整体而言，迦斯普林斯基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远离政治到参与政治斗争。迦斯普林斯基对帝俄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起初，他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亲俄、亲政府性。例如，在俄国征服突厥斯坦前夕，迦斯普林斯基认为帝俄政府征服突厥斯坦完全合法，俄国应该吞并这个地区，因为俄国是鞑靼统治的继承者。他认为，在俄国，“突厥鞑靼部落的各个分支被塑造成其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状况使他预言，“俄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保留“伟大的基督教强国”的地位。^②在他看来，俄国穆斯林的状况，要比西方列强的穆斯林殖民地好得多。后来，迦斯普林斯基开始批评帝俄政府对穆斯林民族的政策，认为帝俄政府并未深入认识到穆斯林的教育发展和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问题。与此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反俄倾向明显的政治活动会受到最严厉的限制。^③因此，为了让受众听到自己的言论，迦斯普林斯基不仅借助寓言题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坚持避免谈及政治的原则。但当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日渐高涨，迫切需要政治组织的引导，迦斯普林斯基顺势参与了全俄穆斯林联盟，并在其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

2、突厥穆斯林民族复兴与伊斯兰教的统一。迦斯普林斯基认为，伊斯兰教是突厥鞑靼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与梅尔加尼的观点很相似。在他看来，很难说在突厥鞑靼人中存在的民族性和宗教性中，哪一个更重要。一方面，迦斯普林斯基在抵制俄罗斯化中看到了民族存在的前提条件，为此必须使突厥鞑靼人的教育和生活西方化；另一方面，他明白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是未

① 张来仪：“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

② Матвее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й аспект)// Известия СОИГСИ. 2015. №.15 (54). С.25-35.

③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9.

来的唯一出路。伊斯兰的发展趋势与民族的发展趋势混合在一起，只有在民族感形成后，两者之间的区别才会显现出来，而宗教统一也从未被遗忘过，因为伊斯兰教是突厥语民族最强大的武器和最重要的特点。^①也就是说，突厥穆斯林民族复兴，既需要伊斯兰教力量的推动，也需要通过与伊斯兰教的差异来彰显。

3、以文化目标为主的泛突厥主义思想。泛突厥主义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主要副产品，同时也是迦斯普林斯基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接受了泛斯拉夫思想，并将其同泛伊斯兰主义的一些要素结合，创造出了一种适合于尚未成熟的鞑靼知识分子需要的泛突厥主义思想。作为“泛突厥主义之父”，迦斯普林斯基用“语言、行为和思想的统一”来界定泛突厥主义的文化目标。在他看来，泛突厥主义的目标，是使俄国境内的突厥语诸民族实现联合，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构建统一的标准语和文化，之后组建政治组织来争取民族复兴。^②后来，他还认识到，从克里米亚到赫拉特、从君士坦丁堡到喀什噶尔的所有突厥人都支持的统一思想，是形成统一语言的基础。因此，迦斯普林斯基在统一思想和统一语言两个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在统一思想方面，迦斯普林斯基借助《译文报》和自己的著作，使泛突厥主义思想传播到广大突厥穆斯林地区。1883-1918年发行的《译文报》，是迦斯普林斯基表达思想的主要阵地，也是全俄突厥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国外读者的中央印刷品。通过《译文报》，喀山的任何一个突厥人都能知道其他突厥人的情况。与此同时，迦斯普林斯基不断进行文学创作，出版了多本著作。这些出版物的主题，以捍卫俄国突厥语民族的自由和文化发展权利为主。他宣扬俄国突厥语民族过去和现在历史、精神和文化的统一性，呼吁他们联合起来。^③在统一语言方面，迦斯普林斯基为突厥语民族创造了结合奥斯曼土耳其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共同语言”，并坚决拒绝在“共同语言”中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迦斯普林斯基创造这种“共同

① Mende G.v.,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n Frage in der Sowjetunion*, S.58-60.

② Аршаруни А., Габидуллин Х.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С.10.

③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7-158.

语言”，主要是为了出版《译文报》。可以说，《译文报》实现了“统一思想”和“统一语言”的结合。到1912年，《译文报》的订阅量达到5000份，读者主要分布在俄国、埃及、土耳其、伊朗等国，这也正是扎马勒金·瓦利多夫（Джамаледдин Валидов）称“这份小报的影响力要比《新时代报》甚至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力大上千倍”^①的原因。

4、以新教学法为指导的突厥穆斯林教育改革。迦斯普林斯基从自身经验出发，在借鉴梅尔加尼、费兹汉尼等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按照欧洲模式进行学校教育改革的目标。他认为必须在中小学对所有儿童实施义务教育，而且学校应该实现现代化，应该用新教学法取代旧教学法。^②为此，迦斯普林斯基编写了第一本使用新教学法的教材，于1884年1月在巴赫奇萨赖开设了第一所按照新教学法教学的实验学校，这是迦斯普林斯基对扎吉德运动的主要贡献之一。随后，俄国境内许多地区都开设了新教学法学校。正是在迦斯普林斯基的努力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学校开始用突厥语教授自然知识、历史、地理等课程，学生开始按年级分班，教室里出现了现代化的课程表、黑板、地图、杂志等教学工具。接受了迦斯普林斯基新教学法教育的学生，走向俄国各地并在那里开办新教学法学校，这使迦斯普林斯基在俄国突厥穆斯林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此外，迦斯普林斯基还提出了组织教育发展募捐机构、解放穆斯林妇女等口号，从而大大加强了突厥穆斯林教育改革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迦斯普林斯基对俄国突厥穆斯林民族自觉的思想贡献和实践推动，使他被称为“2000万~3000万突厥人的精神之父”^③，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扎吉德运动、全俄穆斯林大会等活动中的地位 and 作用，就是最好的例证。

① Гафаров А.А., Галеева М.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татарско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й мысл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С.644.

② “旧教学法”（усул-и кадим）的本质是，教学者认为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和其它宗教经典便足以获得知识，也就是说，用背诵记忆替代通过理解来掌握新知识。“新教学法”（усул-и джадид）则是基于阅读和学习的语言基础，来学习被排除在传统的穆斯林学校教学大纲之外的世俗课程。详见 Искандер Гилязов. Тюрк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основных этапов). Казань: Каза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С.15.

③ Хабутдинов А. Исмагил бей Гаспринский// Федерализм. 1999. №.1. С.209-211.

四、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发展与终结

认为扎吉德运动是泛突厥主义的主要载体^①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扎吉德运动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主要载体之一。因为扎吉德运动实际上始于梅尔加尼提出的俄国伊斯兰教改革思想，其主要支持者有纳吉利、费兹哈尼等人。迦斯普林斯基则向该运动提供了具体的方案，在他的领导下，运动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即在实践中首先发展人民大众的统一水平（развитие общего уровня народных масс）、实现教育现代化、统一语言、共同的文化进程。^②当然，扎吉德运动的某些内容与泛突厥主义的主张比较相似，甚至有的内容直接源于泛突厥主义，但并不能因此就将扎吉德运动完全视为泛突厥主义的表现。有观点认为，殖民政府和传教士指控扎吉德人士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实际上是扎吉德人士对实施了数个世纪的“分治”政策的被迫回应，具有自卫的性质。^③但是，笔者认为，扎吉德运动与泛突厥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之所以难以将它们分离，主要是因为迦斯普林斯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因此，应该把扎吉德运动放到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这一更大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在 19 世纪中后期俄国鞑靼人觉醒之前，俄国突厥穆斯林精神文化统一性的整合基础是穆斯林学校。而到了 20 世纪初，扎吉德运动成了他们进行族际整合的有效因素。该运动涉及包括宗教、文化、性别平等、非殖民化、国家建设等在内的很多重大问题。这一运动，以俄国突厥鞑靼人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主导，同时含有穆斯林统一的宗教因素和泛突厥主义的民族主义因素，后来还借鉴了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人的思想。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之前，该运动一直致力于消除俄国突厥鞑靼人的宗教和文化落后性。^④后来，

① 张来仪：“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世界民族》，2011 年第 2 期。

②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64.

③ Назира Нургазина. Народы Туркестана: проблемы ислам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и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Алматы: Қазақ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 2008. С.143.

④ Mende G.v.,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n Frage in der Sowjetunion*, S.57.

由于迦斯普林斯基引领了声势浩大的、以新教学法为指导的突厥穆斯林教育改革，扎吉德成员便在教育领域内进行了大张旗鼓地活动。据统计，到 20 世纪初，俄国境内已有 5000 多所突厥语民族学校使用迦斯普林斯基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它们都属于扎吉德学校。^①在扎吉德成员看来，通过新教学法培养起来的、以民主观点和宽容性为特征的“新型穆斯林”，是唯一一股能够阻止穆斯林社会内部的敌对和非一体化，即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苏菲派和萨拉菲派等的力量。^②与此同时，扎吉德运动有了更多的政治表达。例如，在突厥斯坦，扎吉德成员声称支持行政机构改革，要求更改 19 世纪 60 至 80 年代通行的法规，停止从俄国欧洲部分向突厥斯坦移民，减少对居民的征税等。但是，扎吉德运动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未能将各种不同的倾向和政治取向联合起来，而是充斥着诸如穆斯林改革学说、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甚至清教徒思想等多种因素，^③如同一盘散沙，从而日益分裂，并随着迦斯普林斯基的去世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扎吉德运动的推动下，俄国主要突厥穆斯林民族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维吾尔人的穆斯林运动及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之间的合作也得到了加强，这在突厥穆斯林民族的文化复兴和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05 年俄国革命以后，突厥穆斯林运动在俄国进入了政治繁荣期，只是这一时期持续的时间较短。1904 年 2 月 8 日开始的日俄战争，激励了整个突厥语世界，尤其是在突厥鞑靼人的主要居住区喀山。在突厥鞑靼人看来，日本的胜利、俄国的精神和政治挫败，给了他们解决自身问题的机会。例如，日俄战争期间，他们成立了非法的政党“自由党”（Hurriyet）。该党宣扬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吸引了大量突厥鞑靼族知识分子。^④正是俄国的战败

① Хайруллин М.А. Этнопедагогика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иев: Науковий світ, 2002. С.116.

② Назира Нуртазина. Народы Туркестана: Проблемы Ислам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и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С.143.

③ Абашин С.Л., Арапов Д. Ю и др.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8. С.280, 282.

④ Ayas Ishaky, *Idel-Ural*, p.35.

和随后爆发的 1905 年革命，给了突厥鞑靼民族主义者公开并合法地宣传自己思想的机会。在喀山、克里米亚和周边地区、以及中亚等地，这种宣传引发了大量政治事件，使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进入了政治斗争的时期。

在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斗争中，突厥鞑靼人仍然表现得最为活跃。召开全俄穆斯林大会是突厥鞑靼人多年的梦想，他们终于在 1905 年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905 年 8 月 15 日，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在伏尔加河沿岸的下诺夫哥罗德召开。大会虽未获得政府批准，但却实现了伏尔加—乌拉尔地区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三大俄国突厥穆斯林精英群体的联合。与会精英大致代表了四个阶层：一是迦斯普林斯基、А·托普奇巴舍夫、Ю·阿克楚拉（喀山）、Ф·卡利米代表的全民族政治活动家；二是Р·依布拉基姆、М·比基、Г·阿帕奈（喀山）代表的乌里玛和反传教宣传的活动家；三是А·侯赛因诺夫、Г·侯赛因诺夫、В·亚乌舍夫、М.З·拉米耶夫代表的大资本家（城市团体领袖和慈善家）；四是Т.М·捷福克列耶夫、С.Г·姜秋林、Ш.А·希尔特兰诺夫、С.Г·阿尔金（喀山）代表的穆尔扎（鞑靼贵族）缙绅和城市活动家。^①大会决定组建全俄穆斯林联盟（Бүтөнрусие иттифак аль муслимин），迦斯普林斯基当选联盟主席，通过了建立总部位于巴库的执行委员会、并在突厥鞑靼人的其他居住中心建立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更像是一块“探路石”，会上没有反政府言论，甚至强调，必须在符合全俄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突厥穆斯林代表提出的目标。^②10 月 17 日，全俄穆斯林联盟宣言发布，标志着该联盟获得了合法地位。宣言第一条确定了“俄国各州穆斯林在社会文化政治需求和当代俄国生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联合的必要性”，认为“必须取消现行法令、政令和行政惯例对穆斯林做出的所有例外和限制，使穆斯林与俄国臣民在所有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上完全平等”；第二条确定了穆斯林精英的目标——“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和管理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该国的法

① Мухетдинов Д.В., Хабутдинов А.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 - начале XXI в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традиции.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НГУ им. Н.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011. С.282.

② Аршаруни А., Габидуллин Х.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С.25.

律秩序”。^①在政府没有追究的情况下，突厥鞑靼人便顺理成章地把全俄穆斯林大会当成了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又一个载体，准确地说，是进行政治斗争的载体。

在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召开前夕，根据 1905 年 3 月 3 日俄国沙皇颁布的诏书，俄国开始准备第一次国家杜马选举。“探路”成功后，突厥鞑靼人认为应该抓住杜马选举的契机，使突厥穆斯林运动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这就是他们于 1906 年 1 月在圣彼得堡召开第二届全俄穆斯林大会的主要目的。大会决定，在选举中把突厥鞑靼代表的选票与俄国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合并起来^②，这在当时是加强突厥穆斯林政治发言权最明智、最现实的方案。第二届全俄穆斯林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1906 年 4 月第一次俄国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有 25 名穆斯林代表当选国家杜马议员。^③这两届全俄穆斯林大会做出的决定说明，“突厥穆斯林团结”的思想，没有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目的，特别是迦斯普林斯基在第二届大会上提出了“与俄国的历史联系是突厥同一性的轴心”的观点，^④它们只会促进“俄国穆斯林有组织的统一”，在内容上包括有利于俄国穆斯林利益的改革方案。

第三届全俄穆斯林大会，于 1906 年 8 月在马卡里耶夫召开。由于国家杜马中穆斯林派系的斡旋，该次大会获得了政府的许可，因此第三届大会的参会代表多达 800 人，但与与会者大部分是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鞑靼人。此次大会将全俄穆斯林联盟改组为政党，迦斯普林斯基、玉素甫·阿克楚拉等 15 名领导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大会提出了俄国所有公民权利平等、实施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按民族比例划分议会名额等要求。该届大会具有浓厚的泛突厥主义色彩，而且还努力拉近与土耳其的关系。例如，在语言问

① Хасаншин Г.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понятий «панисламизм» и «пантюркизм»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мер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тар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лиянию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крае 1910 г.)// Из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2015. №5. С.249-270.

②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68.

③ Ильхам Валиев. Госдума и татары.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Татарская деловая газета «eТатар». 01.12.2011.

④ Матвее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й аспект). С.25-35.

题上，大会决定使用以土耳其语君士坦丁堡方言为基础的全俄突厥鞑靼人通用标准语，反对在学校中对突厥鞑靼族儿童强制学习俄语，努力在俄国鞑靼族学校中使用土耳其教学大纲等。^①

在这些大会的激励下，突厥穆斯林运动走向高潮，不仅在圣彼得堡、第比利斯、奥伦堡、托木斯克、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等地发行突厥语报纸，而且还出现了“Tanchi”社会革命党、社会民族党等突厥鞑靼人的政治组织，以及“Shakirdlik”（意指“宗教学校学生的生活”）、“Shakird”（意指“宗教学校学生”）等穆斯林青年组织。在1907年2月第二次国家杜马选举中，有35名穆斯林代表当选议员。^②

然而，1905年革命开始后，俄国突厥穆斯林的政治“繁荣”期并未持续很久。随着1905年12月5日日俄战争的结束，和俄国第一次革命在1907年上半年的最终失败，帝俄的国力开始恢复，政府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国内事务上。俄国穆斯林问题是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年）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地方自治的要求，1910年1月，在斯托雷平倡导下召开了穆斯林问题部长委员会特别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反穆斯林行动和措施大纲》。1911年1月15日，斯托雷平又向部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在穆斯林民众当中遏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影响力的措施》的文件。文件中指出了双泛分子活动的主要表现：一是数万名接受了洗礼的异族人（инородцы，帝俄对其境内的非斯拉夫人和非欧洲民族，特别是对东部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轻蔑称呼），在1905年改信伊斯兰教并积极宣传伊斯兰教；二是宗教和文化教育领域集中到接受了鞑靼人学校教育的宗教人士手中；三是异族人的普通教育机构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鞑靼人色彩；四是出现了一系列穆斯林—鞑靼慈善机构、出版机构、定期刊物；五是鞑靼族知识分子和鞑靼人的刊物，公开进行反对国家和俄罗斯人的宣传；六是与土耳其和埃及建立了联系，青年人到国外教育机构留学。面对这些问题，部长委员会从宗教、文化和行政三个方面制定了对应之策：一是加强东正教会在国家文化活动领域内的地位；二是根据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调整学校教育事业；三

①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69.

② Ильхам Валиев. Госдума и татары.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是调整伊斯兰教的法律地位，并加强国家对其表现的监控。^①此时，俄国社会上的右派保守力量得到加强，面对发展迅速的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他们着手进行反击。1907年6月初通过的新版国家杜马选举法，增加了有产阶级代表的名额，减少了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突厥鞑靼人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人数也大大减少。因此，在1907年6月举行的第三次国家杜马选举中，只有10名穆斯林被选为议员，1912年第四次杜马选举后只剩下6名穆斯林议员。^②与此同时，俄国突厥穆斯林政治生活的自由发展也受到政府的限制，他们的联合被阻断。此外，帝俄政府还通过专门决议，禁止喀山鞑靼族教师到哈萨克草原和突厥斯坦任教。到土耳其、印度、埃及、阿拉伯等国接受了宗教教育的俄国毛拉，被禁止在俄国境内从事本职工作。帝俄政府加强了对突厥鞑靼定期出版物的审查力度，突厥鞑靼人在市政机关里的人数也被缩减。^③由于受到帝俄政府强大权力的制约，加上俄国穆斯林内部不统一、缺乏政治斗争力量和经验、单纯依靠精英推动而又没有外部力量支持，他们的政治斗争很快就走向了失败。

扎吉德运动的日趋走低，特别是俄国突厥穆斯林政治斗争的失利，使突厥鞑靼族领袖们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实现民族目标，仅依靠俄国突厥穆斯林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外部帮助，他们不可能使自己摆脱俄国的统治，所以必须与境外的同胞联合起来。在1907年国家杜马解散后，俄国的突厥穆斯林精英开始按地区特征分化，随之而来的是俄国穆斯林社会运动逐渐分解为各个民族的运动，泛突厥主义在俄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还有一些穆斯林政治活动家开始离开俄国。^④在后者看来，奥斯曼帝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帮

① Хасаншин Г.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понятий «панисламизм» и «пантюркизм»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мер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тар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лиянию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крае 1910 г.). С. 249-270.

② Ильхам Валиев. Госдума и татары.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③ Ayas Ishaky, Idel-Ural., p.37.

④ Хасаншин Г.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понятий «панисламизм» и «пантюркизм»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мер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тар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лиянию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крае 1910 г.). С. 249-270.

助俄国突厥穆斯林的外部国家，因此必须加强与奥斯曼政府的联系。^①这种结论加上帝俄政府的打压，迫使玉素甫·阿克楚拉、阿里·胡赛因扎德、阿雅兹·伊斯哈吉等多位著名的领袖移居君士坦丁堡。逐渐分化并失去了主要领导力量的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也走向了终结。

五、几点思考

俄罗斯学术界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研究和争论，仍然在进行，并且把对该问题的研究与一系列历史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试图找到俄罗斯现今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的源头。不可否认，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不仅与俄罗斯及其穆斯林社会密切相关，而且还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操突厥语诸民族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前文的粗疏研究，笔者认为：

首先，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这场突厥穆斯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回击。泛斯拉夫理论的主要代表、政论家 Н.Я·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他认为，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是各种文化类型的依次更替。斯拉夫类型是历史过程的体现者，具有充分发展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历史政治的天赋，是最高文化历史类型；而其他民族不过是人种原料，他们的文化历史类型只能得到局部发展。依据这种理论，斯拉夫是优秀民族，当然负有“解放”和统治其他民族的使命。^②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对非斯拉夫人进行文化同化，为捍卫自己的文化生存空间，俄国穆斯林精英借助了所谓的突厥身份。

其次，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两大主要载体——扎吉德运动和全俄穆斯林大会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二者未能形成有效的统一，甚至出现了分歧较大的观点，例如在学校教学大纲的选择上。不可否认，这种脱节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后来迅速失去内生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71.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117-118 页。

再次，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不仅内部存在分歧，而且还缺乏广泛而牢固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俄国穆斯林知识精英在忠于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原则基础上，支持含有宪政和社会公正思想的宗教—文化革新，但他们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家”，只能算是“半革命家”或“改良派”。而且他们内部在政治取向上还存在“亲俄派”和“亲奥（土）派”的不同，在教育取向上则存在“新教学法”和“旧教学法”的分歧。另一方面，“双泛”宣传活动并未在广大突厥穆斯林民众当中取得明显成功，他们更愿意留在统一的俄国，而不是分离出去。同时，在突厥穆斯林居住地区（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生活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生活的中亚地区，克里米亚鞑靼人、北高加索的多个山地民族和阿塞拜疆人生活的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还存在一系列阻碍俄国穆斯林社会统一的因素：如在自然气候条件、社会发展水平、民众受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地区精英的利益诉求、对俄国发展前景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帝俄政府并没有否定广大穆斯林民众对俄国的忠诚，即使是在制定《反穆斯林行动和措施大纲》时，仍提出了一系列前提条件，如政府措施不应限制宗教自由、排除伊斯兰信众的特质等。^①

第四，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导主体是鞑靼族知识精英，活动范围集中在俄国本土，而且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分裂主义要求，直到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移居奥斯曼土耳其后，特别是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和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部分穆斯林才有了明显的分离诉求。但此时的主导力量要么位于俄国境外，要么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都离开了俄国的中心区域。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使俄国穆斯林民族运动的分化更加明显。伊斯兰激进派领导者开始鼓动伊斯兰教的卫士，把穆斯林地区从俄国分离出去，他们还与俄国在一战中的敌人土耳其和德国建立了直接联系，而参加起义的多数普通民众则不支持这种分裂主义行为，他们保持着对帝俄政府的忠诚。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穆斯林精英又提出了从自治到完全独立的“自治权”，以及建立本民族独立武装的要求，如北高加索穆斯林山民就组建了一

^① Борисова И.Д. Макеев Д.А.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чала XX в. // Вестник 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14. №.2(31). С.17-21.

个师。但广大穆斯林民众仍对俄国心存留念，如鞑靼穆斯林民众就曾“真诚地表示他们不喜欢独立，不相信独立，认为在帝俄政府的统治下生活得要比独立时好得多”。^①

第五，迦斯普林斯基作为“泛突厥主义之父”和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主要领袖，使这场运动含有泛突厥主义的内容是必然的，但泛突厥主义绝不是它的全部内容。更应该说泛突厥主义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觉醒的重要产物，并伴随着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发展而发展，但却并没有因为后者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究其根源，是泛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土耳其重获新生，并在其推动下一次又一次地影响到俄国和苏联。

最后，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繁荣期，与泛突厥主义走向政治化的时期有所重合，但“此政治”非“彼政治”。从前文来看，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斗争以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为主；而根据玉素甫·阿克楚拉于1904年发表《政治的三种形式》一文，比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更有发展前景的泛突厥主义的政治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基于民族因素的政治突厥民族”。^②当然，也可以说，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斗争是泛突厥主义政治化的一种表现。但是，两种“政治”似乎还是存在着现实与虚幻、低级与高级或者短期与长远的差异，只是俄国突厥穆斯林政治斗争的式微和奥斯曼土耳其成为泛突厥主义的主阵地，使这些难以清晰地展现出来。泛突厥主义后来在奥斯曼土耳其实现了更深层的政治化，并一度成为大国对俄罗斯（苏联）、中亚和我国新疆进行分裂的工具，它对世界历史和地区局势产生的影响至今犹在。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there emerged lots of turkic ethnic reformers, represented by Mirghani, Nazriand and Fitzghani, who promoted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Russian Turkic Muslims. Against this backdrop, Gasprinskii formed his own new ideas on political, religious, ethnic,

① Борисова И.Д, Макеев Д.А.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чала XX в. С.17-21.

② Искандер Гилязов. Тюрк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основных этапов). Казань: Каза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С.24.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ssues concerning Turkic Muslim society in Russia. He eventually became leader of Turkic Muslim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Jadid Movement and the all-Russian Muslim Congress are two main carriers for the Russian Turkic Muslim Movement despite their relative independence.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in 1907, the Russian Turkic Muslim Movement came to an end due to restrictive policies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Key Words】 Russian Turkic Muslims, All-Russian Muslim Congress, Russian Ethnic Issues, Jadid

【Аннотация】 В середине и конце XIX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 появились такие тюркоязычные реформаторы, как Марджани, Назиров и Фаизханов, которые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самосознанию русских тюркских мусульман. В т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Гаспринский сформировал свою новую идею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этнически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ах тюрк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й общины в России и стал лидером джадид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Джадидизм 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мусульман являются двумя основными, но независимыми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и тюркского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перв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1907 году из-за 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инятой царск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и, тюрк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одошло к конц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юркские мусульмане в Росси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мусульман, российский этни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жадидизм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苏俄村社与贫农委员会的博弈及其影响*

赵旭黎**

【内容提要】村社具有千年历史，是俄国农民的基层自治组织。十月革命之后，村社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获得了复兴，牢牢控制了苏联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在夺取政权之初，布尔什维克为控制广大农村地区，曾试图建立并控制基层（村级和乡级）苏维埃，以取代村社，但未获成功。于是在1918年6月转而在农村建立贫农委员会，以期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然而，在内战背景下，这场运动激起农民广泛反抗，以失败而告终。1919年初，布尔什维克被迫调整政策，解散贫农委员会，与村社秘密达成了妥协。这是村社在1920年代持续复兴，对基层农村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俄国村社 俄国农村 俄国贫农委员会 俄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1-0181(20)

一般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俄国建立起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开辟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如果说在俄国的大中城市和工业中心，因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足够强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基本达到的话，那么在广大农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俄罗斯粮食问题研究（1917-2016）”（项目批准号：17XSS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赵旭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村，由于村社^①这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农民自治组织牢牢控制着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社会主义革命（即列宁所谓的农村的“十月革命”）的完成要晚很多。在夺取政权之初，为取代村社，布尔什维克曾试图在基层农村建立并控制苏维埃，但未获成功，于是在1918年6月转而在农村建立贫农委员会，同时推进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这场对农村的“十字军讨伐”激起农民反抗，以失败告终。1919年初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调整政策，解散贫农委员会，与村社达成了妥协，这是村社在20年代持续复兴、对农村基层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苏俄农村的村社、贫农委员会乃至村苏维埃的研究并不充分。就笔者所见，国内学者研究过村社与村苏维埃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过村社和贫农委员会各自发挥的具体作用，但几乎无人论及村社与贫农委员会二者之间的关系。首位探讨村社与村苏维埃关系问题的学者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曹维安教授，他早在1986年就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到苏维埃时期的基层农村存在村社与村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现象。^②随后，李兴和刘长江分别在1995年和2010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间接论及村社与村苏维埃在当时的农村基层社会发挥的具体作用。^③此后，这一问题的研究陷入长期停滞。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学界对贫农委员会与村社关系进行深度挖掘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因研究力度不够，国内学界对苏俄早期农村基层社会状况的认识存在许多模糊甚至谬误之处，例如，不少学者错误地认为，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苏维埃在基层农村占统治地位，布尔什维克确立了对农村基层的控制；很多人也不了解

① 在本文中，“农村公社”及其简称“村社”（сельская община, се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农民公社”（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община,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土地公社”（земе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米尔”（мир）等指的是同一现象，即历史上形成的土地共同使用形式及农民自治管理形式。

② 参见曹维安：《俄国农村公社初探》，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1986年，第72-74页。后来作者将其硕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及主要内容分别在学术期刊及专著中公开发表。参见曹维安：“苏联集体化前的农村公社”，《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③ 参见李兴：“1917-1922年苏俄村社的复兴及其原因初探”，《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刘长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在农村的政治建设”，《唯实》，2010年Z1期。

“村社”这种传统的基层自治组织，更不用说研究村社与贫农委员会二者间的关系了。

鉴于此，本文借助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公开出版的俄罗斯解密档案，梳理苏维埃政权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运用实证材料厘清村社与贫农委员会之间的实力对比以及两者间博弈的结果和影响，以加深国内学界对苏维埃政权执政之初的俄国农村基层实际状况的认知。

一、布尔什维克村社政策的指导思想

村社又称农村公社、农民公社，是农民面对低下生产力和恶劣自然环境，为了生存而结成的劳动和生活共同体。^①俄国的村社产生于基辅罗斯时期，是农民的基层自治组织，有土地分配、生产、税收、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和宗教等多重功能。千百年来，以村社为纽带的生产组织、生活习惯世代相沿，使村社自治、互助的精神积淀和升华为根深蒂固的传统，镌刻于俄国农民的经济、社会与精神世界之中。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斯托雷平改革的双重影响之下，1917年以前俄国村社已经有衰落的迹象，可是1917年二月革命后，村社却在彻底重分地主土地的革命过程中奇迹般地自发复兴。1917-1921年间，整个苏俄农村更像一个获得复兴的巨大村社。难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全俄村长”（*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роста*）。村社的复兴贯穿了整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192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大约95%以上的苏俄农村的土地归村社使用。^②

布尔什维克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必须把革命推向拥有亿万农民大众的农村，才能确保十月革命在整个俄国的彻底胜利。可是，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面对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发达工业国，而是传统的村社自治组织得到极大复兴的农业大国和80%以上的人口都在农村的农民大国。这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① 罗爱林：“试论村社制度对俄国社会的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Данилов В.П.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удьбах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общины в России// Ежегодник по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Вып. 6. Вологда, 1976. С.108.

革命面对的基本国情。

然而，不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主要领导人，都不太熟悉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与对城市和工人的熟悉和了解相比，经典作家对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研究要薄弱得多。所以，马克思主义高度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认为城市和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的支柱；农民属于小业主，被归入资产阶级的阵营；农村则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没文化的和落后居民的聚居地。

与此相适应，布尔什维克村社政策或农民政策的指导思想有二。其一，忽视乃至轻视农民。列宁认为个体农民是小私有者，不愿接受国家监督，是俄国现代化的障碍，是国家落后的根源。他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断：“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此“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如果不战胜它，就“无疑会葬送我们”。^①有这样认识的布尔什维克，决不仅领袖列宁一人。所以，布尔什维克当政后，推行的自然就是与村社这一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村、具有漫长历史的农民自治机构做斗争的思想。其二，如果接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作为农村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可以成为一支革命的力量。这是列宁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后来在农村建立贫农委员会推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

与村社政策的指导思想相适应，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需要破坏农村的相对统一，把农村分裂为相互对立的农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让贫农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村社是整个农民阶层的象征，妨碍了农民分化和分裂为对立的社会阶层（“分裂农村”是列宁亲自讲过的词组^②）。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并未立刻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等到1918年6月，才通过在农村组建贫农委员会的方式“分裂农村”。列宁说过：“农村本身只在1918年夏秋两季才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4页；第34卷，第274-275页，第278页。

^② 这是列宁1918年11月《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原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吓唬我们，说我们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会使农村分裂，但是不使农民分裂又意味着什么呢？……因此，我们决定分裂农村……”。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173页。

经历‘十月’（即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只有在成立贫农委员会之后，“我们的革命才不是在宣言上、许诺上和声明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革命。”^①这与列宁“两步走”的革命理论密切相关：在俄国农村，1918年6月前是资产阶级革命，即组织全体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6月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如列宁所言：“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②列宁所言的“全体”农民，当然指的是整个村社，因为村社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除列宁外，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也主张通过引入阶级斗争的方法“分裂”农村。比如，托洛茨基1906年就写道：“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不得不把阶级斗争引入农村，并以此方式破坏全体农民无疑都会拥有的、但集中于相对狭窄范围内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之后，必须在很短时间内让农村贫农反对富农，农业无产阶级反对农业资产阶级，以此来寻找自己在农村的支持者”。^③1918年5月2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在作贫农委员会组建工作报告时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把农村分成两个敌对得不可调和的阵营，只有我们能够在那里燃起不久之前刚刚在城市发生过的国内战争的烈火，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说，在与农村关系方面，我们能够做那些曾在城市做过的事情。”^④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上述主张，在1919年2月列宁起草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初稿》中得到了体现，党纲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是：“利用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而坚定地过渡到共耕制和大规模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305页；第36卷，第130页。

② 同上，第302页。

③ Троцкий Л.Д. Наша революция. СПб, 1906. С.255.转引自 Куреньшев А.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его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ека.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 2000. С.92-93.

④ Протоколы заседаний ВЦИК 4-го созыва. Стен. отчет. С. 294.转引自 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брест, или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НЭПа. М.: Рус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1996. С.53.

社会主义农业”。^①

二、布尔什维克执政前半年村社与村苏维埃的博弈

布尔什维克在执政之初，仅控制了俄国各大中城市和工业中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当时实际上是自治的。散布于广袤俄罗斯大地的十万余个村社牢牢控制着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②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村社的全面复兴，让布尔什维克非常担心，试图在基层农村建立已经比较成熟的苏维埃^③，逐步取代村社，最终取得对广大农村的控制权。按照 1918 年苏俄宪法，村庄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村苏维埃，主要履行的是革命前村社的行政管理、财税和司法功能。

解体前的苏联学者和国内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月内，基层苏维埃在苏俄迅速成立，这段时间被称作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时期。苏联 1986 年出版的一部多卷本农民史著作写道：“乡苏维埃的大规模建立始于 1917 年底，建立最快的时期是 1918 年 1 月-3 月”；据该书统计，革命后至 1918 年 5 月，欧俄 28 省共建起 3655 个乡苏维埃。^④那么，苏维埃的建立是否意味着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农村统治的确立？答案是否定的。革命后最初几个月内建立的村苏维埃和乡苏维埃，是根据村社传统在村社大会上从所有户主中选举出来的，是农民的民主组织，本身就带有村社传统。而作为一个农民自治组织，村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村社大会，不执行上级机关的指令。

既然如此，如何解释 1918 年上半年苏俄农村的快速“苏维埃化”呢？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36 卷，第 81 页。

② 据统计，1917 年初后来的苏维埃俄国（不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土范围内总共有 11 万多个村社。参见 Данилов В.П. Советская доколхозная деревня: население, землепользование, хозяйство. М., 1977. С.97.

③ “苏维埃”译自俄文词“совет”，原意为“会议”、“委员会”。作为一种自发成立的革命政权机关，苏维埃在俄国最早出现于 1905 年革命期间，并在 1917 年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时期得到发展。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将苏维埃作为新政权的国家管理机关确定下来。

④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Т.1.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1917-1927. Под ред. Шарапова Г.В. М., Наука, 1986. С. 43.

其实，原因很简单。农民当时认为，村苏维埃会议与村社大会具有同等意义，因此村社被“苏维埃化”了。1921年前，在坦波夫省村社大会的会议记录中，“村苏维埃会议”、“村社会议”、“村子大会”、“村社记录”、“村苏维埃记录”这些概念都可互换。^①在农民看来，村苏维埃已取代村社，或许这样说更准确：村社还是那个村社，只是换了“村苏维埃”的名称而已。

正因为如此，当时基层苏维埃的建立是在村社的参与下完成的，苏维埃网络建设经常要考虑村社地理位置的分布特点，而且常常与村社的管辖范围完全一致。这一时期，基层苏维埃不论在内容上，还是性质上，都与村社管理机关无异，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因此被称为村苏维埃与村社的“共生”（симбиоз）^②现象。农民进行苏维埃选举时，首先看的是个人威信，而不是阶级原则，因此选进苏维埃的人往往分属于不同阶层。如果考虑到农民自古以来对“善于持家的”富裕当家人的尊重，就可以理解，为何当时控制苏维埃的几乎都是富裕农民。^③实际上，村和乡的苏维埃已成为村社的执行机关，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进攻面前，成为村社利益的保护者。

另外，还有一个政治因素非常关键。其实，布尔什维克当时不但无法控制村社，还无法控制苏维埃。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农村地区的苏维埃实行的是多党制，主要包括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等在内的左派政党。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革命党在农村的影响力远超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苏维埃中获得压倒性优势。1918年6月-7月，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开除出苏维埃之后，中央一级的苏维埃才变成了听从布尔什维克指示的组织。之后，布尔什维克才开始在地方各级苏维埃中清除其他党派分子。

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前半年，其控制农村的企图遭遇失败。首先，本来试图建立的村苏维埃，却被强大的村社传统“征服”，与村社事实上属于一

① ГАТО. Ф.Р-1. Оп.1., д. 266, л. 151, 291 об., 380, 381.转引自 Безгин В.Б.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община и сельсовет в 1920-е годы// Проблемы общества и политики. 2013. №.2.

② 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这种生活方式叫做共生（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89页）。可见，“共生”最初是一个生物学术语，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

③ Вронский О. Г.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1900-1923). Тула: «Рарус», 1993. С.51.

体。其次，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也没有控制在自己手里。于是布尔什维克急需一个新的“杠杆”来“撬动”农村局势。众所周知，此“杠杆”即贫农委员会。组建贫农委员会的目的，一是与村社进行竞争，二是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进行斗争，将其排挤出地方各级苏维埃（尤其是农村基层苏维埃）。由于苏维埃中央政权是工人政权，而农村的基层苏维埃却是农民政权，所以布尔什维克试图将贫农委员会变成工人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和共产主义的前哨。

三、农村的“十月革命”：村社与贫农委员会的博弈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要在苏俄农村建立贫农委员会，除了上述两大原因之外，还有一系列现实原因。

第一，布尔什维克明白，正是由于从法律上正式承认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合法性，农民最初才信任和支持苏维埃政权。而由于种种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支持不断减弱，于是布尔什维克开始在农村寻找支持者。第二，布尔什维克指望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以支援俄国。为推动世界革命需要发动革命战争，这就急需大批人员（以扩充兵力）和大量粮食，而1918年上半年布尔什维克推行的经济政策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成为唯一可为其提供物资和兵源的阶层。第三，组建贫农委员会的直接原因与1918年春夏苏俄异常严峻的粮食危机密切相关。根据苏维埃官方资料，1918年5月，苏俄共征收22万普特粮食，不到上月征收额的十分之一，是1917年同期征收额的0.2%；1918年6月，苏俄粮食征收额只有区区9.1万普特，是上月征收额的40%，为历史最低点。^①为解决危机，1918年5月13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号召同粮食投机商和富农进行无情的斗争，要求每一个拥有粮食的人要在法令公布一周内交出全部余粮，反对者都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

^① Lars T. Lih, *Bread and Authority in Russia, 1914-192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261.

年以上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①

如欲将上述法令变为现实，除了派出工人征粮队外，布尔什维克还需找到一个能“撬动”农村局势的“杠杆”，此“杠杆”即贫农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规定在村和乡建立贫农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以及协助地方粮食机关、征粮队、征粮大军等机构没收富农和富人的余粮。^②苏维埃政权试图依靠贫农委员会，将贫农联合起来，与富农开展斗争，因为执政者认为，粮食在富农手里。此后，工人征粮队、粮食大军纷纷成立，强势进入农村，将绝大多数手有余粮的“富农”视为“敌人”，进行镇压和剥夺。自法令颁布到1918年11月，苏俄欧洲部分的33省和白俄罗斯共成立了12.2万个贫农委员会。^③组建贫农委员会的法令，以及将阶级斗争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实际上给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的关系注入了新因素，将整个社会推向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进行国内战争上来。贫农委员会的成立和开展工作，人为地将农村分化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挑起了贫农与富农之间的仇恨，从广义上讲，这其实也是国内战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然而，此处有一个问题值得探究：1918年之时，苏俄农村存在着富农和贫农的财产分化吗？当时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布尔什维克按阶级标准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这种划分方式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性。贫农被认为是城市无产阶级的忠实盟友，支持苏维埃政权，中农会动摇，而富农当然会敌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这种阶级划分模式，如若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配置各种社会力量，以及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选择适当的盟友，或许是有益的，但从纯经济角度分析，这一划分的科学性就要打问号了。

列宁曾对1918年秋俄国农村的社会力量对比做过这样的估计：“使贫苦农民的百分比不小于40%，中农不小于20%”。^④这显然是对农村情况的

①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 II. 17 марта-10 июля 1918 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 С.261-266.

② Там же. С. 412-419.

③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其中的“Комитеты бедноты”词条。<http://istorijarossii.narod.ru/istslov.htm>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95页。

误判，列宁后来在俄共（布）八大上也坦率承认了这一点。不得不说，布尔什维克对俄国农村的认识过于抽象，没有意识到在战争和革命进程中，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已发生巨变。由于多年的战争和经济萧条，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农村的社会财富已经在极低的水平上平均化了。农村普遍进行的大家庭分家致使贫困户增多，残疾人、病人、光棍汉也沦为下层农民。同时，因为挨饿，越来越多的城市工人、官员、市民、难民、逃兵，以及脱离本阶层的贵族、富商、小企业主都来到农村。农村原有的资产阶级、富裕阶层，以及在斯托雷平改革中获益的独立农庄主和单独田场主都消失了，他们被迫加入或返回了村社。纯从经济角度看，中农已成为农村的绝大多数，而贫农和富农所占比例已急剧减少。因此，尽管列宁赋予贫农委员会的建立以特别重大的意义，认为这是苏俄革命“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是在农村“举行了十月革命”^①，但它与农村的实际社会分化并没有太多联系。

贫农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工农共产党员或退伍士兵，其成员的社会组成非常复杂，往往并非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贫农，通常只要不是富农或富人，家里没有余粮或其他食品，不使用雇佣劳动，就可以加入贫农委员会，此外来自非产粮省的各色人等也常加入其中。随着贫农委员会的组建，各地传来非常奇怪和荒谬的消息，与布尔什维克的期待和在农民中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背道而驰：贫农委员会依靠工人征粮队没收富农粮食后，不仅把粮食直接分给贫农，甚至还搞投机贸易——一个富农消失了，却出现了十几个小骗子；而逃脱贫农纠缠后，富农却绕过贫农委员会连夜把粮食运到国家的收粮站。^②乌法县贫农甚至坚决反对没收本村富农的粮食，他们对粮食工作人员说，不相信国家机关，他们认为，从富农处拿粮总比从粮食机关那里容易得多。^③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划分“贫农”和“富农”，在实践中有时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并非所有的富农都如布尔什维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406页；第36卷，第130页。

② Известия Наркомпродa. 1918. №12-13. С.11. 转引自 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брест, или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НЭПа. М.: Рус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1996. С.64.

③ Известия Наркомпродa. 1918. №12-13. С.56. 转引自 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брест, или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НЭПа. М.: Рус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1996. С.65.

所言，是奸诈的投机商，也有支持党的粮食政策的富农，也并非所有贫农都会按其“阶级属性”支持党的政策，也有搞投机的贫农。

其实，组建贫农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为红军获取粮食、人员和马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行动很快就让村社各阶层的农民组成统一战线，对抗企图夺取其粮食、人员和马匹的政府。在最初阶段，贫农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让农民愤怒。革命共产主义党^①（Парт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的杰出活动家阿列克谢·乌斯基诺夫^②（А.Устинов）这样评价贫农委员会的活动：“贫农委员会成了农村最大混乱的源泉……参加贫农委员会的有贫农、农村的盲流和懒汉、流浪汉……这些人只知道扩大自己的权力，村里谁只要有点吃的，就去搜刮。对劳动农户的财产毫不吝惜：盗窃牲畜、各种农具，将最微小的一点食品储备都据为己有。……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消灭财富。”^③各地的贫农委员会所做的那些事，只能被称作“刑事犯罪”，奔萨省粮食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就是这样总结贫农委员会的活动的。^④比如，奥廖尔省沼泽村贫农委员会主席在村里总是为所欲为，他没收了部分农民的粮食，分给其他农户；群众对此敢怒不敢言，如若某人胆敢批评，几天后他家的粮食和牲畜就会被没收，然后被县契卡逮捕入狱。^⑤

农民对此无可奈何。在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中，可以看出人们对贫农委员会的不满情绪：“委员会，委员会，贫农委员会，人们的脸色如此苍白，不是因为你们吗，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贫农委员会，有这么多的贫困，

① 1918 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起义之后，该党发生了分裂。9 月，一批支持与俄共（布）进行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萨拉托夫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党，1920 年 9 月该党并入俄共（布）。

② 阿列克谢·乌斯基诺夫（1879-1937），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 年 9 月，率领一批支持与俄共（布）进行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成立革命共产主义党，并任该党领导人。

③ Устинов А. О земле 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е. М., 1919. С.27. 转引自 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брест, или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НЭПа. М.: Рус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1996. С.64.

④ РГАЭ. ф.1943, оп.3, д.491, л.15. 转引自 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брест, или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НЭПа. М.: Рус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1996. С.63.

⑤ Чугунов Т.К. Деревня на Голгофе. Летопись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эпохи: от 1917 до 1967 г. Мюнхен: издание автора, 1968. С.17-18.

不是因为你们吗，委员会？”^①

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组建贫农委员会分裂村社的行动进行了反抗，最主要的消极反抗形式是拒不建立贫农委员会。此类决定通常是村社全体成员集体做出的。在村社大会决议中，农民常说，现在大家都是贫农。例如，1918年6月11日的法令公布之后，8月30日，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Новоузенский уезд）阿尔帕基耶夫乡苏维埃会议（Алпатьевское волост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一致通过决议：“由于阿尔帕基耶夫乡只有一个村庄，且大部分村民都属贫农阶级，我们这里没有富人和富农。我们认为贫农委员会是多余的和亏本的，更何况，我们没有资金，中央没给钱。我们授权乡苏维埃委员会和粮食特派员负责贫农委员会事务，保护贫农阶级的利益”。然而，村社大会的决议未起多大作用，两个月后的10月30日，村社大会传来消息：“……乡里的贫农委员会已经建立”。^②同样，萨拉托夫省阿特卡尔斯克县（Аткарский уезд）基谢列夫一切利佐夫乡（Киселевско-Челизовская волость）农民代表大会在讨论建立贫农协会（Союз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бедноты）问题时，宣读了若干村社大会的决议：“……各村社认为，没必要成立这一组织，因为村社农民几乎都同样贫困，代表贫农委员会的那些穷人，又被选进了村苏维埃；建立专门的贫农委员会，会让村社农民内部产生不和谐及不必要的纷争；村社的其他成员，譬如失去丈夫的军嫂和残疾人，他们该怎么办啊？也成立自己的委员会吗？”^③众所周知，如若有旧组织，农民通常反对建立任何新组织，因为反正新建的组织都要靠农民养活。其实，多数农民并不反对帮扶穷人、寡妇、孤儿和残疾人，但他们认为，不必为此专门再建一个新组织。需指出，有些地区的农民对建立贫农委员会的反抗相当激烈，以至贫农委员会被迫秘密建立，并在地下活动。比如，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县（Кирсановский уезд）伊诺克夫乡（Иноковская волость）的代表在该县

①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1921г. №1. С.53. 这里的歌谣 1917—1919 年搜集于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和弗拉基米尔省的几个县。

②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арат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АСО).Ф.52.Оп.1.Д.72.Л.48.51. 转引自 Куреньшев А.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ег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ека.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 2000. С.117-118.

③ Антонов-Саратовский В.П. Советы в эпоху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1918-1921).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Ч.1.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1928. С.393.

第一次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发言：“富农在我们这儿的影响很大，工作不得不秘密进行，贫农委员会的组建也是在地下。”^①

农民的另一种反抗形式是暴力反抗。1918年7月7日，由于建立贫农委员会，奔萨省切姆巴尔县（Чембарский уезд）波伊姆村（с.Поим）发生骚乱；后来，该县四个乡的农民又因同样原因发动暴动。^②8月5日，奔萨省奔萨县库奇基乡（Кучки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库奇基村（с.Кучки）农民发动了针对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的武装起义，起义者打死了7名征粮队的红军战士和4名贫农委员会成员。^③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资料，因组建贫农委员会和暴力征粮，自1918年7月到年底，欧俄16省共爆发129次起义，其中7月有13次，8月有29次，9月有17次。^④这样，布尔什维克政权对农村的武装讨伐未获成功。

除了农民外，许多苏维埃政权机关乃至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级领导人也反对建立贫农委员会。在内战时期，地方政权机关权力很大，很多问题经常自主做决定，不考虑中央意见。这里既有基层苏维埃政权机关（乡级和村级），也有更高级别的（县级和省级）政权机关。有些苏维埃政权机关领导人对人为分裂农村的计划明显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贫农委员会的横空出世，给本来就不太整齐的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系统带来了新的分歧和混乱。^⑤在苏俄各地，贫农委员会几乎都与苏维埃发生了冲突。1918年10月20日，当维亚特卡省马尔梅日县（Малмыжский уезд）旧特雷克乡（Старо-Трыкская волость）召开村贫农委员会委员会议之时，宣传员科普科夫（Копков）首先解释了现有的乡和村苏维埃执行委员

① Антонов-Саратовский В.П. Советы в эпоху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1918-1921).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Ч.1.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1928. С.357.

② Сумерин П. Комбеды в Пензин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Пензин. кн. изд-во, 1960. С.23. 转引自 Кондрашин В.В.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стоках сталинизма. М.: РОССПЭН, 2009. С.423.

③ Берелович А, Данилов 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Том.1. 1918-1922.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306-307.

④ 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брест, или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НЭПа. М.: Рус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1996. С.62.

⑤ 列宁在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贫农委员会与苏维埃的并存，会导致“发生纠纷和无谓的争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175页。

会的工作和意义，然后宣读了1918年6月11日通过的关于组建贫农委员会的法令及其实施细则，解释了这一法令及其实施细则的目的和意义。解释完后，各村贫农苏维埃（сельские советы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бедноты）的委员们通过决议：“取消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乡贫农执行委员会（Волостно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бедноты）”。^①有些地方，即使未发生此类事情，也常出现争执和混乱。

有些地方的贫农委员会认为把持苏维埃的是“富农”，因而向其宣战。例如，被坦波夫省执行委员会派往叶拉托姆县（Елатомский уезд）的特派员报告说，农民错误理解了建立贫农委员会的法令，派往贫农委员会的都是富农，不是贫农。1918年10月27日，莫尔尚斯克县贫农委员会（Моршанский уездный комитет бедноты）代表在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组建贫农委员会之时，苏维埃是反对的，出现了暴动和斗殴。富农的武装很好，但通过契卡和贫农委员会，成功解除了富农的武装。到处都是富农苏维埃，不得不暂时解散苏维埃。我们首先做的是最好的几个穷乡的工作。我们也吸收了中农，因为感觉让我们大家都与穷人对抗，有点怪怪的”。^②可见，这位县贫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已注意到村社意识的表现，他认为把贫农与其他阶层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他还建议吸纳中农加入贫农委员会，因为中农当时已成为村社的中坚力量。还有地方的上级贫农委员会机关认为村级贫农委员会不是贫农组成的，但却遭到村级贫农委员会的否认。例如，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Задонский уездный съезд комитетов деревенской бедноты）主席指出：“尔扎维茨村（Ржавиц）贫农委员会由富农组成，其工作情况很糟糕。然而，该贫农委员会的代表却回答说，贫农委员会是由贫农组成的”。^③

在村社反抗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建立贫农委员会的过程受阻，许多地方政府被迫打退堂鼓，又重建基层苏维埃。当局被迫承认，在村社大会的协

① Антонов-Саратовский В.П. Советы в эпоху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1918-1921).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Ч.1.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1928. С.393-394.

② Там же. С.343.

③ Там же. С.351.

助下，所谓“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以“中农”的身份潜入了贫农委员会，贫农委员会就变为全体农民的组织，而不是农村无产阶级组织。苏俄中央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财产意义上的“富农”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已经消失了，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所说的“富农把持”或“富农影响”，实际上指的是村社传统价值观对贫农委员会的影响——任何从村社公平角度评价苏维埃政权的企图，都被当局认为是受到了“富农影响”，即使那里连一个财产意义上的富农也没有。

四、村社与贫农委员会博弈的结果和影响

建立贫农委员会，将农村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社会阵营，这一行动被列宁认为是在俄国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破坏了“米尔”的传统和习俗，引起农民的不满。在千年历史中，俄国农民想出了很多方法，通过村社把政府的指令调整为适当的形式。很多时候，农民看起来像是服从了，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同样，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农民也迅速对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和政策进行了调整，让其适应农村的传统风俗，因为农民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来一直这样做。

贫农委员会开始以农民习惯的方式——在村社大会上——组建，村社大会经常任命贫农委员会的成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918年8月24日，莫斯科省韦列亚县（Верейский уезд）斯莫林斯卡亚乡（Смоли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克林村（д.Клин）的75位户主在村社大会上选出了贫农委员会，并做出决议：“从本村人中选举组成贫农委员会”。^①8月25日，莫斯科省图马诺沃村（деревня Туманово）村社大会做出决议：“从本村选举三人组成贫农委员会”。^②同样，萨马拉省新乌津斯克县（Новоузенский уезд）小乌津斯克乡（Мало-Узе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阿夫古斯托夫卡村（Августовка）村

① ЦГАМО. Ф.6741. Оп.1. Д.11. Л.44. 转引自 Куреньшев А.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ег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ека.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 2000. С.132.

② ЦГАМО. Ф.6741. Оп.1. Д.11. Л.33. 转引自 Куреньшев А.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ег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ека.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 2000. С.132.

社大会研究了贫农委员会问题，并做出决定：“授权阿夫古斯托夫卡村村民阿尔谢尼·克罗斯京（Арсений Коростин）、伊万·沙利金（Иван Шарыкин）、雅科夫·舒托夫（Яков Шутов）编写该村贫农委员会成员名单”。^①

妥协的达成，需要对立双方的共同让步。尽管村社不断自发进行调整，可执政党直到 1918 年底，仍未调整村社政策，仍致力于对其进行分化，并未考虑在农村变革的过程中有效利用村社。自 1918 年底起，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但当时变化的方向不是妥协，而是相反。在 12 月召开的全俄第一次土地局、贫农委员会和公社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许多破坏村社的提案^②，并顺利通过了《社会主义土地规划条例》草案。但是，在代表大会后修改草案的过程中，在全俄中央执委会批准之前，破坏村社这一问题却被撤下。1919 年 2 月通过的《社会主义土地整理条例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③也未提及破坏村社。

之所以没有强制破坏村社，很明显是由于 1918 年底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1918 年 11 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建议贫农委员会与苏维埃合并，这实际上相当于解散了贫农委员会。在本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意识到了冒进政策的错误，认为“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推行政策是“极端荒谬的”，因为“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这个要求”；在解释如此做的原因时，列宁强调“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待群众通过亲身的经验、亲身参加的斗争自己向前走”。^④另外，客观地说，破坏村社这一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社会有机体，对陷于内战旋涡之中的苏维埃政权来说，也是一项力不从心的艰巨任务。

整体而言，1918 年底 1919 年初，布尔什维克控制区域的大多数贫农委

① ГАСО.Ф.52.Оп.1.Д.72.Л.74. 转引自 Куреньшев А.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ег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ека.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 2000. С.117.

② 这些提案主要有苏俄农业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土地规划提案”，以及地方上提交的若干提案，主要内容基本都是建议从行政上分裂和破坏村社，建立共耕制、实施“集体农庄的土地整理”等。参见 Кабанов В.В.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община и кооперац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7. С.85-87.

③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一卷，1917-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15 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35 卷，第 140 页。

员会都被解散了，其他地区的贫农委员会，则随着红军的节节胜利，多数都在 1919 年被解散。布尔什维克最终决定解散贫农委员会，说明因忽视村社及其传统习俗，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自发的严重不满面前实施了退却，与村社达成了妥协。该政策在 1919 年 3 月的俄共（布）八大上正式得到了确认。大会确定了与中农联盟和妥协的方针政策，放弃了“武装进攻农村”的政策。实际上，号召与中农联合，同时却破坏村社，这是互相排斥的两件事情。列宁在解释为何改变政策时说：“由于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由于问题困难，原定的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并且承认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误”。^①

从农村基层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说，与能够控制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强大村社相比较，苏维埃政权在广大农村基层的基本依靠力量（村苏维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非常弱小，在农村基层的和平政治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很难取得对农民的胜利。1918 年夏秋，苏维埃政权试图以建立贫农委员会的方式，在农村建立新的依靠力量，分裂强大的村社。然而，村社机制让苏维埃政权分化农民、把阶级斗争引入农村的企图落空。

1918 年底 1919 年初，苏维埃政权与村社之间达成了妥协。自此之后，一直到全盘集体化，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在基层的妥协通常都是通过村社达成的。达成妥协的方式是，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或者默认村社事实上的自治，遵守村社的传统和规矩。这表现在，基层苏维埃经常听从农民的要求，同意在村社大会或乡民大会上选举产生贫农委员会；粮食征收委员会由村庄各阶层代表组成，而并非仅仅只有那些被当局确认是“贫农”的人；同时，苏维埃政权积极利用村社机制（分摊机制、连环保、村社互助等）为己服务——利用分摊机制和连环保征收粮食和赋税，利用村社互助机制帮助红军战士家属等。另一方面，从村社角度来看，妥协的达成尽管让村社付出了满足苏维埃政权对粮食和兵源之需要的代价，但村社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性质，来自上级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干涉因此减少到了最低程度。重要的是，村社在多数领域还保留了传统村社的基本特征，这是村社在 20 年代一直保持繁荣的原因之一。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36 卷，第 132 页。

应当说，苏维埃政权与村社达成的妥协，是秘密的妥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妥协。看似不可能的妥协之所以能够达成，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苏维埃政权能够从这种妥协中获得政治利益。1918年底，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在内战进行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历史时刻，布尔什维克高层意识到，与其与村社斗争，不如与其和睦相处，集中力量打败内战中的敌人。苏维埃政权本来试图通过猛攻的方式夺取农村，可是却付出了代价，于是不得不选择退却，与农民秘密达成一致，并利用村社机制对农民实行柔性和隐性的控制。

第二，苏维埃政权能够从妥协中获得经济利益。建立贫农委员会时，苏维埃政权有一个实用主义的目的，即获得粮食和兵源，为此不惜利用军事力量和征粮队，采取没收、逮捕等暴力手段，向村社农民施压。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功而返，当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获得的粮食却极为有限。1919年初，苏维埃政权与村社妥协后，开始利用村社分摊机制向各家各户摊派应征的粮食，此即“粮食摊派制”（国内一般译为“余粮收集制”，其实并不准确^①）。这对苏维埃政权是有好处的，因为村社机制可以保证征粮的相对稳定。到20年代末，苏维埃政权甚至将村社的绝大多数预算资金（即公益捐）转给基层苏维埃政权^②。

第三，村社农民是被逼无奈，不得不这样做。其实，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对如此强大的自治组织放心。布尔什维克对如此强大的、“不听话的”农民自治组织有所顾忌，甚至有一定的戒备，是可以理解的。内战开始后，粮食和兵源的紧缺，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向村社发动进攻。如果说，在村级和乡级层面，村社通常比基层苏维埃强大的话，那么，从县级往上，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实力就远超村社。因此，尽管村社能组织村民进行抵抗，但只要从县城、省城派来武装力量，任何一个村社都很容易被各个击破。面对全副武装的苏维埃政权，村社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其进行妥协。

农民迎合了苏维埃政权的要求，为其提供粮食和兵源，但作为交换条件，

① 为何“余粮收集制”属误译，该译名对国内苏联史研究有何影响，请见拙文：“错译的‘余粮收集制’与国内学界对苏联史的误读”，《历史教学》，2013年第24期。

② 村社数量巨大的公益捐资金是如何被剥夺的，与村社灭亡有何关系，请见拙文：“苏联村社财权的丧失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

农民要求当局遵守村社生活的规矩和传统习俗，即是说，所有决定都要通过村社大会。其实，农民这是希望受到尊重，要求政府把其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新公民，有权以和平方式表达己见，实现己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村社农民对国家政权的胜利，但也不应过分夸大胜利之意义，因为胜利是在苏维埃政权与农民联盟的框架内获得的。不管是农民还是苏维埃政权，在一定时期内，谁都不想破坏这一联盟。

结 语

从对农村基层社会管控的角度来看，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初，布尔什维克在农村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本来试图代替村社的贫农委员会，最终遭到解散，并与基层苏维埃合并。由于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不但默许村社的发展，而且在土地分配、征收赋税、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依靠村社来达到其实用主义的目的，导致村社实力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不断壮大，不管是在农村生活中发挥的实际作用，还是财政实力，抑或是民心争夺，村社都在与村苏维埃的博弈中占据绝对优势。

俄国农村真正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再等待十几年时间。直到30年代初，布尔什维克政权才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彻底消灭了村社这个在俄国存在千年之久的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改变了延续千年的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当然，这场农村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给苏联农村、农业和农民带来的巨大影响究竟应该如何评说，还有待学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Abstract】 As Russian peasants' grassroots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 the rural commune has a thousand-year history. Sinc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rural commune has revived instead of being eliminated, firmly controlling the Soviet Union's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rural areas. When seizing power, in order to control vast rural areas, the Bolsheviks had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nd control grassroots Soviet, both at village and country levels, to replace communes, but unfortunately, they ended in failure. As a result, in June

1918, they began to establish poor peasants' committees in the countryside aiming at the goal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rural areas. Nevertheless, against the civil war, this movement aroused widespread opposition among peasants and failed again. At the beginning of 1919, the Bolsheviks were forced to adjust policies, dissolving poor peasants' committees, and secretly reached compromises with rural communes.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rural communes resurged continuously in the 1920s and had great impacts on grassroots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ssian Rural Commune, Russian Rural Areas, Russian Poor Peasants' Committee, Russian Revolu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Сельская община имеет тысячелетнюю историю, является базовой автономной само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русских крестьян.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ельская община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была устранена, но и пережила период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твёрдо взяв под контроль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оциальную и культурную жизнь деревен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начале захвата власти большевиками, они для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обширными сельскими районами, пытались создать и управлять низшими советами (уровня села и посёлка) с целью заменить сельскую общину, но безуспешн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июне 1918 г. в целях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деревне в сельской местности были созданы комитеты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бедноты. Однако, в условиях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кампания вызвала широ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мятеж и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неудачей. В начале 1919 г. большевики были вынуждены от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 свою политику, распустили комитеты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бедноты и секретно достигли компромисса с сельской общиной. Это явилось важной причиной устойчив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сельской общины в 1920-х гг., и оказало си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изов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деревн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сельская общин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митеты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бедноты,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